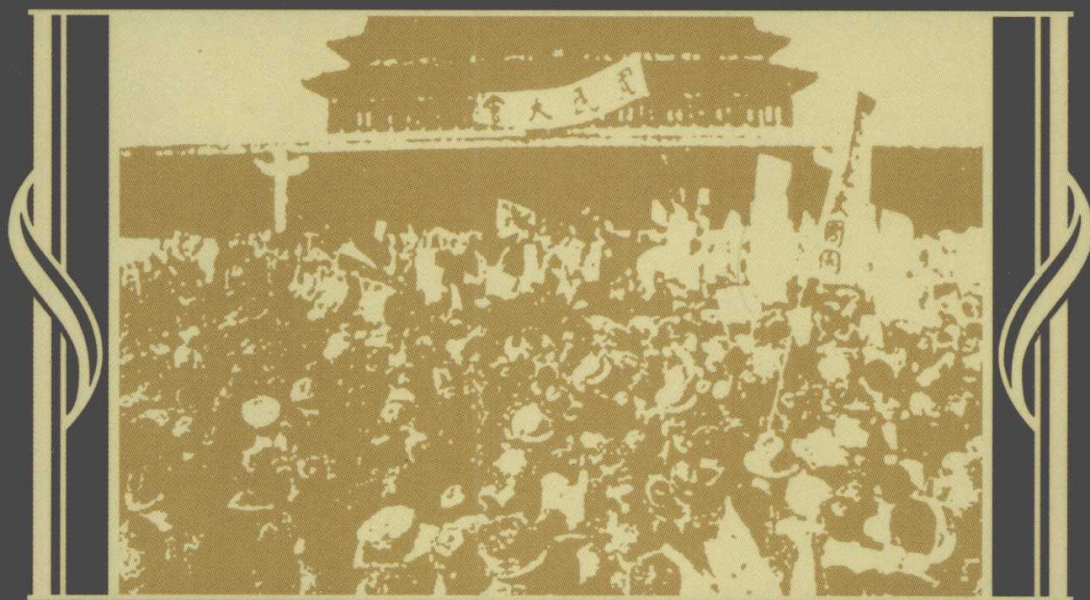


霍韬晦文化思想论集

# 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

霍韬晦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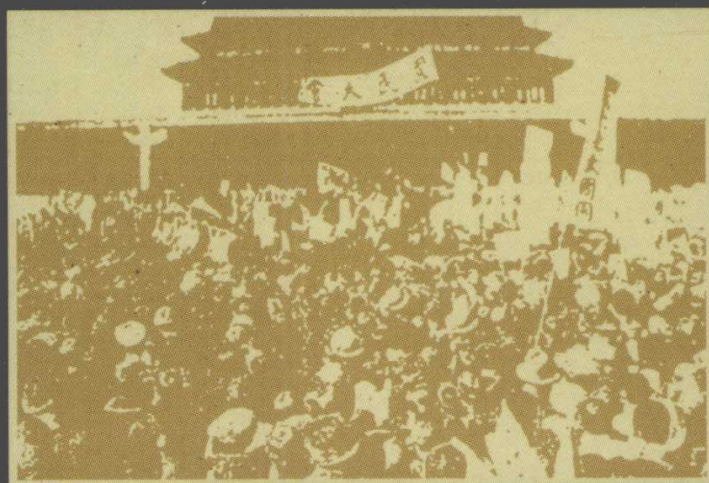


*Returning to Tradition from Anti-tradition*

回忆“五四”、纪念“五四”、继承“五四”、完成“五四”  
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把忧患化为担当，让“五四”有一个圆满的句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eturning to Tradition from Anti-tradition*



Long-Long Book House

ISBN 978-7-300-11427-9

ISBN 978-7-300-11427-9



9 787300 114279 >

定价：22.80 元

霍韬晦文化思想论集

# 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

霍韬晦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霍韬晦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霍韬晦文化思想论集)  
ISBN 978-7-300-11427-9

I. ①从…  
II. ①霍…  
III. ①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0924 号



霍韬晦文化思想论集  
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  
霍韬晦 著

Cong Fan Chuantong Dao Huigui Chuantong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51502011 编辑热线:010-51502017		
网 址	<a href="http://www.longlongbook.com">http://www.longlongbook.com</a> (朗朗书房网)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人大出版社网)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3.7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00 000	定 价	22.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等 待

霍韜晦作词

虽然你已经远去，  
但我感到你正在前面等待，  
那一刻你会回眸，  
我的心里重新有爱。

虽然你已经远去，  
但我记得我曾经这样等待，  
那一刻你会回眸，  
我的心里重新有爱。

(本词已由台湾著名作曲家黄钟先生谱曲)

## 总 序

建国六十年，人间一甲子。中国走过了漫长的革命斗争的道路，如今正在开放，经济生活正在改善，国际地位正在上升，百年宏愿逐渐得成。中国文化则来迟一步，现在仍未得到全面复苏，她的通透的历史智慧与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尚未为国人所悉，大家仍然挤着登上由西方开出的全球化列车。但令人宽慰的是，中国文化复苏的条件已经出现：随着西方霸权没落，金融体系崩溃，人类在追求财富、追求享受的轨道上迷失之后，必然要对自己的历史作出深刻的反省。经过了几千年的文明，由石器时代到今天的科技社会，由争夺猎物到今天的争夺市场，由以物易物到今天的竞相消费，人类究竟要往何处去？在地球资源日益缺乏的今天，如何应付资本主义的高速运转？更严重的，为了产品的销售，必须鼓吹享受和拥有，成功以财富衡量。背后的推动力，就是人类无限的贪欲和自我。这样下去，就不只是经济危机，而是文化危机和人类生存的危机。

中国传统的智慧告诉我们：人该慎乎始。由知其始，即能料其终。但在现实的压力下，人往往不能远虑，只好先顾眼前，结果一定偿付更大的代价。人为什么这样无识？是人自身的局限还是人对自己没有办法？但人能创造出文明，显然就是要打破自身的局限和拿出办法来。而成与败，就看他的能力、他的眼光、他的勇气和他的创造了。

从历史观点看，一切文化皆有所成，亦有所缺；由其所缺，即可招致其败。所以一切文化都可视为一行程，亦有周期可说；其来也必有其始，其去也必有其终。巴比伦已经过去，当年建造南美洲绝顶祭坛的玛雅人和北非金字塔的埃及人，现在已经找不到他们的身影，只留下神秘的建筑在落日余晖中让人凭吊。文明已逝，人亦不存；存亦无意义，因为他已经不认识自己了。原来一个人的成长并非由其生理、种族、肤色、血缘界定，而是由其文化界定。民族亦然，一个民族能够不死，所谓“存亡国，继绝世”，靠的绝对是其文化的力量。

文化有不同的行程，亦即民族各有不同的目标与价值追求。希腊人要认识外在世界，希伯来人要回归上帝，印度人要追求解脱，中国人要成圣成贤，这就是各有所成。数千年后彼此相遇，若不能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反而以力相加，当然血战。这就是中国和东方民族近两百年来的命运，我们身上的伤痕最多。痛定思痛，我们决定向西方学习、移植西方技术和西方价值，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一西方列车将要开往何处。当你乘上，你就身不由己了。

我们丢掉自己的文化，我们将由GDP、人均GDP、外汇储备等一连串的经济数据来界定自己。

我们能回头吗？我们能重拾自己的文化吗？我们可以再做中国人吗（文化意义上的）？这也就是说，中国讲修养、讲人格、讲道德、讲信诺、讲承担、讲性情的文化会再现于世吗？这是中国文明，但也是世界全人类所应当追求的文明呀，该有她的普遍性和终极性。可惜现代人只知生产、只知市场、只知拥有、只知消费、只知享受、只知自己的权利，其他价值就无所知。什么时候人类才能觉醒呢？也许要等到危机爆发、快乐的假象破灭了才会彻底反省。我不希望那一天到来，因为要是这样的话，人就太悲惨了，人也太愚痴了。我希望在金融海啸暴发后一周年的今天，大家应该有所警惕：有些悲剧不可以再发生。那么，亡羊补牢，改弦易辙，是不是时刻到了呢？给自己一个机会，虚心聆听东方哲人的话语，是不是需要呢？

我多年来所做的工作，就是作这样的反省；所写的书，都只不过是呼唤。如今刊行内地版，正期待有更广泛的响应。唯有知之深，才爱之切。历史必须重新创造，找到健康的源头。

2009年9月

霍韬晦序于香港量斋

# 代序：无声的巨响

## ——纪念“五四”九十周年

“五四”到今天，已经九十周年了。过去二十年，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五四”的反思。这一个运动，是如此的波澜壮阔、影响深远。它从青年人的爱国热诚出发，唤醒了无数沉睡的中国人，从学生运动扩展为民族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又从爱国，希望中国新生而反封建、反传统、反旧礼教，同时迎入西方文化以求自我改造，最终建立一个强大的新中国，以洗刷国耻。这是中国自被西方巨炮轰开大门后的历史主题，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背负。

问题是：中国如何才能新生？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当时外有帝国主义环伺，内有腐朽的北洋政权，内忧外患，奄奄一息，中国凭什么资源站立起来呢？“五四”知识分子是想借重外国文化，由科学、民主、自由主义，到中国文艺复兴、白话文学运动、整理国故、文字改革、无政府主义、国粹主义、国家主义、超人哲学……无数主张都被提了出来，乱哄哄，莫衷一是，争论不休。但大部分中国人还

生的金融海啸，源头正是美国，正象征美国的腐朽。我认为这并非金融问题、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经三百年发展，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交替，政府与市场的角力，已进退维谷；同时，市场的拉力太大，人已被全扯进去，陷于利益的争夺中而不得出，社会素质普遍下降，这才是大问题。大家都被现实带动，而百年世运，历史主题，则似乎无声，其实它已有巨响。谁能有此眼光，看到大变呢？

回忆“五四”、纪念“五四”、继承“五四”、完成“五四”，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把忧患化为担当，让“五四”有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是我对“五四”的期盼，也是我二十年来对“五四”反思的心得。本书把我历年的反思文字、演讲，汇为一册，希望能把“五四”的深沉动机和历史使命发掘出来，以方便大家听到这无声的巨响，在“五四”九十周年来临之际，作为献礼。

2009年5月1日

霍韬晦序于香港东方人文学院



## 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

### Contents 目录

#### 001 代序：无声的巨响

——纪念“五四”九十周年

#### 001 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

——“五四”八十八周年纪念讲话 香港场

一、“五四”的深层动机

二、穿过现实浪潮看到历史常道

三、“五四”的转向——从学生爱国运动、

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转为新文化运动

四、盲目反传统——“五四”中人的卑弱与冲动

五、新文化运动下降为白话文运动

六、学步西方——“五四”精神的夭折

七、谁能掌握历史主题？

八、民族独立抑或民族自杀？

九、民族独立不能离其民族文化

十、真正的救亡——畅通中国文化的血脉

十一、国格——中国立足世界的真正根基

十二、历史正给予中国新生的机会

十三、回归中国文化，重建民间社会

## 043 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

——“五四”八十八周年纪念讲话 新加坡场

一、“五四”的起点：反对强权，伸张公义

二、历史沉疴

三、“五四”的转向：从爱国运动、民族运动到文化运动

四、“五四”狂飙，非理性的“启蒙”

五、“五四”的虚无：文化上的无主孤魂

六、“爱国”即自我伤残？

七、中国新生靠什么？

八、从忧患意识到文化定位

九、中国再生的历史转机

十、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关键是人才

现场答问

- 082      旋转乾坤，谁有力量？  
            ——“五四”八十八周年感悟
- 087      纪念“五四”，认识“五四”  
            ——“五四”七十周年纪念
- 090      忧患与担当  
            ——论“五四”精神  
            一、五四运动的性质  
            二、从忧患到担当  
            三、传统文化的滋养与对待异质文化的态度  
            四、永远的“五四”
- 103      超越“五四”、超越中西文化的对立  
            可悲的重复  
            没有志气，中国人永远翻不了身  
            超越“五四”的思维方式
- 108      “五四”八十周年纪念与再出发  
            ——继承“五四”，深化“五四”，完成“五四”  
            一、“五四”的定位

二、历史运命中的张力

三、八十年的回顾：“五四”成功了吗？

四、问题在哪里？

五、继承“五四”，深化“五四”，完成“五四”

131 惨痛的历史和惨痛的现实

——从日本人的侵略到日本人的心魔

136 历史的真诚，良知的忏悔

——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祭

141 中日文化关系的回顾

——兼论日本文化的特征

一、前言：日本人又来了

二、菊与刀

三、日本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吗？

四、和魂汉才

153 中国人的中国史

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

历史是什么？

179 附录：“五四”人物简介

# 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

## ——“五四”八十八周年纪念讲话

### 香港场

“五四”已经八十八周年了，对于这样一个波澜壮阔、影响深远，和中国命运相始终的运动，我们应该怎样纪念它呢？历史的回响不断，但我们能否把它引向一个更高的阶段，以完成“五四”的使命呢？这就系于我们对“五四”的认识，了解它在历史现场的深层动机，才知道“五四”真的不简单。

#### 一、“五四”的深层动机

我曾经参加过两次纪念“五四”的学术会议和讲座。

第一次在“五四”七十周年的时候，亦即1989年，在北京举行。我发表的论文是《忧患与担当》，指出“五四”的精神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反传统和追求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恰恰相反，它来自传统文化的忧患与担当。

“五四”时期，大家都认为要迎入“德先生”与“赛先生”。“德先生”是民主 (democracy)， “赛先生”是科学 (science)。

不错，“五四”时代的确有此呼声；但那是表象，不是目的。我们要问：为什么要迎入“德先生”和“赛先生”才重要？是因为中国没有这两种东西吗？为什么它对中国这样重要？在激烈态度的背后，我们是否看到历史有更深的追求？

第二次“五四”的纪念演讲在香港举行，那一年是“五四”八十周年。当时很多人批评：“五四”过了八十年了，但“五四”的简单要求仍未达成。那是什么呢？就是民主与科学，科学可以说是有一点成绩了，例如中国已有能力制造核弹；但民主建设还远远不够，所以很悲哀云云。

“五四”过了八十年了，原来我们的认识仍停留于当日。“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学习西方，但把焦点集中在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到了今天，很多人的想法依然未变，回看现实的中国，觉得很丧气，甚至痛心疾首。我认为如此的思维不改，“五四”的精神便会永远埋没。所以我讲“‘五四’八十周年纪念与再出发”，目标是继承“五四”，深化“五四”，和完成“五四”。

这篇讲稿后来刊登在我的思想论文集《天地悠悠》之内，我知道时候未到，一般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当时我打算等到“五四”九十周年，让时间证明，到时我再申述一次。但今年“五四”八十八周年，气候似乎有了明显的变化：我早



年的预言，似乎有实现的可能，所以就不等到九十周年，我想先把这意思讲出来，题目定为“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由于海外华人对这个题目亦深感兴趣，所以把它分两段进行：在香港讲完之后，到新加坡再讲一次，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礼堂，与当地传媒《联合早报》等几个机构联合主办的纪念讲座上申述。我希望通过这两次讲话，将“五四”背后的深沉使命显现出来，使它不要再和民族的精神相违，不要再和中国文化的命脉相违，使民族与文化合一，肉体与灵魂不再分裂。

在香港，自从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现实问题太多：大家都在关注政党相争、批评小圈子选举、争取民主、如何改善管治、如何复苏经济……日日争吵，而家庭暴力、校园暴力、教育改革、社会福利等问题都日趋严重。香港人太现实了，哪里还有余情纪念“五四”？我注意到近几年纪念“五四”的声音愈来愈沉寂。但历史告诉我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五四”已远，它是否会在现实的大潮中慢慢销声匿迹呢？

## 二、穿过现实浪潮看到历史常道

这现实的大潮是什么？就是当中国人被日渐西化，随着资本主义的脚步，我们变得更关心个人利益，沉迷消费，享受丰富的市场信息，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留意历史，也没有时间关心文化了。人变得麻木，只有现在，没有将来，这就很悲哀了。

不要以为文化无声，尤其是一些在生命深处生根的文化，始终主宰着历史。唯有不忘历史和不断对生命进行深刻反省的人，才有能力看见那无声的力量，知道有些重要的力量在运转中。所以，我们不必去凑热闹，被政客和传媒挑动神经。你要凑热闹，哪里还有比风水师去争别人一千亿遗产来更热哄？传媒长篇累牍地去追寻这些新闻，难道香港人的品味就是如此？若香港人的品味变成这样，这些声音就变成最大的了。至于有关我们的历史文化问题、传统价值问题，乃至香港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人类未来问题……哪里还有市场呢？传媒都不注意你，有声音等如没有声音，因为大音不入里耳。

法住的工作，就是“没有声音”的一种。二十多年来，我们努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古，贡献于今，目的在证

明这一古老文化仍有生命力。它的生命力不在课堂，供人研究，学术辩论，而在我们的生命中。只要把它开发出来，那就是最坚忍的力量，对你的人生有莫大的支持。历史不会埋没一个文化的智慧，但总要有人顾念和承继。在方法上，首先要深入生命，对自己的性情有所体会；在态度上，则要作超越的涵盖。即是说，要对各种理论如实了解，不作先设，不会排斥任何一家的观点，也不会排斥现代有价值的文化。要有这种超越的涵盖，我们才能公平、公道地替历史做出决定。至于决定的深浅问题，则要看学者自身的功力了。

### 三、“五四”的转向——从学生爱国运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转为新文化运动

再说回“五四”。首先，我们如何解读“五四”？该如何为“五四”再定位？在替“五四”定位之前，我们知不知道“五四”是一个怎样的运动？

前述我那两篇文章都一再指出：五四运动至少可从四个方面看：第一、这是一个学生运动，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当时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十三所大学的学生自发游行，抗议巴黎和会的强权勾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虽然没有直接派

军参与欧洲战场，但却派出了二十五万华工到欧洲，替协约国军队挖掘战壕及做后勤工作，所以我们亦参与了对德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在巴黎开会，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出席，但列强与日本勾结，将德国在中国的利益转让给日本，无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利及尊严，简直就像战败国一样，要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当时国人得悉，无不气愤。参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力争不果，北洋政府段祺瑞意欲妥协。消息传来，就在当年的5月4日，大学生的情绪爆发，演变成一场激昂的学生示威游行，得到很多市民的响应。但这个学生运动，很清楚是一个爱国运动，正因为学生爱国，出发点完全是为民族、为国家，这是一种很可贵而无私的行为，所以唤醒了很多人。

巴黎方面，当时赴欧洲的华工还有很多尚未回国，便连同当地的华侨包围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又去各方请愿。美国总统威尔逊出席和会时，他们就去请愿。虽然当时美国总统没有接见他们，但也收了他们的请愿书。那就是说，一旦行动起来，就不只是中国、不只是北京的学生，还有全世界的华侨，包括东南亚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美国，都纷纷集会，声援中国代表。虽然顾维钧最后没有

签约，但这和约最后仍是秘密通过了，无视中国的反对。各国联手恃强凌弱，对我国如此不公平、不公义，引起了中国民众更大的反感。

这是“五四”的起因，这是一条导火线，由学生运动变为爱国运动，对外则再变为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为什么要反帝国主义？因为他们都想灭亡中国，将中国瓜分，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当时威尔逊被称为“好人”，原来也是如此虚伪，令人反感，所以“五四”反帝国主义是必然的结果。“五四”是一场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五四”的第二个特质。

正如刚才所说，“五四”是一个民族运动，爱国就等如爱我中华民族。当时，参加抗争的不只是学生，还有教授、知识分子、市民、工人、商人；也不限于中国各地，还有华侨，如新加坡黄包车夫拒绝为日本人服务，码头工人也不替日本轮船卸货，商店不卖日本货，日本货都拿到马路上烧毁。全世界华人都声援这一爱国运动，轰轰烈烈；也都受到当地政府的镇压，如香港和新加坡的示威者都受到英国殖民政府镇压，有很多流血事件发生，更证明了帝国主义的横蛮。大家都感觉到，中国正面临覆亡的命运，所以全民族必须动员起来，拯救中国。

尽管辛亥革命成功了，但中国的封建体制没有改变过。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之间发生了几件事，首先是袁世凯搞帝制；然后张勋复辟，将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再捧出来，想恢复清朝的大统，结果短短十多天就被肃清，变成一场闹剧。袁世凯的改制、称帝，张勋复辟等事件，令国人一再失望：何以大局无法扭转？为什么中国人的思想还那么陈旧落伍？封建王朝在历史上应该早就过去了，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没有人再搞帝制了；中国却仍有人想当皇帝，做这专制、独裁者的大梦。这即是逆潮流、反民主。辛亥革命已经成立了共和国，本质上中国已经是民主政体，为什么还会开倒车？虽然“五四”没有明确喊出反政府的口号，但已经要求国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谁是国贼呢？那就呼之欲出了——不是政府的几个头头还有谁？自从袁世凯死了之后，由他统领的几个大军官，如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等人纷纷割据一方，造成军阀混战，中国陷入分裂的局面，令人觉得封建制度仍然存在；然后再看民间社会，家族制度仍然存在，仍然讲那些“三纲”、“五常”，仍在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这些陈旧的道德。中国的改革让人太失望了，究其原因，是中国人的思想真是太陈旧了、官僚太腐败了。所以“五四”的知识分子要进一步清除传统的制度、传统的家族观念、传统的道德、传统的文化，就必须



在思想、文化上进行更彻底的革命，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胡适等人提出“中国文艺复兴”的原因。传统道德的具体表现就是礼教，讲“忠”、讲“孝”，讲“尊卑”、讲“身份”。就是这些东西，把人束缚得死死的，如鲁迅所说，这些都是“吃人的制度”。旧的礼教被批评全是腐朽的东西，全是中国新生的障碍。所以要改革就要反传统、反封建，要反传统、反封建首先就要反礼教。

鲁迅在他的第一本小说《狂人日记》中，借主角的口来说：他读中国书，中国书中篇篇都说忠孝仁爱，但他在忠孝仁爱中看、看……看了半天，就在那些字缝之间，竟看出“吃人”两个字来。这根本就是“人吃人”的文化，所以鲁迅借他的小说来攻击旧文化、旧观念、旧礼教，风靡一时。陈独秀也出来讲这些话，说“三纲五常”消灭人的个性：首先“君为臣纲”，就令臣子的独立人格丧失；“父为子纲”，就令儿子的独立人格丧失；“夫为妻纲”，就令妻子的独立人格丧失。从此人们就丧失了自己，丧失了自由，也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变得没有个性。<sup>[1]</sup>人怎能没有自由呢？所以一定要解放个性，要解放个性，就一定要攻击与这些封建礼教与封建制度。自由、民主和忠孝仁爱的旧道德一定不能两立，所以一方面要讲“德先生”、“赛先生”，另一方面要反传统、反封建、

反礼教。反传统、反封建、反礼教是五四运动的第三个特质。

反旧是为了开新，能够迎入西方的新东西。所以五四运动的第四个特质、就是要迎入新文化。讲得好就是推动新文化、建设新文化，例如“德先生”、“赛先生”就是新文化，能够使国家富强起来的新文化、使中国独立的新文化。为此，我们必须接受西方的新观念、新价值。这就是五四运动所引发的文化争论：究竟中国传统文化还有没有价值？

#### 四、盲目反传统——“五四”中人的卑弱与冲动

胡适在1920年写过一篇文章，说要重估一切价值：旧道德必须重新评估，孔子的地位也要重新评估。<sup>[2]</sup>

“重估价值”本来是西方尼采的话。尼采讲超人哲学、超人意志。他说，人要成为超人，在超人的强力意志之下，一切西方传统所说的价值，包括宗教的价值、道德的价值，都要重新评估。其实，尼采是在反基督，认为基督教令人懦弱，散布“奴隶的道德”，把人奴隶化。所以尼采说，我们不要做奴隶，我们要做超人，我们要将自己的意志力发挥出来。超人靠什么成就？就是靠他的强力意志，就是“the will to power”，以冲破一切旧文化的藩篱，把这些旧东西、旧价值，

全部要打碎，这叫价值重估。尼采这哲学是以超人的强力意志为背景的——世界上只有一种价值，就是超人的价值，连上帝也要超越。上帝比不上超人，这是尼采的讲法。

不过，对此，胡适当时只是一知半解。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重估一切价值的根据是什么？他只是为反传统而反一切价值，他自己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

胡适如此，其他主张西化的人亦然：什么自由、民主、科学，每个人都只是一知半解，只觉得人家富强，比我们进步，他们的东西，就自然是最好的了。说穿了，其实是患了严重的自卑症，这个病，到今天还没有医好。不过，说来也是难怪的，因为打不过人家，不服气起来再打，再打又再输。输了之后服不服？不服也不行，已无力再战，结果又割地、又赔款，屈辱条约一大叠。最后连日本人也打不赢了，天朝大国的形象，终于彻底破碎。

甲午战争前，中国辛辛苦苦学来洋务，建设了北洋陆军、北洋海军。但甲午战争一役，竟全部被日本打跨，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海军提督丁汝昌逃回威海卫；陆军在支持朝鲜之战中，由叶志超领兵，在平壤一战也大败。海陆两路辛辛苦苦建立的新军，全部不堪一击。洋务运动购买西方的战舰，建设“汉阳兵工厂”，自己制造新式武器，自己练兵，

但结果如何？

在中国人眼中的小日本，一直靠中国文化乳水长大，居然也敢反过来向文化母国挑衅，然后打败我们，这真是莫大的耻辱！日本人的胃口也很大，要我们赔的钱，比英、法还要多，比之前的几场对外战争所赔的总和还要多，是四亿五千万！按中国当时人口约四亿计算，即每人要赔一元，约相当于今日不论老少，每人拿近一元港币出来。中国不贫穷才怪！

经历多次战争，中国都要割地赔款，中国将亡国，危机已在眉睫。怎样才能救亡呢？唯有先学西方，但之前学西方学不得其法，因为只是学技术，购买别人的装备设施，这是不行的，我们欠缺的是制度——辛亥革命后，共和制度总算成立了，结果又怎样？可见，学空壳是没有用的，原来在中国人的思想底层，仍然是一堆陈旧思维，就是“三纲五常”之类的东西，仍然是要有皇帝。封建落伍，所以“五四”中人认为，我们一定要把旧思想清除，才能救中国。正是这原因，反封建、反传统，最后反孔子，批判儒家。因为人人视孔子是“教主”，当然找他来开刀。所以当时有很多人批判孔子，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都在其中。还有吴稚晖，说要“把国故的臭东西丢进茅厕三十年”<sup>[3]</sup>。后来吴虞出论文

集，胡适替他作序，还说他是个“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sup>[4]</sup>，于是“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出来了。

## 五、新文化运动下降为白话文运动

“五四”的意义在哪里？

其实，很多口号都是胡适未经深思熟虑而随意写成的，什么“重估价值”、“打倒孔家店”、“中国文艺复兴”，等等。胡适也是一个颇为激进的人，但相比起陈独秀、吴稚晖、钱玄同、李大钊等人，还差一截。胡适最先也是反传统，不过他的学术底子却是清代末年的乾嘉学派，即做考据。他去美国留学，多少学了些西方思想回来，所以回国后就介绍实用主义、杜威哲学，也赞成美国的自由主义。他可以算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的学问底子却是考据。他研究《红楼梦》、研究禅宗史、替神会翻案，全部都是考据。他本来是史学出身，他自己说：在他眼中，一切都是历史材料。其实，他不懂思想义理，也并不真懂禅学。不过他曾经越洋留学，视野比较开阔；正因如此，胡适的看法慢慢就与陈独秀等人不一样，没有陈独秀那么激进。胡适说，国家的羞耻不在于打败仗，“打败仗固然是国耻，但真正的国耻是我们没有图书馆、

没有博物馆，这些才是真正国耻”（大意）。<sup>[5]</sup> 我们要把西方的文化搬过来，这和陈独秀相比，可以说是深了一步。不仅在观念上讲“德先生”、“赛先生”，还希望将西方文化的内涵也移植过来。胡适的最大贡献可能是白话文学，他希望“五四”变成中国的文艺复兴，这就首先该用白话文来写作。这文体的革新，就变成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因为反传统，连带反旧文学，许多人认为古书的文字难读，阻碍文化的传播。有些人甚至主张废除中国文字，如钱玄同，他的态度比胡适更为激进。为了推动新文学，胡适主张“我手写我口”，不必像传统诗词那么典雅，所以胡适自己也用白话文来写新诗，但写得非常浅，根本不像诗。他没有办法，只好叫做《尝试集》。

胡适是个开风气的人物，所谓“但开风气不为师”。在这方面不能说胡适没有贡献，但他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理解为白话文学运动，这就大大削弱了“五四”的意义。新文化只着眼于语言，就不免捉错用神。语言当然很重要，写文章用土话、用俗话、用白话来表达，的确令人耳目一新。道理很简单，香港传媒已经深懂此理。香港的报纸，近年已经渗入大量的土话、俗话，但读者就是觉得很亲切、很传神，青少年尤其觉得有味道。但另一方面，文章的质量就会下降，社



会文化就会愈来愈肤浅。凡事总有一个量度，过分就会走向极端，最后一定是整体受害。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使用白话文的问题，而是避免语言走向庸俗化、低级趣味化的问题了。

语言作为载体，一定要顾及它所承载的内容，这就进入思想层次。有时意在言外，须要读者自己体认，意义亦随使用者的程度而加深，所以不是一般的语言能表达的。如“市井文学”、“街市文学”，无疑是浅白，但余韵不多。像拍黑社会片，你拍那类片，当然就要讲这些俗话，包括讲粗话、脏话。但“文化”不只是这些，文化有很多不同的层次，思想亦有很多层次，表达起来就有不同的概念，需要作细致的区分。白话文学不是不好，而是不能一味向下认同。文学是精炼的语言，没有思想怎能铸造新境？

胡适的问题就是思想力度不足，但他毕竟是一个敢于创新的人物，能够率先提出白话文学，毕竟有解放语言之功。但若说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尚谈不上。

## 六、学步西方——“五四”精神的夭折

文化要有内涵，要有深度，要经得起考验，老实说，从

“五四”至今八十多年，这个使命真的还没完成。不但未完成，还夭折了！

回到文初所说：我们该如何去解读“五四”？如何去替“五四”定位？然后再问：“五四”的使命是否已完成呢？

依上文分析，“五四”至少有四个面相：

第一，“五四”是学生运动、爱国运动，或者学生爱国运动；

第二，“五四”是民族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

第三，“五四”是反封建、反传统、反旧礼教的社会文化运动；

第四，“五四”是迎入新观念、迎入西方文化、迎入西方价值的运动，也是中国文化要求自我改造和自我成长的运动。

在此意义下，移植西方文化并不是从“五四”开始的，而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但学得不好，就变成邯郸学步；相反，如果学得好，则是建设新文化，成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现在看起来，这条路至今尚未成功。为什么？因为自我成长包括自我改造，太难了。“五四”时期，大家对西方和对自己都了解不足，议论莫衷一是，怎能达成共识呢？

因此，有人认为，中国人还需要“启蒙”。因为中国人的思想太落后了、观念太陈旧了、行为太愚昧了、政治太腐败

了，所以要启蒙。“蒙”者，是一种无知、幼稚的状态，原出《易经·蒙卦》，“蒙”用来譬喻小孩子的天真，所以要好好教育他。《易经》讲“蒙以养正”，即教以正道，使他的心志健康成长。可惜现在的教育完全不懂《易经》此义，教育只是灌输知识，追求技术。大家都说香港的教育制度很失败，其实何只香港，全世界都有教育危机。世界各国都要教育改革：美国、日本、中国、新加坡……大家喊了十多二十年，明明没有成果，却不敢承认失败。中国台湾还有些勇气，负责台湾教育改革的那一位是知识分子，曾得过诺贝尔奖的李远哲，还有些风骨，敢站出来公开承认台湾教育改革失败。香港则死不认错，继续改完又改，弄得怨声载道。不承认失败，那就更失败了。你让一些不懂教育的官员去搞教育，当然不会见效。官员不懂中国文化，中国是教育的大国，孔子是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家，世所公认。但“五四”以来，中国人都忘记了孔子，竟然不知道孔子的教育贡献，真的很不肖、很愚昧！但有什么办法呢？体制就是如此，现实就是如此，难怪有些家长不愿意送孩子上学，宁愿自己在家教导。不过政府认为你违法，剥夺了孩子受教育的权利，要吃官司。结果父母连教育自己孩子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只好眼睁睁看着孩子被社会污染……不过这是题外话，与“五四”的启蒙无关。

“五四”的“启蒙”是由当时的左派分子陈伯达提出来的，还有艾思奇、何干之，都是左派的理论家。他们讲启蒙，是想借用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影响力，以打倒现行体制，方便武装革命。最终目的就是夺取政权，为政治服务。

但启蒙这个字，是借来的，西方叫“enlightenment”，原来是继承16世纪文艺复兴的路线，提倡“人的解放”，开发我们的才情，开发我们的理性，重视人自身的力量。这个力量是理性的，理性是提供真理之光的，只要大家以开放的态度，作理性的交流，就可以提升人的思想品质，看到人的优雅和高贵。法国的启蒙时代，有很多“沙龙”，一直都很出名，就是供学者、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在那里高谈阔论的地方，主持人往往是一些“名女人”。她们空闲、富有、附庸风雅，借出大客厅供大家聊天。参加者在这里得到表现机会，然后写文章，影响一时，其中很多舆论，就在这里制造出来。这一群人可以说是时代的精英，喜欢自由思考。从文艺复兴的才情解放、性格解放，进一步将人的思想解放，所以继续下去，是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的兴起。浪漫就牵涉到革命，把热情投向理想、投向行动。法国大革命的产生，和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很有关系。

法国的启蒙是尊重理性，虽反教会，但不反宗教，所以

不能说是反传统。它只是反专制、反压迫，核心在争取人的自由。

这便和“五四”的“启蒙”不同，“五四”的“启蒙”暗示当时中国的落后、愚昧，需要觉醒，需要用西方的观念来启蒙我们。这就很有误导了，无异要宣判中国文化死刑。其次，当时宣扬启蒙的目的是想打倒中国的现有政权，走向新的革命。这是别有用心的提法，与法国启蒙的理性精神根本相异。所以有人——如美国的余英时教授——把它看作为一种“伪装的政治方案”<sup>[6]</sup>，讲到底只是借用。

明白此义，“启蒙”就没有人再提了。后来左派有文件下达说：“启蒙”不要再用；还说：“别人用是别人的事，我们不用。”王元化后来有篇文章提起这件事，还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许用。<sup>[7]</sup>道理其实很简单：中国革命与西方的启蒙运动根本不是在同一条线上。中国革命讲阶级斗争，不是弘扬理性。

## 七、谁能掌握历史主题？

中国近现代的悲，与“五四”的变质很有关系。“五四”本来是一个很单纯的爱国运动，但慢慢被政治化了。爱国不

能停留于口号，必须有行动；爱国也不能止于游行示威，必须要求上下一心的改变，发愤图强，要求中国精神之再生，于是想到引入“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也就是我所说的第四个面相，要迎入西方价值，自我改造。但第四个面相不是那么简单的，里面还要有很多分疏。至少，除了接受德先生、赛先生及西方价值之后，还有什么？是新文学运动吗？是新文化运动吗？那“新”在哪里？一味移植西方价值就是新文化了吗？把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彻底改造之后，就是新文化了吗？完全抛弃中国传统，就是最适合的方法了吗？在此，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思考，无数研讨会开过后，无数文章发表之后，但还是无助于“五四”精神的发展。事实是，新中国建立，整条路线都不同了。

有人认为“五四”后来之所以走向武装革命，是因为“救亡”。“救亡”是历史的主调，其他观点只是变奏。这就是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取代启蒙”说。从历史形势来说，这个讲法很有道理，这的确是继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后，百年来的历史主题。孙中山讲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sup>[8]</sup>，目的也是为了救亡图存。当时中国已被划分为列强的势力范围，这样下去我们真的会亡国了，亡国灭种。整个中国被列强瓜分：英国占据长江流域，德国占据山东，日本占据东北，法国从

越南一直觊觎我们的南方，英国通过印度、尼泊尔渗透到西藏，连俄罗斯也伸手入中国的新疆及东北。烽火四面，危机处处，所以当时的形势的确非常危急。

在这危急的时候，有什么力量救中国？叫自由民主来救中国，有可能吗？一人一票选举，能进行吗？这些根本不可能。各种势力不断争吵，亦即不断内耗，所以唯有革命，建立新政权，统一行动，集中力量，中国才不会亡，中国才有机会在世界各国中，仰首伸眉，以得一平等的地位。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从“五四”至今八十八年，中国命运都是环绕着这一主题开展，就是救亡，就是中国要独立，中国民族要解放，中国要在世界各民族中占回一席位。我们不要欺负别人，但至少不可被别人欺负。更简单的说法，就是中华民族要生存，要活下去！

但什么叫生存？是否有饭吃那么简单？如果饭是别人施舍给你的，你吃得下吗？这种生存是生不如死：别人给你一碗饭，把你当成狗，所谓“嗟来之食”，有自尊心的人当不会接受。生存要有意义，生存要有尊严，所以生存一定要包含民族的独立。但民族的独立，一方面要有实力的支持，要有军队作后盾，还要有经济力量才能养兵、发展国防；另一方面还要有深厚的文化，以哺育我们的灵魂。这就不能反传统，

反而必须借重传统的力量，以培植民族志气，有爱国心，有使命感，这才能发出强大的力量。

《义勇军进行曲》不是这样唱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太危急了，我们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去思考别的问题，静下来了解自己、了解别人了。只有救亡才最重要，其他都是“远水”。所以，我们没有深思的机会，去了解自己，问自己为何走到这一步，中国几千年历史为何落后？只是因为家庭制度和政治制度那么简单吗？日本也没有废除帝制，为什么国力很快就可以提升？可见其中还有更深刻的问题。进而了解别人，问西方何以能现代化？靠什么条件？靠工业革命吗？靠民主政治吗？但工业革命和民主政治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此中还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非中国所能具备。但日本又为什么那么容易学到西方的东西？有人说：中国和日本不同，日本的文化是从中国移植去的，他们没有什么传统的包袱，反正都是拿来用的，要改便改。而中国则是祖宗基业，三皇五帝，盘根错节，如何说改便改？何况此中的确有真正的价值在！这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在生死关头，涉及到一个很深的心理问题和哲学问题：人不能只讲利害得失，只讲现实；人要有尊严，人要对自己的存在有承担。所



以忠臣孝子，就是要守节，就是要尽我一种形而上的本份，决不向现实乞怜，这才见到生命的庄严，由此才有一种精神力量产生。以此为源，才能开天辟地。

其实，知识、技术、财富这些都是后天条件，要学不难，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不是都学到了吗？但不可将之提升为最高价值。能将此义讲出来，我认为才是中国文化的智慧所在。问题是，当时国人屡战屡败之后，心理上已变得很卑怯，“五四”知识分子又很急躁，只有热情而不冷静，急于救亡，哪能这样认识问题呢？中国的教育已经没有了，哪能产生坚贞的、信守自己文化的人格呢？而现实中的中国人，即当时的旧官僚、都市文人、农村地主、乡绅，又活在传统的积淀中，根本没有创新的头脑，不但不能成为时代的领袖，反而成为改革的阻力。

若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很明白，当时根本没有时间：“五四”之后，军阀混战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社会乱哄哄。日本在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接着就是抗日战争，然后世界大战，最后内战。在连年战争之中，文化问题只好放下，因为战争关乎生死，必须集中资源，集中力量，先作战斗的准备，所以革命成为最重要的时代主题。上文说过，“救亡”的含义就是“革命”。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事业，由共产党来完成。

国民党讲革命，共产党也讲革命，但国民党革命分裂出许多党派，许多利益团体，如四大家族、军统局、蓝衣社，奉系、桂系等各地军阀；共产党则讲统一战线，团结各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毛泽东深谙斗争之道，不打无把握之仗，革命一定是将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决一死战。这时候就要统一战线，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唯一的价值就是革命的价值，即建立新政权的价值。从救亡到革命，成为世纪主题。毛泽东的了不起之处，是看通历史，很清楚中国人内心的要求，所以他把这个主题握得很紧：中国人就是要救亡，中国人就是要民族独立，要在世界上生存下去；所有力量都用在这一个地方上，其他不重要。这一主张立即得到很多人支持，所以革命成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不是讲共产党站起来了，而是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全世界的华人都十分感动，因为他们等了一百年，从鸦片战争到抗战胜利，等了一百年就是等这一句话。所以很多人都流泪，很多海外知识分子都纷纷回来参加建国，就是这原因。建立新中国，这是世纪主题，只要救亡成功，其他的都可以放下。

历史是有轨道的，历史也是前车可鉴的：春秋时代思想

解放，百家争鸣，形成几个大学派。最后谁能统一天下？是法家。法家主张独裁思想，帮助帝王建立无上权威，其他各家根本不是对手。在此之前，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答曰：“定于一。”这个“一”字，极有深意。天下不能长期分裂，最后必须统一。儒家以仁政来统一，很理想，但不现实。人不能放下私心，不能超越地涵盖各种价值，只有争论不休。所以法家专心训练耕战工具，以实力取天下。本来，蒋介石也曾经推崇过德国法西斯主义，说什么“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领袖”<sup>[9]</sup>，但他无能做到，反惹人批评。这是领袖的人格问题、修养问题、眼光问题、功力问题，也是对历史主题的掌握问题。

## 八、民族独立抑或民族自杀？

总之，那个年代有很多变奏：有自由、民主、科学，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有国家主义、有国粹主义、有改良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超人哲学，和各种的革命思想。究竟中国应该往何处去？这些都不是主调，主调就是救亡，就是建立新中国。其他只不过是工具，觉得有用就拿过来，完全不知道其文化背景，也不知道是否适合我们的国情。随便拿

这些观念来改造中国，所谓“拿来主义”，如此急功近利，如此肤浅，最后当然弄得非驴非马，一片混乱。这样的态度怎能救中国呢？所以，革命成功，新中国建立，这些混乱也就结束了。“五四”精神所追求的民族独立，至此告一段落。但是，依“五四”的内在要求，则不只是民族独立那么简单；“五四”的心愿，是希望中国重新强大，回复往日的光辉。我们不要称霸，但至少要在世界民族中，获得一个公平的位置，也让我们的文化，能得到别人的了解和尊重。

必须指出：“五四”的这种要求，是正当的。民族独立，是第一步，但这个独立，是用什么来支持的呢？用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吗？用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吗？用马列主义、用阶级斗争吗？老实说，这些都不是我们固有的东西，都不是我们的根。我们不是要盲目维护传统，而是要继承传统，推进传统；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是抛弃自己的传统的。不管我们的传统有多少缺点，它仍然是我们的传统，仍然是我们民族的根。不能因为西方的科技进步，我们就尽弃自己所学。这也就是说：学习西方，不能只出于功利的目的，不能因为它生产力先进，就向它膜拜。有人把西方科技看作这个时代的新神，那是他们无知。生命的最高价值毕竟是精神价值，而不是物质价值，我们不能因为物质的享受而牺牲

精神、牺牲人格。“五四”时代由于对文化认识不深，看到西方“船坚炮利”，自己的志气已弱了一半，结果“五四”的爱国，要求现代化竟然是以打倒自己的文化为手段，十分荒谬。“五四”精神推进的结果，为了“救亡”，竟然是先砍断了自己民族的根，做了自己文化的不孝子。这不是很颠倒吗？

一个民族要独立，绝不能以毁灭自己的文化为代价。郭沫若写了一首新诗，叫《凤凰涅槃》，取佛教“涅槃”的意象，表示中国彻底死亡才可以新生，这是文学家的浪漫和空想。中国文化若死了，凭什么可以新生呢？靠西方文化吗？用西方观念来改造我们自己吗？中国人变成洋人就可以新生吗？这样，最后我们就不是中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耻辱。

## 九、民族独立不能离其民族文化

世界上有许多民族，他们也在争取独立，但没有一个说要先毁灭自己的文化，反而会对自己的文化珍而重之。你看英国如何保留他们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美国如何成为新教国家？德国如何争取他们的统一？法国如何热爱她的法兰西？即使是那一位讲“文明冲突”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

顿 (S.P.Huntington), 也感觉到美国现在面临挑战, 有必要提高美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感。他的近作《我们是谁?》(*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2004), 便是要为美国人找回自己的身份。从最先的新教文化到今天的民主、平等、自由, 如何成为美国信念, 也就是美国人所崇尚的价值观。由此可见, 一个民族的独立发展, 是必须以其固有文化为内核的, 这其中必有其独特的智慧与文化创造, 否则不会在历史长河中过了一关又一关。正如中国《易经》启示的忧患意识: “作易者, 其有忧患乎?” 周文王就是以此精神, 完成整个《易经》体系性的思维, 以传给子孙, 为的就是整个周民族的生存。正如我们的机构叫“法住”, 我解释过: “法”是规律、“法”是秩序、“法”是真理、“法”也就是一切文化的核心概念, 所以“法住”就是文化的永不死亡。<sup>[10]</sup>基本上, 这就是一个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承继精神和承担精神。张载所谓“为往圣继绝学”, 在内容上它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获取, 但它的本根, 则在每一个人的生命身上。孔子将之称为“仁”, 孟子称为“性善”, 概念并非第一义, 最主要的就是能对生命有此发现, 然后有教育后人自我发现的方法。这些方法都不简单, 不能像西方传递知识般以客观概念传达, 而只能启发。所以, 在中国教

育里“生命成长”的方法有其独特性，强调教者与学生两人之间的心灵交流。《易经》称为“感通”，其实是让对方有一个自我体验的机会。生命的秘密不能尽说，而只能自己发现。西方人由于重视理性，概念的传递必须准确，所以要反复沟通，把不清楚者厘清为清楚，这样才能保证知识的客观性。但“生命成长”不是这样，精神虽然内在，却有超越性，非经验语言所能表述，而只能自己感受、自己体会、自己开发。总之，儒家所言之超越之性情，有其真实性。但这并非说，唯中国人独有，而是孔孟之智慧首先发现之。正如西方人之知识理性、思辨理性，亦非西方人独有，但却以西方人的贡献为大。通过这样分析，我们就知道民族与其文化相连；文化才是民族生存下去的支柱，也是一个民族能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的根据，只有爱惜，怎能自我摧残呢？

其次，文化不是物品，它从生命流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地与环境、与时代、与其他文化相摩相荡的发展过程，“五四”中人只认识社会生活文化习惯性、风俗性和操作性的形式要求，亦即礼教的僵固性的一面，与现代生活不协调，便大加攻击，连礼教所代表人要有修养的精神涵义与化解本能的文化意义也一并打倒，这就是错认了，而且肤浅，根本不能深入中国文化所代表的生命教化、变化气质的大义，只看

到西方强大，便立即低首下心，自卑起来。这是一种病态心理，由清代晚年的积弱所引起的扭曲，不能平情探讨双方的优劣长短，也不敢向对方挑战、批判，于是转过头来埋怨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小孩在外面吃了亏，便埋怨父母保护不力，把怨气都发在父母身上一样。

其实，若真有志气，何须如此？西方知识、技术、生产力有办法，我们大可承认他们的优点，然后加以学习，便可以了。这些都是工具性的东西，无须抗拒，甚至民主制度、甚或人权，也不是洪水猛兽，也不必恐惧。大凡一种文化，在历史中能出现，而且受到欢迎，一定有它的智慧和道理，好好研究、好好吸收，不见得它会和我们崇尚人格、修养的君子文化有抵触，反而可以相成。我个人曾提出优质民主的构想，认为历史发展到今日，西方民主已经毛病百出，社会素质不断下降，政治已无人才；一味强调经济实力，却置社会素质败坏于不顾，经济也不会健康发展。反而中国开放，历史给予中国一个机会，去反思和带领未来人类走出困局<sup>[11]</sup>。我的理由很简单：我看到西方的民主制度只不过是一个机制，只提供改变机会；若真要改善，那便要看参加者（投票者）的整体素质，而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们能保证他们的素质向上吗？当社会文化无力、教育失败，整体素质也会下降。



民主有什么用？最后一定争吵不已。各为私利，一定每况愈下。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有机会思考这个问题，及时面对，也许可以创出一个优质民主的政治制度。

## 十、真正的救亡——畅通中国文化的血脉

不过，这些话说远了。我之所以说这些，是想证明当日“五四”的文化运动未能真的在文化方面深入，只停留在感觉阶段、情绪阶段、喊口号阶段，至今八十多年过去了，能够有寸进吗？

人习惯看表面，而看不到无声的东西。鲁迅诗：“于无声处听惊雷”，文化就是无声，但已经在那里蕴蓄着。一般人要等到雷响，才知道有事发生。但研究历史文化、研究思想变动的人，很早就知道了。因为现实的问题尚未梳理好、社会矛盾重重积压，就一定期待一个更合理的秩序出现。物极必反，《易经·复卦》所谓“反复其道”，《易传·彖传》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不是迷信，而是历史变动的常道，有此慧识，就能够守住有素质的文化，而不会临阵脱逃，或出卖自己的理想。“五四”之后，中国其实是有一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可称为“新儒家”，虽然人少，从梁漱溟、熊十力，到

流亡到香港、台湾的几个传薪者，包括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坚贞分子，也是当代硕果仅存的大儒。他们在困顿的生活中，仍能不屈不挠地发出呼声，写出极有深度的、平章中西文化的巨著，包括有名的《中国文化宣言》。香港其实很了不起，不是因为它有活力，产生许多企业家、大商人，而是伸出屋檐一角，荫护过这些人物，使中国文化的传承，不致断灭。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救亡，也是更有深度的救亡。无论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社会主义、国粹主义、新儒家……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下，大家都在做救亡工作，做什么都不过是药方。不过救亡要有深度，要分层次、要有缓急，不能一概而论。救亡既是世纪主题，就不能不深化。为了中国的新生，无数人奔赴前线，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毛泽东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是革命的豪情，号召大家不怕死、不怕牺牲。的确，当时投身革命的共产党员都有一种奉献精神，就是不怕牺牲，吃苦在前，享福在后，正如范仲淹《岳阳楼记》里面的句子：“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忧患精神，从《易经》之后，中国的读书人一直有这种精神。

忧患精神虽出自《易经》，具体提出，则是徐复观。由忧

虑民族之死，进而忧虑滋养民族成长之文化之亡，于是由民族意识、历史意识，提升到文化层次，知道唯有守住我们的文化，民族才有生机。我认为这是真正继承“五四”精神之道，从爱国到爱护自己的文化，发掘其中精义，以与世界文化交流互动；发扬我们的殊胜之处，以贡献给未来社会。这比我们在政治上拥有国家主权更有实质意义。

## 十一、国格——中国立足世界的真正根基

我们立于世界，拿什么来跟别人交流互动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靠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吸引外资来设厂吗？世界的许多中低档产品都是中国制造，我们已变成世界工厂了，赚取了不少外汇，因此国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国际地位也得到改善，“五四”的某些目标（爱国、提高国家地位）开始达到。但这些优势不是永远具备的，一来中国还没有自己的优质产品，还没有具备真正的竞争力；二来经济发展，全球竞争，成本一定不断上涨；三来目前单靠出口，仰人鼻息，缺少主动权；四来参与国际贸易游戏，须遵守全球规则，文化和价值观念也会向西方靠近。这样下去，我们在精神上将逐渐沦为别人的附庸，反过头来也会增加自身的矛盾，导致

社会紧张。中国前途何在？这些都是严峻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目前尚未完全浮现，但已初露端倪；如不早为之计，我们将重蹈“五四”覆辙，即中途转向：当年是救亡，今天则逐渐变质。最后还是有负于“五四”的初衷，不能不令人忧虑。

“五四”点燃了我们的爱国心，但爱国心不能只局限于民族主义；争独立、争主权，还要有国格、有文化。像现在中国开放，邓小平鼓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推行“社会主义的自由市场”，的确是有了成绩。但开放政策提供了市场空间，许多人为了赚钱，变得什么都敢干。你看近年中国内地产生多少冒牌货、假货？国外的名牌，如LV手袋，固然有许多人假冒，但生活的廉价物品，也有假货，如鸡蛋、腐竹、豉油、发菜、药品……至于首饰、古董、艺术品……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变成了假货天堂，你想这样对中国的声誉伤害有多大？中国人做生意一向以诚信为本，所谓“童叟无欺”、“金字招牌”，非常自重，这正是中国的儒商文化，但为什么从晚清到现在走了一百年，变得全无操守了呢？失去了灵魂，有钱有什么用？失去了民族文化、失去了做人的起码的道德原则，变得唯利是图，社会就会很虚无。你可以说这是资本主义、市场文化的腐蚀作用，但我们自己应有智慧。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部分官员贪污，而且存在执法不严的

现象。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人都懂得钻空子、走后门；结果利之所在，什么都敢干。我曾听过一句顺口溜，品评各地华人，是这样的：“香港人无情，大陆人无法，台湾人无耻，新加坡人无知。”这几句说得非常刻薄，是不是这样？很值得我们反省。中华民族走到这一步，也太可怜了。

我们当然不会承认这几句话是对的。但现实给人这种印象，为什么？是我们的文化死亡了吗？是我们讲礼义、讲修养的传统没有了吗？这样下去，中国人的素质将沉于湖底？有识之士，当然担忧。“五四”时代，为了救中国，攻击中国文化不遗余力，现在真的是涓滴全无了。我们拿什么跟别人酬对呢？我们难道就是靠别人的技术、别人的产品去和别人比吗？

文化可以交流，但不能一面倒地移植；生命可以使用任何外物作工具，但灵魂不能出售。何况，我们家有宝藏，为什么忘却了呢？我们不断地向西方邯郸学步，结果弄得非驴非马，有必要这样吗？

## 十二、历史正给予中国新生的机会

我们能把握吗？

时至今日，东、西方的气运其实已经有所转变。“五四”

时代极力推崇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到现在还有人将之奉为普世价值，还恨我们学习不到。但可知道时移世易，“德先生”已经百孔千疮。正如我在上文指出：民主只不过是个机制，它无法自我完善，真正要提升社会素质，还须要另寻动力。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虽然提供了经济发展的空间，但同样亦给人的私欲以膨胀的机会，所以是一柄双刃剑，利的反面就是害，过分使用，同样会伤害自己。1997年的金融风暴，和全世界的贪污——不要以为新兴国家的贪污严重，先进国家、民主已行之有素的社会，如美国、日本，同样有大规模的欺诈和舞弊——说明单靠制度监管已不管用。总之，一个制度行之既久，便毛病丛生。西方文化虽有光彩，但至今已“亢龙有悔”，我们对自己文化反省之余，对西方文化同样要有超越的批判，不要奉为普世之真理，亦步亦趋。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破除盲目崇洋的心理，并回到我们自己的传统上来。

为什么要回到我们自己的传统？这不是盲目爱国，而是由爱自己的国家，必进而爱自己的文化。这个理由，我们上文已说过：我们不能以任何外在的理由、功利的理由，去放弃自己的文化。中国民族要活下去，要赢得别人对我们的尊重，就一定是我们自己先无条件地爱自己的文化，因为那是

我们民族的生存的轨迹、奋斗之道，代代相承，已成为我们的宝贵资产，并铸造新一代的生命。所以中国文化就在我们身上，就在我们血脉里。失去了我们的文化，就等如杀死我们自己。所以这里没有任何理由，而只有一个形而上的理由，其真实须由我们自己体会。你体会到了，你就会捍卫这种文化，如同捍卫你的生命一样。在战争中，战士守土有责，为国牺牲，何等神圣！那么守护自己的文化，不也是神圣的责任吗？所以不须问理由，生为中国人，你已负有此责任。“五四”把民族和文化分开，更误以为保持民族，就要打倒自己的文化，现在知道错了，犯下弥天大罪，当然要悔过。

况且，人的思想不能真空。“五四”反传统、反孔子，后来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讲社会主义、讲计划经济，到今天又重新接受自由市场，接受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金钱挂帅，道德沦亡，往后怎么办？我们在西方文化的模式中团团转，把它们的问题全部承接过来，难道“五四”所要求建造的新中国是这样子的新中国吗？这样折腾下去，如何是好？我认为，我们不能再受伤害了。

关键问题，是我们的文化树立不起，失去核心。中心无主，就会向外寻求；精神没有出路，生命就会堕落。现在中国的社会问题非常严重，面对多重诱惑、本能泛滥，道德、亲

情、信义、诚实已全部置诸脑后，而教育又非常功利，只注重应试成绩，孩子们都两眼外望，钦羡别人成功，人生目标非常狭隘，又怕辛苦，将来如何承担大任？表面上，中国现在是富裕了，但内里的精神已被剥蚀。这是文化危机，但也是民族危机，再不挽救，空有一个美丽的物质躯壳也没有用。

### 十三、回归中国文化，重建民间社会

幸而，近年我看到民间有一些变化，就是国学重新兴起。这是从企业界开始的。中国近年开放，造就了一批赤手空拳打天下的企业家；他们读书不多，但敢闯敢拼，利用开放的机会创出了一片天地。但他们也知道，自己内里的资源不足，企业要有的生命力，就不能永远靠机会，必须自己有创造力，有持续发展、不断过关的能力。这从哪里找资源呢？只有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孕育过多少人才？赵普当年“半部《论语》治天下”，如你能善用，腐朽即可化为神奇，不必处处向西方借鉴。而且，中国人的企业，根本就该用中国文化来管理，这才适合国情。我自己在1993年，便在香港主办了一个主题叫做“东方文化与现代企管”的国际会议，邀请了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的许多研究儒、释、道的专家学



者发表高见。我相信这是同类会议的第一次，我不敢说对以后的国学热有什么标竿之功，但至少是开了风气。第二年，台湾成功大学亦召开同样的会议，渐渐由学术界影响到民间，许多培训机构、大学研究所，也办起专为企业家进修的国学班。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这样的班非常多，而且收费不便宜。我也参加讲学过好几次，发现这些企业家都很认真地学习，而且能灵活运用。

现在的问题是：这股从企业掀起的国学热能维持多久？政府和民间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此风不会吹多久，原因是中国文化已经从历史舞台消失了，不可能开倒车。但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不会死，中国人生命里流的就是中国文化的血，它将随着中国人的生命而永远存在，只要机缘成熟，它就会重放光芒。

我的看法，上面已表述过：一个民族对它自己的文化，不只是情感问题，还有历史问题、文化问题、智慧问题、眼光问题。我们通过对中西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作超越的反省，就可以知道彼此的长处、优点、智慧和局限。简单来说，西方是理性优位的文化，近五百年来他们这一支文化得到充分发展，科学、技术有大成就，这是知识理性和科学理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理性与功利主义结合，变为工具理性，处

处为满足利益而作筹划，就伤害了人的性情。在这方面，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恰恰相反。儒家是最重视人的性情的，孔子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最重要的，不是从外面撑起一套架子，表面好看，而内里腐烂，就什么意思都没有了。这是儒家极深远的生命智慧，它表明性善不是从经验层面归纳出来的，而是你自己对自己生命的体会；人能守住自己做人的原则，力量绝非从外而来。现在到了21世纪，不只中国，全世界都面临道德崩溃、人性堕落、互相怀疑、互相争斗，国与国、集团与集团、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非常多，压力已沉重到叫人不能负担的程度。传媒每天报道的负面新闻，令你感受到你不是活在文明世界，比野蛮世界还要糟糕。为什么？就是因为性情已死，道德和真善美圣都失去了基础。“五四”当年的危机是中国民族受欺压，所以中国人要自救；今天的危机是全人类的，不过中国已深受其害。要挽救人类唯有改变这种使人沉沦的文化，救亡不如先救文化。只有在教育上先树立这种性情为本的文化，才能有希望抵御生命成长过程中由外而来的扭曲。这一点，中国先贤、先圣的宝贵经验非常多；因为中国文化就是长于修养人的性情，培植人的道德人格。国学要真正热起来，它的“市场”不只在企业界，而是在广大的民间社会。只有重建民间

社会，恢复它的亲和力，让人间有情、有义、有信、有爱，人类才有希望。若有这种眼光，那么“五四”八十八周年，从反传统开始走了一圈，再回归传统，就非常合情合理、合时合机的了。

《易经·系辞》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人如果能有超越之思，那么对中西文化之争、古今之争、政制之争、是非之争，都不需要固执或偏执。善于体会“五四”精神，那么反传统即是复活传统，又有什么稀奇呢？

今天，我讲话已多，耽搁了大家许多宝贵时间，十分抱歉！我是因为感受到“五四”青年难得，爱国爱民，所以希望探索他们深隐的心愿，并完成他们的理想，而不是止于抗争。进一步，发挥“五四”精神，让这个轰轰烈烈的运动，有一个圆满的句号。

附记：本文为2007年5月1日在香港法住文化中心举行“‘五四’八十八周年纪念讲座”所发表之演讲讲词笔录稿。

注释：

[1] 参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2卷3号，1916年11月1日。

[2] 参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日。

[3] 参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出版。

[4] 参胡适《吴虞文录》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0月，原载1921年6月20日至21日《晨报副刊》。

[5] 参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为1929年12月26日光华大学中国语文学会讲稿。

[6] 参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五四新论——“五四”八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9。

[7] 参王元化《为“五四”精神一辩》，《“五四”多元的反思》，香港，三联书店，1989。

[8] 参《兴中会誓词》。

[9] 1931年间，刘健群为迎合蒋的意图，写了名为《改组国民党的刍议》的一本小册子，建议：“国民党仿效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的组织，一切惟领袖之命是从，其组成人员，以着蓝衣为标志”。次年3月，蒋令贺衷寒、康泽等在南京成立复兴社，在南京创办一个“政治训练班”，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敌人”为训练的纲领，毕业后等于黄埔学生身份，一律吸收为复兴社社员，备作军队政工的干部。

[10] 参拙著《法住于世》的自序。

[11] 参拙著《中国应考虑创设优质民主》一文，《新时代·新动向》一书收。

# 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

## ——“五四”八十八周年纪念讲话

### 新加坡场

非常荣幸能够在“五四”八十八周年纪念的今天，在新加坡跟大家分享我对五四运动的一些回顾和探讨。今天参加的人那么多，让我很震惊，也很鼓舞：过了八十八年，五四运动所燃点的火炬仍在，连远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也仍然关心这个运动。

#### 一、“五四”的起点：反对强权，伸张公义

“五四”的精神在反传统。但反传统并不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只是爆发点。从当时历史的走势下来，这个波澜壮阔的运动，有它必然出现的原因。“五四”至今八十八年，我们仍然关心它，为什么？是不是为了纪念当年这场学生运动中学生们所作的牺牲？为那些被北洋政府抓去坐牢的人抱不平？进而要找出这场引起全国风暴的人来问罪？抑或为了它更深层的意义？

回看历史，“五四”的产生，事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和会于巴黎召开，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但出席和会的列强竟然明目张胆，决议把德国人在中国的利益全部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中国，举国愤怒。当时在北京地区，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十三所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反对《凡尔赛和约》。所谓先进的西方大国，竟如此横蛮、如此不公，欺压中国；而中国代表在北洋政府的指令下，不敢反抗，几欲签约，自甘辱国丧权。这是卖国行为，大学生们闻讯，前仆后继，争相呼唤，席卷全国，全国人民，乃至欧洲的华侨与参战的华工，全体声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协约国之一，当时派出了约二十五万的华工队，开赴欧洲战场。战后许多华工回国，但仍有最少五万人停留在法国。这一批人，是当时反对中国代表签约的最大力量。他们甚至在会场外包围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又在美国总统威尔逊出席会议时，由中国的留学生联同华工的代表为首，前去请愿，尽管美国总统没有接见他们，但仍接受了请愿书。东南亚的华侨，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地，乃至美国的华人，都动员起来，互相呼应，例如新加坡的码头工人，不为日本轮船卸货，黄包车夫不替日本人服务，许多人都因此而被打。这个运动如此

壮烈，声势如此浩大，感动了许多人。从这个角度看，“五四”已经变成了全民族自觉的民族运动，并无组织，由大家自发参与。它如此震撼人心，一定有深刻的理由。

这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一直紧扣着中国人的命运、紧扣着中国人的心。

我们都是中国人，不管我们居住在什么地方，我们讲的是中国话，流的是中华民族的血。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盲目维护中国利益，而是伸张公义，反对强权，为我民族抱不平。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便贬低了这个运动的意义了。相反，这是对国际政治强权欺侮中国的抗争。让中国人看清楚了，那些宣称代表平等、自由、民主的先进国家，其实是怎样对待中国的。虽然中国在学习他们的民主、平等、科学，但他们是怎样表现的？骨子里其实仍然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看到中国这块肥肉，利益当前，都想来分一杯羹。

## 二、历史沉疴

为什么中国如此积弱而任人宰割呢？中国的悲惨命运是从晚清开始的，远在鸦片战争之前，甚至更早，在此不必细

述，总之跟清朝的统治有关。

在清朝的统治下，中国自我封闭，文化命脉断绝；读书人在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不敢再讲思想义理之学，只埋首在纸堆中搞文献考据之学，以致文化大义不明。当西方进行工业革命时，中国仍在做天朝大梦；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一败涂地，才如梦初醒。起初在心理上，对此奇耻大辱，中国人仍然难于接受。但连年战败，才不得不低首下心，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技术，仿效西方的兵工厂，生产西式军火，甚至购买西洋军舰、枪炮，欲以夷制夷。但有用吗？甲午战争仍是战败了，于是想到制度不改，一切仍是依旧，结果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搞政变；到政变失败之后，唯有革命一途。

中国历经军事、政治的挫败，命途多舛，如此下去，有亡国之险。所有中国人都希望看到中国重新站起来，不再受人欺侮，所以孙中山先生到处奔走，号召革命，欲置之死地而后生。在新加坡，也有许多人支持他，甚至跟他回国革命。在黄花岗战役中，就有不少新加坡华侨战死。他们有些从来没有回过中国，只是第一次回来，就战死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了什么？就是一颗中国心的呼唤。我们都关心我们的祖国，关心祖国的命运：祖国什么时候才能强大起来？不再受列强



的压迫？事实上，由于失去母国的庇护，海外华侨的境况也很痛苦。所以这个声音响起，到处都有共鸣，大家站出来，参与打倒清政府的革命。孙中山当时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掌握住这个时代中国最沉重的脉动，就是要“拯救中国四万万人民”，进而“扫除亚洲黄种人的耻辱”。这是所有中国人的心声，所以能得到海内外中国人的支持：中华民族不但要活下去，而且还要洗刷被列强欺侮的屈辱。

辛亥革命的精神一直贯彻到“五四”，直接催化五四运动的发生。因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清政府，成立了共和国，但立国不久，孙中山就被迫退位，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不久袁世凯称帝，然后又有张勋的复辟，历史大开倒车，令人失望。另一方面，源自康有为的守旧势力亦要抗争，他们主张祭孔，袁世凯也尊孔，一时各地纷纷成立孔教会，重新提倡经学。原来，民国之初（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已宣布停止祭孔，中、小学废除读经科（按：后来又将北京大学之经科命名为文科，并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蔡元培的想法是思想、宗教、国家不可混为一谈。此即西方政、教必须分离的主张，有其道理。当时国人已普遍接受这种看法，但守旧派却利用孔子来遂其政治上的目的，令人反感。新旧两派吵吵闹闹，中国人的精神分裂愈趋严重，孔子的形象亦大

受伤害，成为斗争中的牺牲品；这才引起“五四”青年的错认，对守旧派大加挞伐。

### 三、“五四”的转向：从爱国运动、民族运动到文化运动

“五四”的产生，从列强侵华的历史背景看，它首先是一场爱国运动、民族运动。正如上文所说，这是晚清以来中国命运与西方列强碰撞后所产生的悲剧。然而，这场运动很快就由排外而转为排内，向文化改革转向。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爱中国，首先便要打倒列强；爱国，就必定反帝国主义。我们受帝国主义欺侮多年，全国各地被列强瓜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东三省属日本、长江流域属英国、两广云南一带属法国、山东属德国，等等。中国正面临亡国之势，形势非常危急，所以五四爱国运动，就一变而为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家都看到北洋政府无能，自袁世凯死后，那些北洋军官都纷纷变成大军阀，各自混战，割据称雄，打得一塌糊涂，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形下，老百姓中有血气者，怎不愤激？因为政府依然颓废，民主没有到来，自由也没有到来，结果反而是中国继续被凌辱，所以大家都要把《凡尔赛

和约》拉倒。在强大的反对声音下，中国最终拒签，不过亦从这里暴露了当权者的腐败。因此，当时的口号除了“外抗强权”之外，另一句就是“内除国贼”，即内外两面都要打倒。

“内除国贼”的呼声，代表了政府的腐败，政治上的专制，必须打倒。但腐败和专制不是偶然现象，社会文化上的落伍和禁锢，才是更深的原因。中国需要新思想来冲击，否则无以对抗西方力量的入侵。这种觉醒，“五四”之前已经有了。当时一些受过西方思潮洗礼的人，便认为中国的落后，除了体制之外，还有历史文化的原因，这就是中国的家族文化、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的积垢，讲什么“三纲五常”、“封建礼制”的遗害。陈独秀办《新青年》杂志，便写了许多文章批评“三纲五常”，认为如果“君为臣纲”，做臣子的便没有独立人格；“父为子纲”，那么儿子便不能自己思想；“夫为妻纲”，妻子从属于丈夫，亦同样失去自由。陈独秀把这称为“奴隶的道德”，认为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把人训练成奴隶，不可接受。他的意思是，政治讲“忠”，家族讲“孝”，将“忠孝”讲得非常神圣，但实际上都是让人失去独立人格的枷锁。

陈独秀这么说，反传统的号角就吹起来了，许多人写文章响应，如胡适、李大钊、鲁迅等。这一股声音在“五四”之前已日益强大，最后就归咎于儒家思想，甚至向整个传统文

化开刀。例如反传统的大将吴稚晖，他在家乡已经和父亲闹得很不愉快，互相指控，甚至争产。他怀了一肚子气说要废除孔子孝悌之义，大叫要把所有的线装书丢进厕所。吴虞是反传统最厉害的人，胡适替他的书写序，称赞他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从此，“打倒孔家店”这句话渐渐流行，而“反传统”与“批判孔子”就划上了等号。就算在“五四”之后，出于对知识的渴求，文化界纷纷礼请国学大师开列书单，让青年有书可读。梁启超老实地写了许多中国的经典书目，而鲁迅开的书单，则主张不要看中国书，要读就去读外文书，不要再读中文书。钱玄同就更激烈了，他主张文字改革，他认为中文字很难读，而英文则容易得多，因为二十六字母很快就学完。所以他说要救救孩子，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再读中国经典，不要再给孩子压力，把中国文字丢掉，就是最好的办法。

你看某些“五四”知识分子，头脑多么简单，态度多么激烈！以乱治乱，只有更乱！

#### 四、“五四”狂飙：非理性的“启蒙”

在反传统之中，有没有正面讯息呢？也不是没有。因为

反传统实际上是从对中国命运的关心而产生的，知识分子渴求中国的新生，所以背后仍有一颗爱国之心。反传统之所以得到呼应，只是因为错认。他们认为：中国要新生，就要把挡住我们新生的障碍去除，而这个障碍就是传统文化。使我们落后，没有自由、没有个性，不能做现代人，不能成为现代的民主国家，就是这个传统文化，将之打倒，中国就有救了。如此简单的认识，竟然可以风动全国，受到当时许多思想简单的热血青年所欢迎，造成“五四”狂飙。真不知道是时代之幸还是时代之不幸？

美国有一位学者叫林毓生，他据此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意识的危机》，说五四运动是个全盘性的反传统运动，但“五四”中人对“传统”这个概念的认识很模糊。若不清楚“传统”是什么东西，难道所有旧的东西都要反吗？像钱玄同一样连中国文字都不要吗？不分青红皂白、不分层次深浅，全都要反吗？当时已经有一位中国学者贺麟指出，“五四”表面是反传统，实际上只是反传统中僵化的东西；当反掉僵化的东西以后，反而可以让我们真正了解儒家的思想，让我们可以看清楚孔、孟、程、朱的真面目，让我们可以真正地客观地了解儒家。可惜，当时能这样平心静气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的人太少了。

陈独秀、胡适所举的例子，其实都是反对当时已经僵化的一些社会现象，像父母包办婚姻之类。在“五四”时代，仍有许多人是由父母替他定媒、定亲的，像陈独秀、胡适，二人的妻子就是由他们的父母作主的，但二人并没有离婚，至于感情有没有变化，则是另一问题。在历史的转折中，许多东西会同时出现，我们看到社会中有一些已经僵化的现象，但这些只是社会现象层次，而不是文化的核心层次、不是思想义理的层次和更深的价值层次。许多人只看到表象，觉得西方人很自由、很有个性，而中国人则没有，就咆哮起来。当时，易卜生写了一出舞台剧，十分流行，剧中描写一位叫娜拉的妇人，因反对家庭而出走。“五四”青年肯定了娜拉，认为反封建就是要学娜拉的离家出走，与故园告别。到了现在，很多年轻人仍觉得家庭对他是一种束缚，因为父母管我，我要独立、我要自由、我要人权，甚至不要父母提意见，一切由我自己来决定最好。为什么如此？这个社会现象是怎么出现的？大家都没有好好反省。依我看，西方的自由与其说是尊重个性，不如说是放纵个性，好像年轻人的这些反叛行为，就不顾亲人感受。把西方文化放于至尊的地位，当然引起许多人的反弹。所以在“五四”之前已有“新旧之争”、“中、西文化之争”，一直没有停息，种种议论纷纷出来。到了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抗战胜利后则又发生国共内战，局势紧迫，根本没有时间让大家思考这个深层的思想文化问题。

座上诸君很多是企业家、成功的商人，我就打个比方吧，大家都知道，当生意上遇到危机，如果环境容许，有时间让你慢慢研究，把问题看得清楚了，才作决定，当然最好；但危机的发生，是不会给你时间的，事情迫着你下决定：生意要做还是不做呢？租金要交还是不交呢？合约要签还是不签呢？你没有时间考虑，最后由感觉来做决定，做了才算，就冒险了。“五四”的情形也一样，局势紧迫，争拗不断，又没有定论，只好诉诸感觉或激情，尤其是年轻人血气方刚，根本不容深思。据李泽厚的讲法，中国当时本要启蒙，但形势太危急了，没时间进行，启蒙于是变成救亡，救亡就是革命，建立新政权，亦即采取军事方式和政治方式解决了。

“启蒙”(enlightenment)，源自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五四”把这个名字借来。还有一个讲法，就是“文艺复兴”，是把西方16世纪的文艺复兴、人的解放等语言借来。把这些语言借来的人，主要是胡适，他以“中国的文艺复兴”来美化五四运动，是希望它能够从爱国主义走向文化。至于把“启蒙运动”借过来的人，则是陈伯达、艾思奇这两位左派理论大将，后来还有王元化。照现旅居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余英时的看法，前者是一种文化与思想的方案，后者是一种伪装的政治方案，他们有意作此附会，以转移“五四”的方向。

王元化长期居于上海，前几年逝世，我曾跟他谈过好几次。他对我在香港办的文化事业很感兴趣，也曾给我办的杂志投过稿，可惜时间忽忽，并未谈及早年他的观点。为什么要“启蒙”？是因为我们要反抗，要打倒腐朽的政府，要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中国人要醒过来，要救国，所以跟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很配合。把“五四”称为启蒙运动，可以团结许多无党派的人，因此盛行一时。但这个“启蒙运动”讲了若干年后，就不讲了。根据王元化一篇叫《传统与反传统》的文章，指出是因为接到上头的指示，所以以后不再提“启蒙运动”这四个字，当时连他也不明白为什么。

其实无论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都不是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强加比附，都是别有目的的。为什么要讲“启蒙”？“启蒙”这个概念用得恰当吗？“启蒙”预设了我们还在愚昧、落后的状态中，不知道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世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知道争取自己的权利，不知道要反抗，不知道要革命。经“启蒙”后，他们就懂得反抗了，可以参与革命了。但为什么以后不再提呢？我想是因为法国的



启蒙运动本来承自文艺复兴，强调理性，强调人要通过他的自然理性来发现他的自由，包括个人的文化修养、个人的道德操守与做人的美感。这是法国人的生命情调，追求光明，追求个人性格的独立与解放，追求人的高贵和高尚。从这地方再讲下去，便与革命有所抵触。革命要你牺牲个人，集中力量从事斗争，不允许有个人，所以连孙中山也反对。

五四运动时，大家都争取个人自由，但孙中山的国民党不允许。因为每个人都讲自由，就不能成为集体力量。所以他说：只有民族的自由，没有个人的自由。因此，如果继续讲启蒙，最后必然触摸到西方的启蒙精神的核心，就不利于革命。他们的语言都只是借用，所以“启蒙”也好，“文艺复兴”也好，“反传统”也好，或是接受“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也好，个性解放也好，都是作为工具或一时之方便拿来用，并不是真正了解西方原来的用法。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也不具备西方的文化背景，如何借用呢？当时并没有人做过全盘性或根源性的探讨，只为方便满足当前的要求就拿来用了，这在后来被戏称为“拿来主义”，亦正是“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写照。

## 五、“五四”的虚无：文化上的无主孤魂

正如后来许多学者指出：“五四”时代的人太肤浅了，讲话都太情绪化，不冷静、不理性。为了当时形势需要，就随便借用外国的语言，没有好好做研究，探索其来龙去脉，便拿来作为参照系。例如胡适要整理国故，把自己称为“文艺复兴”，讲新文学运动、白话文学运动，就像是欧洲文艺复兴中，各国不用拉丁文，而改用本身的民族语言一样。但这又如何得出白话文学来？显然欠缺逻辑。所以在这一点上，章太炎则主张用古文来重生，也就是复古运动。复古才找到自己民族上的根。结果胡适的“新”与章太炎的“古”同时并行。还有先前鼓吹的民主、科学、自由，胡适的民主主义出现了，然后章太炎由复古而主张国粹主义，李大钊则提出社会主义，还有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然后尼采的超人哲学也被带来中国。总之，那时候，什么主义都有人讲，也有人应。闹哄哄，也乱哄哄。很多人喜欢尼采，因为尼采讲“价值重估”。胡适借用了这个概念，要对中国文化进行价值重估。不过这跟尼采的用法完全不同：尼采的价值重估是根据他的超人哲学，根据超人的强大的生命意志（the will to power）来反基督教、来颠覆西方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因为这些价值

使人变得软弱和虚伪。胡适并无尼采的哲学理解，却借用他的概念来反传统。总之，别人说一句话，觉得很好，便立即借用，完全是一种比附，结果制造出更多的混乱。

混乱的破坏性太大了，所以后人就埋怨五四运动把传统都破坏了、把人心都破坏了、把思想都破坏了。面对许多种讲法，谁都说自己有理由，而莫衷一是，谁对谁错，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只知道追求新奇的观念，散发出青年人的热情，却没有严肃的思考。思想混乱使社会价值成为相对，价值相对最后变成价值虚无。所以“五四”以后的中国，价值秩序混乱，人心虚无，始终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政党多、杂志多、观念多、主义多、理论多。从负面来看，就造成严重的内耗，却建立不起新秩序，到最后变成了革命，只好用新政权一概取代。因为嘴巴吵不完，唯有动手解决，武力竟成为结束争论的手段。“五四”精神也就夭折了。

从好的一面来讲，“五四”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开放的时代，就是吹来一阵春风，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都能给人以启发：打倒权威、打倒传统、打倒过去、打倒八股，新的东西就能进来，虽然我们还学不到，还了解不来，但最少有新东西。所以“五四”的思想解放，就有正面意义。不过这个意义只是在于开启、在于介绍，胡适所谓“但开风气不为师”，不一定

正确。他讲价值重估，原意也是在重估所有价值后，可以建立新的文化。这是应该完成的一个使命，但可惜无人跟进。

要知道“五四”时代的使命不光是反传统，一个伟大的运动不能光用消极的语言就能成为历史的领导。历史可以开风气，但还是要要有正面的东西。若没有正面的东西，光为反对而反对，无疑自虐自残。胡适等人知道要建立新东西，所以主张“文艺复兴”，但他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中间有很多局限。“五四”中人虽然聪明，有很多很好的学者，但对西方的认识毕竟较浅。唯一较有深度的是学衡派，从学美国的新人文主义而来。中国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送了一批学生到美国，跟白璧德学新人文主义。这跟科学主义不同，新人文主义继承西方的人文主义，强调人性，强调人的修养，强调人的自我规范、自我完善。这跟科学视人为物的进路完全不同。这个观念通过吴宓、梅光迪传到中国。“五四”之后，他们办了《学衡》杂志。融合了西方文化的道统来重新解释孔子与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真正有助于中国的改革，但他们的声音未能成为主流，又受到了鲁迅的嘲笑，大家更觉得他们保守。不过，他们不为所动，都平心静气地写文章，内容有一定深度。他们的主张，就是相信能有通于所有时代的思想，而求取一种普遍的真理。从追求真理的普遍性来讲，就

不仅与一时代的观念相合,而且要求与一切时代的精神相合。因此他们主张对西方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穷其本源,不可浅易作结。他们的文章都用文言文来写,在上面刊登文章的学者都是学贯中西,与一般空言改革者不同。但在当时,便跟胡适推动的白话文学运动,像是打擂台,有点不识时务,所以未能发挥很大的影响,非常可惜。

五四运动的科学主义不成功、自由主义不成功、社会主义不成功、国粹主义不成功,只有白话文学运动可说是成功。白话文学运动抛弃了过往的文言方式表达,我手写我口,这是文体的解放。但是,语言只是载体,更重要的是载些什么?无论如何,这个载体能得到解放,思想传播就更有效。利用这个机会,很多新观念、新东西就可以出来,对思想解放无疑很有帮助。但真正要建立一个东西,就不能光是靠载体,还要有内涵。如果没有很好、很丰富的内涵,思想就没有深度。像韩愈的古文运动,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但是继韩愈而起,便要有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才真的可以振颓起丧气;结果宋明儒学起来了,便完成一时代的使命。从这一点,可以说白话文学运动还没有完成;作为文体的解放运动是成功了,但作为新文化运动则还没完成。有载体而无内容,便等如穿了锦衣的乡愿。

## 六、“爱国”即自我伤残？

“五四”有两条线：一条是正面的，是爱国运动、反帝国主义，并变为新文化运动，要建设新文化，这是正面的；另一条线就是反封建、反传统，然后变成对传统的批判，清算传统，这是反面的。这两条路，本来是支持同一个目的：中国要新生，要走向现代。但为什么走向现代就要打倒传统呢？传统与现代并非互相对立，只需转化，传统亦可以成为现代的资源。“五四”中人不了解爱国一定要先爱护自己的文化，若为了强大而抛弃传统，等如精神上先做亡国奴。现实中的中国社会诚然有许多缺憾，但不能因此而把责任全推到传统文化上来。这种一刀切的思想太偏激了！

鲁迅写的第一篇小说叫做《狂人日记》，就是拿钱玄同作为影子来写。这个狂人狂什么？就是他痛恨他的老爸要他从小念经典，要他背经典背得很苦。中国经史书都很厚、很大本，每一页都说忠孝仁爱，令人负担不了。狂人看到半夜，看了半天，就从忠孝仁爱的字缝中间，隐隐约约地看到两个字：“吃人”。鲁迅的寓意，要表达当时年轻人强烈不满的情绪，对传统非常厌恶。这情绪具有传染性，大家看过以后便受影响，无法再仔细思考传统是什么？忠是什么？孝是什么？忠孝为

什么会变成吃人？中间有什么逻辑联系？有什么理由呢？大家只想着发泄，都没有人去考虑了。

爱国与传统好像不能两立，爱国就要打倒传统。这太激进了、太情绪化了。有人认为这是“五四”的浪漫主义，结果化为狂飙。国未建成，便自我伤残。这是一百年来的中国命运：从鸦片战争失败后，不但拉动着中国，也牵扯着海外的华侨的心，无人不想中国富强起来，这是历史的主题。由孙中山讲的“恢复中华”启其端，毛泽东的人民革命踵其后。1949年中国成立新的政权时，毛泽东在天安门高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句话，就是百年来中国人久久等待的声音。那一刻，成为感动人的热泪，让很多海外华侨，从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地马上回国，去参与建设新中国。可惜，经历了多少寒暑之后，他们都受到清算。在“文化大革命”中，凡与海外有联系的，都免不掉被斗争的命运，很多人再回不了家：马来西亚不要你，印尼也不要你。从海外华人的立场，以为自己跟中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不怕牺牲、不怕委屈、不怕痛苦，但最后得到什么？令人有口难言，有怨难伸。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所背负的命运：一个古老帝国在走向新生的命运！

## 七、中国新生靠什么？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讲中国话，我们心里还是关心中国的。虽然我们对“国家”的概念跟过去不同了，现在海外华人大多不再保留中国国籍，但心里还是关心中国。我们的“中国心”为什么那么热呢？是生理的原因吗？是种族的原因吗？因为我们都是黄种人、都是黑头发？如《龙的传人》这首歌所表述的那样？我认为我们不能光看种族的理由，因为“国家”的概念比“种族”的概念更宽，“文化”的概念比“国家”的概念又要再宽——宽不是外延，而是内涵。

再进一步，“国家”也不过是政治学的概念。我们生而为人，当知我们的生命本源，那是合生存、地域、历史、文化而为一整体的本源。这些都不由我们自己选择，而如此汇聚到我身上，而成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使我懂得思想、懂得做人、懂得庄严地活着，而要对之承担的本源。这是一种形而上的感情，亦即“性情”，不可讨价还价。西方人讲人权，以人权凌驾国家、宗教、种族、习惯，结果只有“自我”，再无更高的价值。中国文化世代相传，就是一颗“中国心”，对中国事情直下承担，这是一种形而上的真理，一种对自己生命存在意义的体认！



唯有维持此心，中国便不会亡。但要维持此心，便要学习中国文化，否则中国心缺少中国内涵，就会错认方向。“五四”中人正是如此。爱国导致反传统，青年人的热情未能转化为理性，更成长不了生命，读书不成，做事又不成，怎么办？光是爱国热情、革命热情，怎救中国？一味痛责传统，只有造成自己精神分裂，自我伤残，代价更大，最后自己也迷失。如反传统之健将陈独秀，由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而投向共产主义，又与托派往来，最后因机会主义而被开除出党，成为各方面所不容的人物，晚景凄凉。

在反传统中，也有一些人比较客观，例如贺麟，他是留学德国的学者，后来常替“三纲五常”辩护。当有人举出“爸爸要我听他的话，就是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时，贺麟认为不应该这样看，指出你听爸爸的话，实际上是尽你内心的道德。若以我的看法，则不仅尽你内心的道德，而是先要了解到你爸爸的心，发现他对你的爱，有很深的情，这样就跟你的心的心没有矛盾。不要各持己见，把双方视为对立的存在。若以为爸爸管你、不让你人格独立，他便会变成你的敌人；实际上他的深心并非与你为敌，他是要你成才、要你成长、要你成人，为什么不先感受这一点呢？尽管在做法上、观念上，或许欠佳，但看深一点，其实与你并无矛盾。做法上、思想

上的问题，是因为时代已变了，大家成长的背景不一样；但我们若回到初心，通过心灵的交流，是没有必要对立的。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把儒学单视为资源可能不对，实际是对生命的启迪，让人看到生命有更真实的东西，把它开发出来，人的生命可以成长，思想、境界可以上升。所以我办了许多课程，目的是让每个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初心，也就是儒学所说的“性情”，由此起动，才不会被事物的表面障碍，而造成彼此的距离，甚至人生的种种悲剧。

不过，“五四”时代大家都沉不住气，大家只看表面，都在语言的表面上争论，没空间深一步思考，而各持己见，造成了空前的混乱，从不知道彼此的深心都是一样的：就是“中国命运”、“中国心”在推动着大家的行动。这一百年主题——“中国命运”、“中国心”——就是要求生存，要求得到别国的尊重，不希望再受别人的欺侮及打压，中国人要得回中国人的尊严。正如孙中山的《总理遗嘱》所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本来，我们只是要求公平，要求独立，得回中国人的尊严，但却因为太多争吵，结果“五四”变成很多不同的力量在较劲，最后终致爆炸。“爆炸”即大家都同归于尽，

造成思想上的真空。唯有掌握实力或权力的人能主导话语权，其他都要偃旗息鼓。难怪有人认为：“五四”过去了，但“五四”所赓续的历史使命：民主、科学、自由，到现在还没有得到。

## 八、从忧患意识到文化定位

1989年“五四”七十周年，我到北京参加了一个研讨会；1999年“五四”八十周年，我又参加了另一个研讨会，分别发表了文章，对“五四”作出了回顾。我希望能把“五四”精神挖得更深，指出根在“中国命运”、“中国心”，也就是《易经》中所讲的“忧患”，再由“忧患”转为我们应有的承担。

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忧患感，《易传》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说明《易经》的作者，动机就是出于忧患：担心我们的民族活不下去，内忧外患将使我们过不了关。一旦过不了关，我们就要灭亡，这就是民族的危机感。传说《易经》由周文王所作，他正是担心周民族活不下去，所以写卦辞和爻辞启发儿子，让他好好学习历史的智慧，也就是现代人所讲的“历史哲学”：了解历史的发展之道，也是民族的长治久安之道。人难道像动物一样，有东西吃就好了吗？有钱

就好了吗？光是这样，活下去有什么意义呢？人要活得有意义，就要有创造力。《易经》就是训练我们的创造力，生生不息，乾坤并建；有创造力才能渡过难关，才能转危为安。

我们要有危机感，要有忧患意识。当代的徐复观先生把“忧患意识”视为中国文化的一项特征。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称之时局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就是一种深重的危机感、忧患感。在三千年的人类历史上，中国领先了两千八百年，但最近两百年，我们却一败涂地，这种无力感，使我们看到洋人就害怕，自卑感油然而生。“五四”中人一方面盲目崇拜西方，一方面盲目批判传统，又无路可走，激情最后爆炸，转为革命，最后让社会主义在中国建立。那就是中国的命运使然。其实，对中国而言，共产主义都是西方观念。国民党讲的自由民主，与共产党讲马列主义，都是西方产物，它们却在中国的战场上拼斗，流的却是中国人的血，受伤的是我们固有的文化。

从文化立场看，中国传统所讲的“性情文化”、道德修养，并不与西方的科学、民主相冲突。只是双方发展出来的体制不同，由此规范人的行为和思想，使之有不同面貌。若寻根溯源，则知识世界、技术世界、法律世界、道德世界、人格世界都是人类的共法，西方重前三者，中国重后二者，没有

必要去此取彼。“五四”之后，有些深思熟虑的学者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写出《中国文化与世界》这篇宣言，指出“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之主体，同时亦要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心之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的主体”。这也就是说：顺着中国文化最深的要求，与西方文化今天的成就并不相悖：人作为一个道德的存在，同时亦可以有民主的生活和科学、技术的创新。这是探本之论，也是希望在文化和哲学思想层面来调和传统和现代的矛盾，使“五四”未竟之业能够完成。不过，书生的构思虽善，现实的情势却未能追上。顺“五四”救亡之路走向现实，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中国似乎真的独立了、强大了。但是大家也知道，这条路非常不好走，因为也陷入了另一意识形态之中。经过三十年，意识形态愈来愈偏激，不断制造思想敌人，结果政治运动不断，传统与现代都并受伤残，路似乎愈走愈狭。幸而否极泰来，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决定改革开放。百年曲折，终于有了新生。

## 九、中国再生的历史转机

今天，中国经济起飞了，很可能成为美国以外的另外一个经济大实体。许多人到中国投资，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因为从中看到很大的商机。全世界企业的五百强中，大部分已经进驻中国。世界必须正视中国壮大起来的事实。如何与中国相处？成为大家都关心，不能逃避的课题。

中国的国力站起来，大家一方面欢迎，但另一方面沿着历史下来的关系，亦有所警惕，所以造成政治上的许多歧见，与许多怀疑。在这个情形下，中国该怎样发展呢？

我有两点看法：第一点是中国开放政策，不只是经济发展，也是历史的一个转机。中国重新加入世界，必定要与世界和平相处，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美国乃至西方的自由民主的发展已至顶点，所谓“亢龙有悔”，整个社会素质已下落。像我提过的“新野蛮人”，指的正是美国的霸权作风，和它背后所依附的那套文化。他们依仗科技发达、社会富裕，便随意挥霍，明目张胆，恣意干涉别人的内政，掠夺别国资源，从这一点上看，他们的思维基本上仍是野蛮人，对外总是“先下手为强”。如他们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都是打了再说，即使联合国不同意，他们也要出兵。在这情形下，

可以看到知识没有用，技术没有用，财富没有用。对一个野蛮人而言，知识、技术、财富只是增加了他的野蛮的力量。另一方面，西方两百年前所建立的民主制度是否该重新反省，这个制度运行得很好吗？为什么行此制度的社会，人的素质都每况愈下？人愈来愈自私，人际关系愈来愈冷漠，人人都讲利益，一味重视物质财富与名誉的拥有。这样下去，精神必然空虚。文明只剩下技术与财富，灵魂却不见了。

整个世界都有危机，美国内部也有很多危机，尤其教育的危机。现今校园暴力非常严重，青少年的吸毒和色情也很泛滥，问题都是起自无形。历史就是如此，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每一种文化，在初创的时候都是很好的：孔子很好，佛教很好，基督教很好，伊斯兰教很好。在初创时，那原始的观念一定有时代的对应性，再经深化，就成为一种永恒的价值。18世纪资本主义初起，与之配合的民主制度就是一种正面的追求。但这种正面的追求，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后，其局限性就显露出来了。资本主义如此，共产主义也是如此，所以人间并无永久不变的体制，而只有不断的调整。这一点，中国文化是最有慧识的，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凡与现实有关的，都只有不断地改进。

五四运动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科学等西方价值，到现

在仍有人把它视为普世价值。这普世的价值，若从理论层面讲可以接受；但在具体实践上，则必须参看现实条件，而不能空说。例如民主，各国的民主体制和落实情形就不一样。我们该学美国的民主、印度的民主、日本的民主还是台湾地区的民主呢？只看形式是没有用的，因为文化与历史、生活连在一起，并非抽象的概念所能局限。现在，我们必须看到整个东、西方文化的气运正开始转变，那就是西方所讲的自由、民主与人权，在两百年后的今天，虽不敢说它毛病百出，但最少已经“亢龙有悔”了。至于中国，则是从谷底上升，最困难的时代过去了，正慢慢走向光明。文化的周期跟经济的周期一样，都有一种变动性。五百年来，我们赞美知识、赞美科学、崇拜技术、崇拜财富。西方自16世纪以后，培根提出了“归纳法”，认为这是获取知识的好方法，科学方法亦由此奠基。培根说：“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力量），已暗示知识可变为技术，助人控制自然。今天我们再把技术变为产品，产品变为财富，这一点已是人所共知。产品那么多，只有加速消费。一地区不足，更扩大为全球。速度更快、欲望更多，总有一天，人会不堪负荷。人类除了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之外，还有生态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地球暖化问题、资源枯竭问题，乃至人类生存的危机问题。谁可挽救？挽救



不了，这种文化也就完了。

针对这些问题和危机，人类有没有一种文化智慧，可以提供解决办法？改辕易辙，我认为唯有回到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上来才有出路。虽然，中国文化目前并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但不妨看看中国人是怎样面对大自然的？是怎样跟天地相处的？是怎样跟动物、植物相处的？怎样跟历史相处的？怎样跟未来相处的？这是“天人合一”——人对大自然，并不是征服者。

## 十、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关键是人才

我们今天能否有更高的、更超越的历史智慧？能否从过去的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看出文化的盛衰？不要以为西方今天强大，自由、民主、科学很了不起，有一天它们也会面临衰退。事实上警钟已经响起，你只要看看西方社会内部的腐烂，便可思过半。“五四”时代的一面倒情形已经过去，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还未全盘移植西方的东西时，它们已经摇摇欲坠。所以，我们应该有更高远、更超越、更探本的思维，才能为自己找寻出路，以完成“五四”的历史任务。不但使中国独立，中

国文化的价值也能重生,更可以与西方乃至全人类共同相处。

“五四”的问题就是只从现实层次出发,如此爱国,不能深入到民族的灵魂。“五四”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化才是长养中国人的根,强把民族与文化分裂,使自己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四处求怜。唐君毅先生所谓“花果飘零”,民族和国家都失去了凝聚力,而国人亦失去归根之地。

今天中国已经开放、经济已经起飞,开创了新的局面,中国肯定需要在人类未来历史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从感情来说,我们跟中国传统文化脱离已久,不知道中国人本来是什么样子,也没有再读中国书,此即所谓“文化断层”。所以现在听到有人讲《论语》,便感到很亲切,所以很受欢迎。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心态被扭曲已久,过去一看古书,便以为是“封建余毒”,太不了解了。幸而数十年来,海外还有新儒家,一直坚持讲学。我自己也讲《论语》超过二十年,并承“凤凰卫视”之邀,主持“霍韬晦讲《论语》”的节目,还可能是第一个以《论语》为专题的电视节目(按:第一辑在2005年12月)。观众反应非常热烈,可能是睽违久了,一旦重逢,我们的感情便会出来,所以我从“情”上讲,这就是向传统的回归;从“理”上来讲,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有问题,要听听中国的智慧。

从文化源头上看，西方是“理性优位”，以知识为本；中国文化则是“性情优位”，以性情为本。从历史的变动来讲，我们今天有充分的根据去回归传统：第一是“情”，就像我们与亲人分别太久了，跟爸爸、爷爷、奶奶可以重逢了，这就是情，自然之爱；第二是“理”，上面说过了，西方已是“亢龙有悔”阶段，中国正是“一阳来复”；第三则是“势”，是历史的大势，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大家都在期待中国文化的登场。在经济发展之后，我认为要让孔子的智慧来提升世界，让孔子的智慧出来唤醒人心，教人重新认识生命的价值，否则人会被物化，社会会堕落。这就是历史的大势，必继现实的衰亡而起。最后就是“机”（opportunity），我认为这机会也到来了。现在全世界许多人都学讲中文，孔子学院遍及世界，乃至温家宝总理在各地演讲，亦一定会引用中国古书，而引得最多的就是《论语》。可见这是个机会，正如我们做生意要懂得掌握商机，历史文化的发展也一样，要有高瞻远瞩的人出来把握千载难逢的机会。

以上我们从“情”、从“理”、从“势”、从“机”来讲，可说“五四”的反传统，经过八十八年走到现在，终于到了回归传统的时候。难怪这几年，国内兴起一阵“国学热”，很多地方都设立了国学班，但可惜还欠缺一个条件，就是“人”，

国内还缺少真正懂得传统文化的大学者，必须加紧培养，否则这一股浪潮无以为继。完成“五四”心愿，中国真的重新站立，必然国家、民族、经济、文化一起成长！

## 现场问答

一、基督教的文明及其带来的西方文化，对中国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和新文化的事业，起了怎样的影响，并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想听听霍教授的意见。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发现英华学校（Anglo-Chinese School）的校友，后来成了复旦大学校长的李登辉先生（1873—1947）。这位李登辉先生是印尼第七代的华侨，在雅加达出生的，早年不懂中文及华语。十三岁时，他到新加坡的英华学校念书，及后被一位传教士转送到美国俄亥俄州的 Westley College，入读大学先修班。及后更进入耶鲁大学，成为耶鲁大学最早期毕业的华人。他曾经到槟城担任英华学校的英文系主任，期间认识了林文庆医生，并联办了一所商业学校。在当时，商业学校并不吃香，大概经费也不多，便再回到雅加达开办一所耶鲁学院，但也不太成功，最后交由福建会馆接办。

最后他想到要救中国，因此到了上海。他在念书时代已经成为基督教徒，有一种奉献的精神。他一到上海，就组织了“寰球中国学生会”（The World Chinese Students Federation），并当上会长。复旦大学在2002年，出版了一本百周年纪念特刊，我从中发现关于李登辉在新加坡读书的历史，以及一篇由赵世洵先生所写的文章。最近又看到陈维龙先生写关于这位李登辉先生的一些事迹。我发现新加坡英华学校有这一位校友，能对中国的五四运动有一点点的贡献，因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受到了传教士的影响，而回中国办教育来救中国。当时他数度到南洋筹款，才协助马相伯先生买下复旦大学今天的校地。此外，他的祖籍是福建同安，变成除了陈嘉庚老先生、陈六使老先生之外，在中国办大学的第三位同安人了。

答：

谢谢你告诉我这一段历史，由此可以发现南洋华侨的爱国精神与对中国的贡献，而不只是基督教对中国教育的贡献。

西方教会近百多年来，对东方社会，包括殖民地社会，除了建教堂之外，就是办教育。中国很多学校都是教会办的。例如北京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

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四川的华西大学等等，他们虽然是教会大学，但大体上都能尊重中国文化，亦有帮助中国人认识西方的意愿。在这方面，他们对中国的现代化的贡献很大。

让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意思，是想把西方的价值移植到中国。他们的动机虽非纯粹，但客观上对中国贡献很大。由于教会的办学条件较佳，又能礼聘师资，所以一般声誉都很好。从这里毕业出来的学生自然分担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工作，对“五四”的新文化的内容，有实质之功，培育了许多人才，填补了许多空白，不致使新文化成为形式的口号。为中国培育人材，我相信从长远角度看，是符合教会利益的。你提到的那位李先生，我相信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不希望宗教和其他民族的传统价值，构成一种紧张的关系。像美国的亨廷顿大讲“文明冲突”（The Conflict of Civilization），若不能避免就很可惜了。以我的想法，我认为不一定会发生冲突，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宗教的正面价值，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价值，避免一元化和门户之见，有广阔的人文素养，大家便可以在人的世界中，真正地互相尊重。

王赓武教授：

我补充几句。李登辉的故事是很特别的，在华侨中很少有。因为他很早就有机会到美国念书，但最有意思的并不是信仰问题。

他是生于当时的海外华侨，对殖民地政府有相当的认识：一方面受殖民地政府欺负，一方面也看到西方是怎样建国，及他们建国的力量从哪儿来。西方对世界历史的贡献之一，是建立国家的概念，这在当时是很新的概念，因为欧洲的国家概念，出现了不过两百年，在此之前并没有国家的概念。大概在美国独立及法国大革命之后，才产生出健全的国家概念、国民概念：一个国家的国民，全部都属于一个国家之下，应该爱护、保护。这在当时是很新的概念。

海外的华侨起初没有这个概念。他们从中国出来时，所带着的是乡土概念，根本没有国家概念。他们的对象只是皇帝、家乡。就如孝顺父亲，而乃至这个种族一样。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就是皇帝，实际上并没有国家的概念。

后来，当他们看见西方建立的国家都相当强大，而且以国家为基础，而建立了那么多的帝国。他们这些帝国的力量，跟古代，如罗马帝国，是完全不同的。当时的华侨，虽然不懂得中文，也没有到中国去，但也受到影响，对国家的概念

很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李登辉先生的文章里，除了写自己对教育很感兴趣，也经常提到爱国。他的基督教信仰，与爱国精神没有任何矛盾，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样可以爱国。他在中国服务了几十年，让学生、老师们对他都很尊敬的理由之一，就是他坚持爱国。基督教与爱国，其实没有矛盾。

二、俗语云：“春江水暖鸭先知。”霍教授您在香港中文大学，观察中国的一切情况，一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刚才您提到五四运动的使命有两方面，就是建设新文化和承担中国的命运。我的看法是中国在解放、建国以来，一直没有放弃五四运动的精神，并延续至今；而中国的新文化亦已经在酝酿当中。但您刚才说的“中国命运”，似乎有点悲观。王赓武教授亦提到，中国国家的命运操纵在政治领导人的手里。拿中国解放（1949年）到现在的命运来看，我看是积极的。您刚才说过，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就是五四精神，是积极的。

不过，就现在中国酝酿的新文化来说，从政治的层面来看，其领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甚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说，跟目前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后在



道德层面上，中国似乎要回归到传统的儒家思想。如果这三方面好好地结合起来，我相信中国的新文化已经快要完成了。

但是不是这样？这个三方面的结合，是有其矛盾与碰撞的，那么我想请教的是：该怎样协调这三方面的矛盾呢？

答：

你所提到的三个方面，其实自“五四”之后，已存在了，而且一直存在。

一是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自由主义，即是民主、科学，要求改革，反对传统，在“五四”中，以早期的陈独秀及胡适、鲁迅为代表。

二是传统主义，首先有章太炎，然后有萨孟武等十个教授出来发表中国文化本位宣言。但其核心人物，实际上是梁漱溟、熊十力，乃至到了香港的钱穆、牟宗三、唐君毅这一支新儒家。有些学者称他们为“保守主义”，其实是立足传统，会通西方的，求中国文化之再生。

三是马列主义，这是斗争性最强、态度最激烈的一支。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艾思奇、毛泽东等属之。

这三股力量几十年来，互相较劲，最后以马列主义登上

政治舞台，成为绝对的意识形态结束。实际上，三者并非完全不可调和，尽管这三股力量在中国舞台上斗了几十年，大家都付出了很多代价，但我认为没有必要你死我活。这三者能否良性互动呢？不过良性互动是要有行动者的：谁去互动？如何互动？一牵涉到具体工作，就非常不简单。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巨大的世纪工程，过去八十八年仍未能解决。那是什么？那就是“五四”的遗愿：要建设一个独立、自由、富足，并获得列强尊重的新中国。但要得到别人尊重，靠什么？只靠经济吗？只靠政治吗？只靠军队吗？显然不是。所以我认为只有靠我们的文化，从孔子以来一直讲道德、讲人格、讲修养、讲成长、讲天人和谐的文化，这才是真正的文明，可以化解暴力、化解贪欲、化解功利、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方今世界局势偏重经济，人人相争以利，却又不肯承认它的丑恶，反而以“人权”观念来掩盖。义利不辨，或有利而无义，世界终必出问题，我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之后，能发展道德教育、性情教育，传统文化始终是我们的宝贵源泉。

附记：本文原为2007年5月4日在新加坡参加“‘五四’八十八周年纪念讲座”所发表之演讲讲词笔录稿。讲座之主办者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新加坡《联合早报》、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及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等机构。由南洋理工大学王宏志教授任主席，同时参加演讲者还有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教授。

# 旋转乾坤，谁有力量？

## ——“五四”八十八周年感悟

“五四”至今已经八十八周年了，对于一个这样壮阔的世纪运动，由当年的青年学生发起，终而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我们应如何纪念它呢？

年年开纪念会，年年宣告“五四”所追求的目标：移植“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亦即迎入西方价值，至今仍未完成，有什么意义呢？

“五四”本来是爱国运动，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反而被迫签订屈辱条约，凡有血气者无不愤慨，于是爆发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为首的十三院校学生齐集天安门，冲出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然后火烧赵家楼，惊动世界。从爱国演变为民族运动，打倒帝国主义，再“内除国贼”，上接“五四”之前的反封建、反传统，于是再变为文化运动：要解放思想，解放种种加之于人身上的束缚，反礼教、反家族制度、反三纲五常，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最后还要解放文体，要用新的表意工具来传递新思想，这就是胡适所说的白话文学运动，

或新文学运动的产生！

从历史角度看，这的确是“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原为李鸿章语），这个“变”，已经不只是“天朝”权威的陨落，夷夏易位，更是中国人自丧其精神支柱，膜拜西方价值，并自居为奴的开始！

这是动机与结果的矛盾，也是现实与理想的背离，所以当时的中国人，有从情感上不能接受的，也有从道理上深知其谬，起而抗辩的，如传统派的辜鸿铭、刘师培、林琴南等；或虽学习西方而不废中国传统的《学衡》派，如吴宓、梅光迪等；另外，则是对中西文化源流有深厚认识的新儒家，如梁漱溟、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结果造成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的分裂，<sup>[1]</sup> 受害者何止三两代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我们一方面要迎入西方价值，一方面又要为西方价值的进入铺路，所以“五四”英雄必先毁灭传统，把传统卷标为“封建”、“落后”、“束缚个性”、“吃人”，于是可以堂而皇之地去除。当时反传统的急先锋，如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乃至主张废除汉字的钱玄同，下笔都极其勇猛，被称为激进派，实质上是冲动、幼稚、肤浅。<sup>[2]</sup> 清算传统腐败虽有功，但却使国人眼睛向外求怜，造成严重的自卑情结与价值虚无，却是大过！因为他们根本拿不出救国

的方法，一味抱怨，只有造成更大的伤害。

所以历史后来发展，到一个宣称可以改变现状、可以更换腐恶的新思潮进入，立即赢得许多中国人的信仰，这就是马列主义。加上苏联革命的成功，的确使人相信：革命才是办法！

这也就是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取代启蒙”：本来我们可以通过对西方的学习，启落后之蒙，以建立新文化，但形势发展使我们没有空间，亦即没有选择。我们只有革命，彻底推翻旧政体。李泽厚的这一个说法，似乎解释了“五四”的命运。

如今，八十八年过去了，革命已经成功，但许多人都说：“五四”的使命还没有完成；至少，民主仍未落实，科学还是居于人后。所以，许多人都很悲哀，年年纪念，老调重弹，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注意到：今年在中国和海外，包括香港，都没有什么大型纪念，也没有什么新的反思。除了我作的两场演讲<sup>[3]</sup>之外，大家都忙于享受五月的长假期了。

从某一个意义上说，李泽厚的“救亡说”是有道理的。不过这一个观念并非李氏提出，而是早在孙中山奔走革命时已提出了。孙中山组织兴中会，“救亡图存”、“兴复中华”，正是 he 用以呼唤人心的口号。孙中山非常有识见，他紧紧掌握

着中华民族意识和历史发展的主题。此后一百年，或者更久，中国人必然还要救亡，还要生存在世界上，还要得到别人的尊重！

中国人所受的屈辱太深了，老实说，至今尚未完全洗刷。尽管革命成功，但革命斗争的意识形态未改，卒至酿成“文化大革命”。幸而邓小平改革开放，“中行独复”（见《易经·复卦》），方见气运之转。百年苦难，难道我们还没有受够吗？老实说，中国人有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的蕴藉，才智不下于西方人，只要给以自由，创造力就可以发挥。

但是，在享受到自由市场的成果，今天许多中国人已经富起来的时候，我们又该做什么呢？只享受开放的好处，便忘了百年来的使命吗？我们的目标是“救亡图存”，今天已经可以生存，便要进一步探讨生存的意义和更高的价值。孙中山的时代过去了，“五四”的时代也过去了，今天的中国，是要对世界发生影响力的时候。我们不要与别人为敌，但为友，要得到别人的尊重与信赖，却非常不容易。当我们已经站起来，就要有风范、有教养、有文化。孔子说“先富后教”（见《论语·子路》），这真是智慧语。文明，并非单指科学知识与技术，更非日新月异的产品与享受消费。富而无教是罪恶渊薮，这只要看看今天所谓文明国家的腐朽与颓废，人的素质

下降，便知道死亡不远，何况还有无法解决的生态危机呢！这已经超出了中国革命的主题，也超过了“五四”的主题，只有从更大的历史文化的升降、沉浮的角度，才能看出端倪。

我认为这才完全是文化路向之争，也是人对自己所创造的文明的深沉反省的衡量。谁的反省深，谁就有旋转乾坤的力量。在此短文，我无法细述我的领悟，但可以指出：论时论势，“五四”的反传统已经走到尽头，如今是发掘传统，重新运用传统智慧以拯救人类迷途的时候。因为只有中国的人文主义，才能使人不再向下沉沦，“物化”自己！

原刊《法灯》299期，2007年5月15日

**注释：**

[1] 参唐君毅《中国现代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之方向，及海外知识分子对当前时代之态度》一文，《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一书收。

[2] 参郭齐勇《五四的反省与超越》一文，《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一书收。

[3] 2007年5月1日和4日，我分别在香港法住文化中心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礼堂发表《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的“五四”纪念讲座，听众反应十分热烈。讲稿已收入本书第一章及第二章。



# 纪念“五四”，认识“五四”

## ——“五四”七十周年纪念

五四运动爆发迄今已经七十周年了。七十年前，中国青年喊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那的确是民族精神的激昂的表现；进而争民主、争科学、打倒封建、打倒传统，亦无一不是轰轰烈烈的举动。这种精神、这种行动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其创造性、斗争性、影响性，在中国历史上鲜可比拟。到今天，我们应如何纪念“五四”呢？

讽刺的是：七十年来，国家民族的处境并未得到多大的改善。除了帝国主义不敢再在中国的土地上炫耀武力之外，国内青年如今仍在反封建、反特权，继续争取民主和科学之外，还加上一条：争取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

七十年了，政权已易手数次，但执政者并未还给人民应有的权利，民主、自由还要用当年的方式争取。中国的进步何在？读历史的人岂不痛哭！

为什么中国的进步这样难？有人归咎这是中国的传统文

化影响所致，使我们无法走向西方。

为什么会这样？这还不是把两千年来重视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的中国文化连根拔起之故？“五四”时候反传统，有人认为“五四”青年要负上一些责任。其实，依我了解，“五四”青年所反的是僵化了的传统，亦即在历史中所形成的政治、伦理规条与腐朽了的人心；他们并未反对传统文化的理想主义的人格教育，正因为中国一直有这种理想主义的人格教育，才产生“五四”。

中国传统的理想主义的人格教育主要是锻炼青年要有为国献身的精神，当民族危难之际，便要赤手承担。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使是盛平之际、叶落知秋，亦动念悲怀。《易传》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关怀愈远、忧虑愈深，所以徐复观先生称之为“忧患意识”，并认为这是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色之一。我则认为这是一种危机感。时代动荡、民族的生存到了存亡危急之秋，自然产生危机感。但光是“感”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进而“作易”，以指出时代的方向。

“五四”青年之所以可敬，就是因为他们秉承了这种中国文化的理想主义的人格教育，不逃避、不退缩，而铁肩担起道义，把民族命运背负起来。虽然，限于现实的催迫，文化

反思未深，行动不免有错，但动机是庄严的、意志是勇毅的、思想是壮阔的，所以可以开出一时代的方向，而为后人所遵从。

扼腕的是：在今天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样的青年？

原刊《法灯》83期，1989年4月

# 忧患与担当

## ——论“五四”精神

### 一、五四运动的性质

今年是五四运动的七十周年。对于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运动，我们应如何纪念它，和肯定它的历史意义呢？我认为：这首先要了解五四运动的性质。从这个立场出发，五四运动有三个层次。

1. 五四运动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的特色是以其青年的朝气、青年的理想、自动自觉地承担艰巨，不畏牺牲、不怕强暴，只要是义之所在，即勇往直前。五四运动起自学生是无疑的，当时领导集会、示威、抗议、游行的都是学生，被打、被捕和被镇压的也是学生。学生是以其热诚和热血来唤醒民众，传扬爱国的消息。在中国历史上，以学生为主体的抗议或干议朝政并非以五四运动为第一次，早在两千年前，汉代的太学生已经开先例，此后宋明清不绝于书，但若论规

模之大、影响之深，仍不及“五四”。“五四”继承了中国读书人的抗议精神，但精神上已有所超越，有所开辟。“五四”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五四”带动了民族的方向。此后七十年，中国基本上是在“五四”所提出的方向下曲折地前进的。

2. 五四运动是民族运动：“五四”时代所提出来的口号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面对的是国家的积弱，政治不能独立，经济受外国人操纵。但当时的北洋军阀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向外国借款，不惜出卖国家权益，签订屈辱的“二十一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中却受到列强的宰割，要把山东权益让予日本。军阀政府的无能、自私、丑恶，列强要控制中国的狼子野心，在这些事件中暴露无遗，因此有血性的中国人都知道：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救中国，“毋忘国耻”、“民族自救”的呼声响彻云霄。“五四”前夕，为了挽救中国，留学生纷纷回国，达数千人，与国内学生汇成一股宏大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运动中，工人也参加了，商人也参加了，妇女也参加了，小学生也参加了，甚至部分警察也参加了。这是一个全民性的爱国运动，最后以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签字而取得了光荣的成果。

3. 五四运动是文化运动：“五四”的示威、游行、演说，在事件结束之后是过去了，但五四运动并未过去，反而因为这些事件而深化，走向更高的文化反思的层面，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官僚？出现军阀？出现帝制？为什么中国不能行使民主？不能尊重人权？不能推行西方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中国的生产落后？没有科学？没有技术？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为什么一蹶不振，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在这种情形下，“五四”青年怀疑是不是我们的文化已衰，成为进步的障碍？从洋务运动我们学习西方的生产工具，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学习西方的政制，结果都未能改变中国的固有面貌，这是不是表示中国的腐朽力量仍然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彻底予以打垮呢？“五四”以前，这些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了，民主和科学通过《新青年》杂志的介绍已经传进中国，但传统的社会结构仍未改变。“五四”以后，西方思潮大量涌进，白话文学运动兴起，妇女地位提高，出版事业迅速发展，新办的期刊如雨后春笋地出现，新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团体也被组织起来。整个社会面貌都在改变，“五四”已经从一个民族运动提升、转化为文化运动。在这个文化运动中，基本上有两条主线：

a. 反传统文化，不是反个别封建礼教，而是全面否定、

全面清算。在这方面，“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比前人态度激烈得多。

b. 服膺西方文化，引进西方思想，尤其是民主和科学，被认为是改造中国的良方。

由于有这两条主线，所以有的学者根据第一条认为“五四”是打倒传统，破坏传统，所显示的是一种自我批判精神；有的学者则根据第二条称许“五四”为新文化运动，甚至将之模拟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显示一种开放精神或开创精神。

## 二、从忧患到担当

如上所述，“五四”所显示的，有几种精神：

1. 青年精神、抗议精神，或纯道德理性精神，只要是义之所在，即奋起遵从；

2. 爱国精神，或民族精神、反帝国主义精神、革命精神等；

3. 自我批判精神，或反传统主义精神；

4. 开放精神，吸收外来文化；或开创精神，在批判传统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为中国创造新文明。

以上这几种精神，论述“五四”意义的学者都注意到了，

不过是各有所重而已。例如，如果着重历史事件的，则大都强调“五四”的爱国精神；他们尤其注意到历史的发展：列强的步步进迫，从鸦片战争到“五四”，中国的危机愈甚，但官场的腐败与保守势力，思想上的顽固却始终如一，中国不能再向下沉沦，所以必须奋起自救。这可以说是从现实的催迫中所激起的爱国思想，有极强的使命感，所以“五四”所采取的表达形式是集会、游行、示威、暴力，因为不如此不足以冲破顽固的制度和观念。但如果从事文化反思，便不可能如此动荡。要对一种文化进行批判或开创，首先要有冷静的思考。可惜的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虽有这样的气魄，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目光来完成。他们从历史的教训中获得一个印象，就是传统文化阻碍中国的进步，或阻碍对西方文化的摄取过程，所以必须集中力量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全盘否定，以寻求传统文化的自杀，因此当时花在这一方面的力气，远较西方文化的引进介绍大得多。但从历史教训所获得有关传统文化的印象不过是一些僵化了的文化形式，并未深入骨髓，例如“五四”知识分子不断攻击“吃人的礼教”之类，便只是停留在文化表象，并只注意到一种僵化了的文化形式对社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而不了解作为一种文化修养的另一方面的礼教的意义。结果，由于这种批判，使



中国人造成了“传统的一套是不行了”的心理，把传统完全扔掉；但对新时代的文化，其内涵是什么，却大都茫然。总之，“五四”时代对传统文化的攻击是有相当破坏力的，但对新文化的建立，却未能有同等的功勋。所谓“凤凰涅槃”，不过是“五四”时代反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一种天真的设想而已。

尤有进者，“五四”知识分子并未了解文化现象与文化根源的区分。他们只看到中国的某些文化现象不如西方，于是便要把中国的文化根源拔起，以依附西方。所以就此方面言，“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攻击，使“五四”的消极意义大于它的积极意义。因为批判是消极的，创造才是积极的。自然有些人可以辩护说，“五四”所开创的新文化迄今尚未完成，由“五四”所引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主义中国还需要在未来的岁月中加以实现。其实七十年的岁月已经不算短，已经足够检证一个理论的正确性，尤其是比起邻近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便知道中国的蜕变最痛苦，也最漫长。不过此刻我所提出的问题并非新文化的创造所需要的时间问题，而是中国文化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先死亡吗？抑或传统文化仍有它的时代的活力？不见得传统文化与自由、民主不能并存。在逻辑上我们说两个东西不能并存必然是在同一层次上说，或

处理着相同的问题,但民主和礼教并非完全同属于一个层次,两者的关系亦并非二分而又穷尽。礼教属人的修养,民主则是政治的体制与运作,二者原可并存。由此一例我们可以想到“五四”时代的文化反思尚是较为肤浅的,对传统的了解固然不够深刻,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亦很浮泛,但为什么却要坚决地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打倒传统?除了民族的挫折感、屈辱感以造成一种对传统的嫌恶心理以外,还有何理由?以致今天我们认识“五四”精神,亦以打倒传统为其首出之义,岂不奇怪?

其实我并不以为“五四”的杰出精神在消极批判,纯粹从反对的方向来评估一种精神的表现是没有意义的,那只有造成一种虚无。五四运动不错是要创造一种新文化,但这种新文化亦并非一味要模仿西方,而是中国文化在遭遇到忧患的时候,化解其忧患,吸收、涵摄异质文化,以辩证地完成其自己的发展过程。所以主根在我、弘发在我,这样才能饱经忧患而长存于世界。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文化不经外来文化的挑战,也没有一个文化不遭逢忧患,但有挑战便有响应,有忧患便有消解。《易传》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可见文化的创造便是因忧患而生,所以最重要的不是逃避、不是恐惧、不是自怨自艾,而是担当,即“作易”,在危机感中转出

使命感，在绝望中涌现出创造力，以转弱为强、转危为安。中国文化能够屡仆屡起，我想未尝不是这种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所致。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前者是忧患意识，后者便是担当精神。“五四”青年面临民族危机，不忍见国家之亡，而自觉负有伟大的使命，这就是担当；其动力完全来自内心，而并非出于外在的要求。这种精神，原是儒家理想主义人格教育的精粹。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又说：“当仁不让”，而智仁勇三者，谓之三达德。孟子亦以“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来鼓勉学生，以便在危难的时候可以肩任艰巨。中国历史就由儒家所教育的担当精神披荆斩棘，开创道路以前进。中国历史上没有工人，因此也谈不上工会力量。农民虽多，但一向散漫，无政治意识，亦无野心，唯一表现其力量的，是在天下大乱时追随读书人起义。所以承担中国民族的命运，维系中国文化的统绪的，是儒家的教育精神、文化教育。没有这些教育，“五四”青年是否可以有这种爱国精神和抗议精神？这是可疑的。因此，“五四”的口号虽然反传统，但它的精神动力，却从传统的文化中来；尤其是那种不顾个人安危，以整个民族和整个文化前途为己任的弘道精神，更是中国文化的胸襟气度的表现。“五四”青年把这些精神表现

了、发扬了，把这些教育理念履行了、实践了，这就是他们令人景仰的地方。

### 三、传统文化的滋养与对待异质文化的态度

如上所述，“五四”青年实在并未背弃传统；相反，他们的行动根植于传统，并体现了传统的某些价值，在行动指针上，他们打倒传统，但促使他们产生这种打倒传统的动力，却仍是来自于传统的教育，这可说十分吊诡。但若了解中国两千年来的文化土壤、两千年来所培育的读书人的人格模式和价值观念，便一点也不奇怪。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不是客观知识的传授，而是人格的修养和对“道”的体认。“道”是什么？形上一点说是人生和宇宙的活动原理，简单一点说则是传统文化价值的继承的守护，所以“卫道”十分重要；虽然在“五四”时代，“卫道”并非赞颂之语，反而成为象征顽固保守的贬词。但在传统文化中、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道”有着极庄严的意义，一切忧患与担当，都是因“道”的衰微而起。所以在时代中，政权兴替、外敌入侵、文化冲突，牺牲的往往是读书人，特别是作为一个维护民族生命、维护文化道统的表征而牺牲的读书人。远如文天祥、史可法，

近如谭嗣同、秋瑾、邓拓。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中国民族的基调，在历史上所产生的鼓舞和引导作用无从估计。由于读书人对这一力量体会最深，知道这才是中国民族永不衰亡的根，所以负担亦最重。在道德的世界，人不能要求别人，只能要求自己；当一悲惨的现实已经形成，卫道者便只有牺牲，以牺牲自我来成全“道”，来证明“道”的存在，同时使人不要屈服于现实，要在现实的桎梏中重获人的精神自由。这是中国文化的可贵处。比起西方，西方的知识分子可以为客观真理、科学知识而牺牲生命（如伽利略），一般的群众亦可以为宗教信仰而奉献所有，但他们不会为维护一个文化传统而牺牲，这就是中国的读书人与西方的知识分子的不同处。

中国读书人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深一步发掘，则我们可以说，中国读书人对“道”的体验，已形成一种精神修养的崇高境界，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和文天祥所说的“正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种“浩然之气”，所成就的是人格世界、道德世界；可以抗强权、担道义、抛头颅、洒热血，但却不能成就客观知识，所以中国读书人与西方知识分子所卫的“道”各有不同。

若从这—文化资源来看“五四”，则“五四”青年尽管

并未自觉他们的精神境界，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有所表现。至少，传统文化已尽了哺育的责任。因此，“五四”时代的打倒传统、自我批判，可以理解为中国文化自知其局限而要求突破，以完成其对异质文化的涵摄的辩证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对立面：一是传统的文化教育，特别是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的教育；二是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僵固的文化形式，即旧礼教、旧体制。前者是中国文化进步的动力，后者却是民族前途的障碍，并且在长期的运作中，成为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五四”把这个矛盾激发出来，亦即是前者来冲击后者，使中国新生。我认为：我们应该从这—个地方来认识“五四”的意义，并了解中国文化的活力所在。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其实并不保守，它是要求不断地超越、不断地开新，孔子本人就是“圣之时者”。因此，“五四”时代提出来的一个看法，认为传统文化障碍中国的进步，障碍我们对西方文化，如民主、科学的吸收，是偏断的，只从当时的文化现象看问题，而未了解这是历史所形成的僵固形式，正需依赖我们的担当精神、开新精神来加以突破。

其实，从社会结构上看，不同文化担任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一个社会往往是多元文化的结合。过去由

于地域分隔，各大文化独立发展，于是各显精彩：西方的民主、科学，印度的精神解脱，与中国的人格世界，谁也代替不了谁，都是人类的智慧的创造。今天信息发达，交通迅速，文化独立生存的空间已经不存在，无必要坚持历史形式，亦无必要舍己从人，最重要的是认清各个文化体系的贡献及其作用领域，中西价值观念所成就的世界是什么世界？例如由民主所成就的世界、由科学所成就的世界、由人权所成就的世界、由公有所成就的世界、由信仰所成就的世界、由道德或良知所成就的世界、这些世界不一定冲突，尤其是在其源头上看，都是来自人的庄严的、合理的追求，有其必然性、神圣性，所以在历史上都曾经被许多人所接受、认同，而发挥过伟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将之综摄融贯，以成为全人类的价值观念呢？“五四”时代一定要先打倒传统，中国文化自杀，才可以移植西方文化的想法实在太偏激、太幼稚、太情绪化，而未了解文化的构造是多元、多层、多向度的。一定要简化淘汰，结果是先要有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死亡，真是愚不可及。“五四”以后，七十年来，中国读书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似乎仍在不断地挖自己的根，以便作更彻底的否定，令人悲叹。这样下去，只会把中国人的精神涣散，而漂泊无依，空有黄皮肤、黑头发的种族，但却是没有魂灵的躯体。

#### 四、永远的“五四”

由此可知，“五四”精神在于担当，在于卫道，在于超越现实困局而使民族再生。它产生的动机本来就是为了爱国，并不是爱西方；它摄取西方的文化资源目的是回向自己、充实自己、发展自己，以响应并涵盖西方的挑战，并不是要把自己改造成西方人。这一个基本立场十分重要，只要承认有这一个立场存在，中国文化便不能连根拔起，而需要有所护持。尽管在护持中我们可以有种种做法，乃至自我批判，但并不影响我们的中国文化意识，亦不影响我们对西方文化价值的尊重。因为忧患不是自卑，担当不是排斥，那只是中国文化自觉地要永存于世界的历史意识、悠久意识，那是中国民族生命的源头活水，所以今后不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只要是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国格，为先贤延统绪，为子孙享和平，都会和“五四”精神相契相承，因为这其中流动着人类最宝贵的良知和勇气。

本文原为出席1989年在北京举行之“纪念‘五四’七十年学术研讨会”上所发表之论文，后刊《法言》革新号第一期，1989年6月。



## 超越“五四”、超越中西文化的对立

五四运动七十一周年了。五四运动的积极意义是争取民主、迎进科学、开启民智、发掘人性的新图像、寻求中国参与世界的新文化的基础；“五四”的消极意义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批判传统、抛弃中国文化，有立有破，两面同时进军。不幸的是，经过七十年，民主与科学仍然停留在口号阶段，民智仍然蒙昧，知识分子仍然依附在政权上生存；而反的一面，则仍有人嫌不够彻底，要把传统文化视为“历史积淀”予以对付、清除。七十年了，中国人基本上仍在原来的思维模式上转，何能进步呢？

### 可悲的重复

年年纪念“五四”，年年重弹旧调，用李泽厚的话来说，是“可悲的重复”<sup>[1]</sup>。最近，国内学者终于提出“超越‘五四’”的新口号，我认为在观念上是有了突破，十分可喜，但

可惜在内容上提得不够具体，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超越就是把传统不仅当作主体文化背景，而且把它对象化为客体，清醒地认识它、转化它、扬弃它。”<sup>[2]</sup>这就不是超越“五四”了；这不过是更激烈地继承了“五四”对传统的批判而已。自其本质上说，亦正是一种“可悲的重复”。

没有志气，中国人永远翻不了身

真要超越“五四”，必须超越“五四”的思维格局。“五四”中人把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误以为西方的民主、科学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典范，有普遍性、有必然性，于是以之作为标准来改造自己，以求中国文化自行“涅槃”。为了替西方文化的进入清除障碍，“五四”中人对西方文化并未认真研究、恳切学习，反而只是集中力量来拆毁自己的城墙，从事内部斗争。“五四”中人面对西方强敌，已经丧失斗志；他们不敢思维西方的弱点，亦无涵盖敌人的气度，反而只是仰慕敌人的强大，希望自己变成敌人的样子，这在心理上已经屈膝了。没有志气，中国人永远翻不了身。“五四”中人对传统文化虽然凶巴巴，但不能对外，对外的时候，只是可怜的自卑者。

没有志气，这是亡国的征兆。就是要我们自己能站得住；虽外无凭借，仍然无惧。这不是依赖血气之勇，而是依赖三千年来使我们得以站立的文化，文化是生活的智慧，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使中华民族能够历经险阻而依然屹立的重要原因。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民族生存的最后根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根基拔除呢？我们现在很难了解“五四”中某些人为什么那么愚昧和狂乱。

也许“五四”中人所看到的中国文化全是负面，透过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的眼镜，中国文化几乎一无是处，所谓“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这当然是要全部予以粉碎的了。他们只有嫌其粉碎得不彻底，更不会明白这个文化对自己所曾作出的伟大贡献，同时是使自己能生存下去的力量之源。

## 超越“五四”的思维方式

“五四”中人对文化的了解是一维的 (one dimension)，并不知道文化的多维性格，更不能体会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价值源头。从价值源头上讲，世界上的每一支文化都有正面意义，都要成就一些价值理想，例如希腊人对知识的探

求、希伯来人对上帝的依赖、罗马人对律法的制定，乃至共产主义者争取平等、民主斗士重视人权，都是依于人的内在要求而出，于是开出无数价值世界。这些价值既然内根于人，即有其不可灭绝的需要。它们构成冲突，只是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历史行程中落实的结果，并非不可并存。一定要消灭一个理想来成全另一个理想，太偏激了，也太悲哀了。为什么不梳理这些理想与不同的价值观念，为它们划分分际与建造阶梯呢？“君子和而不同”，这是传统文化对独立人格的尊重；现代民主社会，则以法律保障人权，我看不出两者需要动刀枪。过去我们文化中没有充分发展出来的东西，如民主和科学，现在可以有，却不必先剪断自己的根。这只要看当今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都没有这种要求自己文化先死亡的例子，可见“五四”中人的思维方式是错了。

依佛教说，人必须为自己的无知偿付代价。“五四”的对立格局，使我们纠缠在中西文化论争史中七十年，愈刺伤中国文化愈引致痛苦的挣扎，时间亦愈浪费，精力亦愈消耗。现在是超越“五四”的对立格局的时候了。

“五四”中人的根本错误是把中西文化看成两个对立的实体，同时以西方文化为典范，于是采取简单的“非此即彼”

的斗争方式来解决，历史文化是流动的，它不只有弹性，而且有发展性、涵摄性，其间的消长全视乎它的生命力而定。这个生命力就是自信。即使我战败，我仍有权过我自己的生活；即使我接受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这仍不表示中国的德治的价值理想失去光彩。一定要把中国的德治解释为人治与独裁政治，那不只是侮辱祖宗，而且只有说明自己的卑下。我并非要国人妄自尊大，而是一个民族在忧患中不可失去自信。“五四”中人有忧患感，这本是复国兴邦的动力，可惜在具体思维方面错了，在实际工作方面也错了。七十年来，我们不只在政治上内斗，在军事上内斗，在文化上也内斗。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凝聚力呢？当然是花果飘零了。

我希望海内外的中国人都来深思，尤其在纪念“五四”的时候。

原刊《法灯》95期，1990年5月

**注释：**

[1] 参李泽厚《“五四”的是是非非》一文，《论传统与反传统》一书收。

[2] 参包遵信《从启蒙到新启蒙》一文，《从“五四”到新“五四”》一书收。

# “五四”八十周年纪念与再出发

——继承“五四”，深化“五四”，  
完成“五四”

有关“五四”的分析、讨论、回顾与研究，可说是十分多。随着历史的发展，会带来新的看法；新的元素加入，结论便会与过去不同。所以历史是不断地有诠释，祈能予以挖深，但亦可能偏离，愈走愈远。“五四”也一样，尽管“五四”至今已八十周年，但我们不妨先问自己，我们是否真的了解“五四”呢？抑或我们只是盲目地跟随一些对“五四”的看法，人云亦云呢？我深深感到这是必须重新加以探讨的：一方面要根据当时的历史事实，一方面更要深入历史背后的动向，然后才能真正了解“五四”。历史事实只是历史的材料，对材料的消化、贯通，然后提出较深入的诠释才重要。

## 一、“五四”的定位

自从周策纵先生之《五四运动史》出版之后，陆续有这方面的著作发表，历史方面的资料大致已经清晰，所欠缺的

是我所说的第二个层次，即较深入的诠释。我的演讲，就是想做这一个工作。不过，在提出我的看法之前，我想先为五四运动作历史的定位。

“五四”到底是一个学生运动？民族运动？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思想的运动？争取自由、独立、思想解放的运动？还是一个反封建、反独裁、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文化运动？学者之间会有不同的取向。我认为以上的说法都各有根据。首先，“五四”是一个学生运动，因为这个运动的主体、承担者是学生。1919年5月4日上午，北京十三所院校学生决定当日下午一时半集合举行示威游行，当时的警察总监和教育部都有派官员去劝阻，但学生们不为所动，有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合。“五四”运动便这样轰轰烈烈地揭开序幕。就其参加者与承担者都是学生而言，“五四”是一个学生运动是十分清楚的。第二，“五四”是一个民族运动、爱国运动，这是从“五四”发生的导火线，或者从“五四”的历史背景来讲：1918年，即“五四”的前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是战胜国，但1919年1月至5月期间在巴黎举行的和会中，中国不但不能以战胜国的身份获取其应有的权益，反而各国决议将德国在中国胶州湾的权益转让予日本，并要求中国签署屈辱的《凡尔赛和约》。消息传来，举国哗然，当时很

多学生、商会乃至海外的侨团，都纷纷致电巴黎，支持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人，但由于外国代表和当时美国的总统威尔逊等背信弃义，未能成功，致令中国人民对外国人完全失去信心。中国人自觉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不再屈辱于列强之下。所以“五四”的口号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就这方面来说，“五四”很明显是一个民族的自强运动、爱国运动。第三，“五四”是一个新文化运动，路线有二：首先是反传统、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因为本国政府无能、军阀卖国、列强俟机欺侮，中国的积弱不单是现实的政权腐败的问题，或制度的落后、僵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化的问题，特别针对与封建思想、独裁政权有关连的儒家礼教、孔子思想，当时的国民认为这是中国封建落后的根源，所以必须铲除。当时又有所谓“反汉字”，批评汉字难写难读，如钱玄同等人的激烈主张，所以要一举反掉云云。其次对外方面则反帝国主义，反抗外国人的欺侮，这是民族运动的必然引申，相比之下，“五四”中人反传统比反帝国主义来得更为有力。因为帝国主义之所以有机会侵略中国，其实是中国积弱的问题，所以认定传统文化才是罪魁祸首。第二条路线则并非消极的反传统，而是积极的建设新文化，所谓新文化运动，也是此意。新文化的内容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主，即民主(democracy)



和科学 (science)，大家似乎一致认定：这是中国复兴所必需。所以一方面要反传统，一方面要迎入新文化。用胡适在1920年所写的文章对“五四”的总结，“五四”要做的工作是“价值的重估”。其实，这本来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话。尼采要高举自我，而且要不断超越自己，成为“超人”。最后，他的自我成为一切价值之中心，所以他宣布上帝死亡，自为价值之主。我曾经说过，尼采的思想、尼采的遭遇，乃至他晚年的疯狂，已预示了20世纪人类的命运：尼采的狂妄即是现代人的狂妄，与其说是求成为超人的哲学，不如说将自我投入无限的虚无。试想，在无限的虚空之中，你算是什么呢？你可以超越什么呢？所以结局必然是疯狂。这一点，胡适当然不知。其实，他根本不懂尼采，他只是觉得此语适合，随便拿来借用。所谓“价值重估”，到底用什么标准去重估呢？“五四”的取向以民主和科学为标准，后来再加上“自由”一项，争取个人的自由，如易卜生的戏剧《娜拉》，鼓吹人要走出家庭，不要束缚，意即要走出封建社会，建立自我，其实底子里即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所以，所谓“价值重估”其实全依西方文化为标准。但“五四”中人其实并不真懂西方文化，只是看到西方表面上的强大便如痴如醉。即使八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似乎还未

清醒。正如我看到今天很多报刊的纪念文章，还有很多人认为“五四”至今八十年来的努力，除了科学获得若干成果以外，在政治上的民主制度仍未建立，所以今后要继承“五四”的路，必须继续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云云。

这种思维其实仍脱不出“五四”的格局，即仍脱不出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格局，十分可悲。我们一开始便丧失了对自身文化的信念，更丧失了振兴自身文化的勇气，反而心随境转，盲目跟随，结果造成更大的创伤。“五四”青年的救国心必须赞赏，亦很伟大，但我认为：这正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承担精神的表现。其实，所谓学生运动，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在汉代的太学生已因反对朝政而起来抗议，形成“党锢之祸”，之后在中国历史上，学生运动从未间断。唐君毅先生有一短文《一千八百年来的中国学生运动之历史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一书收）大家可以参看。我亦曾在前文《忧患与担当——论“五四”精神》中指出五四学生运动在精神上是继承着传统中国读书人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感与承担精神，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都不忍见中国的衰亡，所以不惜上街示威，不惜牺牲自己，站出来号召天下，希望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完全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可贵的人格与节操，完全来自于传统历史文化的滋养，所以才能如此。

但这一点，却很少人注意到。

## 二、历史运命中的张力

在历史的现实中，存在着很多的对立、矛盾和复杂性，可称之为“张力”。“五四”中人渴望革新，当时《新青年》杂志经常歌颂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因为它们都带着强烈的破旧立新的意识和革命的激情，给人一种浪漫的想象，热血的青年接触这些思想的确是很容易受鼓动的。由于救国心太切，又对中国传统文化失望，使当时从西方输入的思想决堤而入，不论何种思想传来中国都有市场：革命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十分混乱。而年青人则好象是知识的饥渴者，一有新思想就接受，就模仿，然后加以推行，但实质上只是饥不择食，只是一知半解，自己也不清楚究竟自己在信仰什么、推广什么？而《新青年》则极力散播这些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每一期《新青年》出版，青年人都争相购买，很多人都给迷住，当时曾经有读者投稿说：《新青年》好象惊雷一样，将他震醒，可见它对青年人的影响力。当时毛泽东在北京的图书馆做管理员，他的自传说当时自己

的思想模糊，只要是新思想就会去学，最先喜欢康有为、梁启超，后来《新青年》出版，就转而欣赏陈独秀的激进主张，甚至崇拜过胡适。《新青年》所标举的是一种反传统、崇拜西方的意识，当时的陈独秀、钱玄同、鲁迅、胡适，便是最激烈的反传统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比较维护传统文化，对旧学比较了解的读书人，如章太炎、林纾、严复、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等，则被称为保守派，并与激进派抗衡，引起中西文化的论战。由于思想不同，信念不同，大家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又有很大距离，加上现实的苦难压力太大，许多问题都很迫切，根本没有时间让他们冷静下来思考、讨论，所以结果必然是分裂。一群本来怀着共同的救国理想的青年，由思想上的距离、由理论的争吵到人身攻击，什么言辞都会用到，终于各走各路。因为大家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为争胜负，都进一步寻找现实的力量支持自己，于是便与政治结合，演变成现实的斗争，而且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暴力、越来越危险。所以“五四”的历史命运，最后由文化运动演变成两股力量的斗争，使用暴力，走向武装革命，而“五四”本来作为一个文化运动的目的，亦慢慢被扭曲，转变为一个政治运动、革命斗争。结果，新文化运动的内容，由本来所讲的科学、民主、自由，在现实的力量张力下，终于转而为政

治革命，社会主义中国产生。这是“五四”运动在方向上和内容上的扭转，而这一点是大部份研究“五四”的人士所忽略的。

有人曾经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发生在中国的一场启蒙运动，即这是对中国人的“启蒙”。我曾多次指出这一提法不太恰当。启蒙运动是18世纪西方文化运动的概念，其源头来自西方16世纪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抬头：人自觉到要从专制的宗教权威中解放自己，发挥人的独立性、自主性，重视人自身的才情与价值，尊重人的独立思考，由此起步，所以17世纪是理性的时代；由理性的思考必然进一步发现人的权利，进而争取人的权利，保障人的自由，所以有18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意即人要醒觉自己原有的权利，而且要争取自己原有的权利。“五四”中人觉得当时的中国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任由统治者宰割，所谓“奴性深重”，所以必须经历西方式的“启蒙”，然后才可新生。他们又感到中国人一直被家庭安排、被祖宗安排、被礼教规范，人没有自由，所以人要反抗。简单说即是要“解放”，从愚昧中把自我解放出来。所以“启蒙”意即预设中国文化的落后无知、封建迷信，对中国文化完全是负面的了解。这是非常偏颇的，其实“蒙”字出于《易经》，指小孩子虽然幼小无知，但内心是真

纯的，所以卦辞说“蒙以养正”，是讲人的教养与生命的成长，必须自小教以正道，意思是很正面的。但“五四”中人却误用来比附西方十八世纪的政治思想运动，其实这也是一种扭曲。不过更可悲的是，我们不但不察觉，反以这种错误的了解来批评自己的文化，并讥之为落伍愚昧，要用西方的理性来“启蒙”我们，这不是颠倒是什么？进一步顺此思路解释“五四”运动，有李泽厚所谓“救亡取代启蒙”说，即指“五四”原是一个“启蒙”运动，但“启蒙”不成功，后来的救亡运动则成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象征着一百年来中国被列强欺侮的惨痛的历史的结束，所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全世界的中国人听到都很感动，都为此而流泪。为什么如此？因为这正是“五四”的原始动力，“五四”正是要中国独立、自强更新、不受外侮，不过这并非完成于“五四”中人之手，而是完成于毛泽东，至少，在国家的独立上是如此。不过，虽然救亡成功，但“五四”对文化的反思，所谓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却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却是另一种新的、不过也是来自西方的内容——共产主义。为什么会这样？历史是不是有线索可寻？

正如上文所说，这是由于历史现实的压力。有很多学者都指出：“五四”之后的中国，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

当时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去讨论文化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先更换政权，即是要先革命，革命重于一切。在现实的逼迫下，似乎这是唯一的选择，唯一的出路。但是，国家、民族的独立原来应该是针对列强的欺侮、压逼与侵略而言的；换言之，即应该是对外的，但中国的革命却不是对外的，而是对内的：即先自行解体，由内部斗争，到内部自我决裂，然后建立社会主义下的新中国。至此，原来“五四”的共识究竟剩下多少呢？从爱国方面看，新中国的成立是这一路线的延续而且取得成果；但若从新文化，特别是自由、民主、科学的迎入上说，则方向扭转了。所以，评论“五四”的成败，并非以科学、民主和自由是否已经在中国生根了为标准这么简单。我们必须再深思：五四运动的意义何在？

### 三、八十年的回顾：“五四”成功了吗？

首先，如果成败的标准放在民族独立这一点上，虽然从“五四”到今天，中间的代价很大，一方面是内战的消耗，另一方面是自身文化的摧残，中间经历了许多痛苦，但毕竟还是成功了，我们得到独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虽然得到独立，但我们的形势依然险恶。今天，即使冷战结束，

中国开放，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多少仍受外国所敌视。美国虽然表面上与中国友好，但内里却仍视中国为假想敌，拉拢日本和中国台湾，以抗衡中国的力量；在意识形态上则散播中国霸权论，意图挑起东亚乃至欧盟诸国对中国的防卫心理；表面上以人权观念作武器，批评中国不尊重世界的共同价值，其实说穿了不过是冷战时期对立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延续。从这些地方看来，中国所面对的外来的压力或危机，其实尚未解除。

第二，若从反传统文化这一方面看，“五四”重估一切价值，批判传统文化是否成功？这可说是相当成功。事实上，“五四”未完成的批判与对传统的反动，在其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延续着，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仍被当局所继承，而且越演越烈，似乎攻之犹恐不切，好象要将一切过去的东西，不论好坏，通通反掉才甘心。文革之后，一切宗庙、祠堂、传统的风俗、节日、历史文物，几乎反得的都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被连根拔起，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变得空前的虚无。没有了灵魂的中国人还算是中国人吗？也许我们已不关心我们是不是中国人，我们只关心中国的富强，但没有自身文化的支持，这富强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三，从建设新文化上看，“五四”宣扬吸收西方的科学、



民主与自由，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科学的确是起步了，但比起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似乎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今天我们还要“科教兴国”。不过，相比于民主、自由，则似乎比“五四”时代还要倒退。“五四”时代是很自由的，至少，当时的杂志、报纸、刊物，可以自由出版，集会、示威，也比较宽松。为什么经过八十年的努力的结果反而是倒退呢？此中有一些理由是可以说的。因为民主、自由对中国人来说是太金贵的东西了，我们浪费不起。我们现实上的危机一直并未解除，现实上的中国仍然未够强大。换言之，我们根本未有充份的时间和资源、质素，可以让大家一起用民主的方式讨论、或去争吵或去浪费。尤其是在救亡尚未完成的时候，我们更加应该将所有的资源和时间拿来救国，而不是拿来互相批评。当然，西方人会反对这种观点，因为对西方人来说，个人的权益比起国家的集体利益为更重要。正如克林顿在1998年访问中国，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引用胡适的话，说：“如果有人叫你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千万不要相信。”这是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立场，认为人的神圣权利不可侵犯。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时中国没有人响应：难道你（克林顿）忘记了肯尼迪就职时的名言吗？肯尼迪对着千千万万的美国人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先问你为国家做了

什么。”可见国家精神、民族精神，始终超越个人，始终是凝聚个人的真谛。由此说回来，从建设新文化方面看，“五四”的确是失败了的，至少，由“五四”所揭橥的方向，即对西学的吸收，至今是尚未成功。反而“五四”从文化转向政治、转向革命，在思想上转向共产、转向现实，结果引致生死之争，这是“五四的转向”。但今天讨论“五四”的学者，在这方面似乎尚未留意及。

#### 四、问题在哪里？

“五四”何以转向？何以有未竟之业？问题在哪里？我认为：第一，当时爱国与救国，是大家的共识，但“五四”中人却误将爱国与反传统相提并论，以为要救中国必须先打倒传统文化，令民族感情与民族文化形成对立，亦即自我分裂，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最后竟以为中国文化不死，中国人便没有救。这到底有什么根据？不单幼稚、肤浅，而且是太激情了。但当时居然有很多所谓知识分子大肆宣扬。至于青年人则根本没有思维能力，他们只有热情、只有热血，对这些歪论深信不疑。所以当时一些比较爱护传统文化的读书人批评这些言论“毒害青年”，并非是没有理由的。为什么一定要将

我们的民族和文化对立起来，为什么一定要我们的民族文化先行自杀，然后才能救中国呢？郭沫若有一首诗名为《凤凰涅槃》，以凤凰譬喻中国，说中国必须将自己投身于烈火之中，先烧死自己（涅槃），然后才能获得新生。其实，这只是诗人的设想，或文学的迷思。他的愿望是中国强大，但却不知道中国强大靠什么？难道靠科学、民主、自由，或革命这些东西就可以了么？这些东西只是工具或手段，它们不是我们民族存在的目的。没有了灵魂、没有了精神的人，有再好的工具也没有用。所以如果没有一个精神立足点，人是会变得很幼稚的。但人的深度怎样来？便要靠历史文化陶养：一方面是读书，一方面是体会与深入，所以最重要的关键是生命成长，才不会被纷乱的言论和虚无的价值观所颠倒。但近百年来，我们几乎完全放弃了传统教养我们成长生命的文化，反而攻之唯恐不力，这是“五四”最大的错误。

第二，由于错认中国落后的责任者为传统文化，致令新文化运动出现重大的内部矛盾，政治力量有机会介入，使新文化运动转变为现实上的政治斗争，要夺取权力，或通过权力来实现理想。结果令中国再次走向暴力革命，不能运用理性方式，亦不能等待教育成果。当革命的激情迸发，其他一切的文化价值都必须放弃。因为革命是最重要的，为了完成

革命的理想，其他的東西都可以犧牲，所以毛澤東的詩說：“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歌頌犧牲的精神。為了完成革命，一切的時間、精神和資源，全部用上了，所以要“統一戰線”，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這是一個大潮流，沒有人能夠反抗的；而你身處當中，你亦很難不受影響、很難不卷入其中。這便是現實的逼迫，人是很难自外的。當“五四”發展到這個階段，“五四”的文化精神亦守不住了。

第三，由於“五四”的文化運動缺乏一個深刻的文化反思做基礎，“五四”中人對其所宣揚的科學、民主、自由完全沒有深刻的了解，亦不明白西方這些價值觀念的來龍去脈，及其背後的根據，對其思想的源流更是一竊不通，但卻急于救國。面對西方的強大，又抱著強烈的欽羨和自卑的心理，無處發泄，只有拿自己的傳統文化來開刀。即凡西方的皆好，凡傳統的皆反，十分極端。到底自由、民主是什麼？科學是什麼？它們能夠成就什麼？它們有什麼局限？它們是不是唯一的價值？現代化是否一定要以西方為標準？中國可不可以有我們自身獨特的現代化進程？如有，它的內容是什麼？為什麼西方文化由文藝復興開始，走到今天的所謂現代化文明的历史進程，我們必須照樣跟從？它有普遍性嗎？它有必然性

吗？“五四”至今已经八十年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人还是脱不出“五四”时代吸收科学、民主、自由的思维格局。为什么这样？如果讲现实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的战败，我们技不如人，我们心理自卑。但这真是理由吗？武力与文化本来就是两回事，汉族政权过去亦曾经数次亡于文化较低的外族，如亡于蒙古人和满族人。他们虽然没有很高的文化，但有的是原始的本能，如蒙古人，文化不高，但却由亚洲打到欧洲，建立前所未有的帝国。但是，以武力建立的国家，又能维持多久呢？蒙古人和满族人虽然征服中国，但最终还是被汉族文化所同化。武力能够逞威一时，但文化才更久远。文化，尤其是中国的文化，正是要将人性里面的原始本能慢慢化除，以教养来化除其戾气，使之变得有修养、有内涵，进而体认生命的更深的价值。这本是我们传统文化可贵之处，也是西方文化所不能企及之处。但“五四”中人根本无此认识；不但无此认识，连民族的志气也失落了。虽然，民族志气、民族精神的衰落并非起源自“五四”，清朝以异族统治中国数百年，已一直有计划地压抑中国文化，只容许读书人从事训诂考据之学，使文化的精神树立不起，但毕竟数千年的文化有着极强的韧力，还是薪火相传下来，所以才有辛亥革命、学生爱国运动。但经历“五四”的盲目破坏，对传统文化造成

了极大的创伤，使民族生命斫断，这是无法弥补的，“五四”中人必须为此负责。我们有否认真想过：中国立国之本到底在哪里？在科学？在民主？在财富？在武力？在动物性的生存本能？这是极严肃的问题，但“五四”中人无此思考，亦无时间思考。时势紧迫，我们可以谅解。但八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改为赶着发展经济，仍然没有时间。八十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好像原地踏步？我们有的只是口号与激情：批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缺乏对传统文化乃至中西文化深刻的反思，又怎会不付出惨痛的代价呢？

第四，“五四”中人不自觉地预设这五百年西方文明的进程有其普遍性，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适用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其实，这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历史玄学的假设而已，根本不能证明，甚至只是一种迷信。但当西方文化至高无上的假象已经建立，我们便只有跟随西方的价值而转，造成价值标准的外在化，失去自己的根，也失去自信。没有文化精神的支持，剩下来的只是民族心理本能的自我认同，而实质上是自卑。缺乏信念，缺乏对自己文化的深切认识，一味抄袭别人，没有创造力，这样的新文化运动必不成功。

## 五、继承“五四”，深化“五四”，完成“五四”

历史的惨痛，今天我们如何面对？如何继承“五四”？如何推进“五四”、深化“五四”，乃至完成“五四”的壮志呢？

我认为：首先我们要继承的是“五四”的民族精神与爱国精神，但这种精神不能与我们的文化精神相对立，因为民族精神、爱国精神本来就是来自我们传统文化的承担精神，它们本来就是一体，应该互相支持，而不是互相对立。中国为当今世界各大历史文化中硕果仅存的民族与国家，这是有很深刻的理由的，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这种凝聚力量，令我们永不死亡。唐君毅先生称之为“悠久的历史”，我则称之为“永不死亡的文化，法住于世”，她一直支持着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屹立不倒，并为其他民族带来伟大的贡献。这不是一般学者所说的“眷恋天朝旧梦”，而是必须体认到我们的文化的真实价值。盲者自盲，见者自见。即使我们今天已经淡忘，但至少也要虚心体会、不要妄自菲薄。难道国家民族的永不死亡的生命所靠的是武力？抑或生理本能？如是，则中国早就应该亡国。中国之不死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关怀不是个人

的权利或拥有，而是由家族到民族，由千秋万世的历史文化的延绵到《礼记》中所说的“大同”。所以，继承“五四”，首先要继承“五四”对国家民族的承担精神，而承担则应有所开拓，故非有深刻的思维与修养不可。

第二，由承担精神而有开拓精神，则必然进一步对中西文化有超越的涵盖，并对人类文化、人类前途有一种超越的前瞻的能力。鉴往以知来，是中国人本有的历史智慧。真正的领袖，高瞻远瞩，不是等事情发生了处理，更不是头痛医头、脚痛治脚，否则，怎能掌握先机，争取主动呢？

第三，必须深入研究中西文化的现代化课题，如民主是什么？民主制度由产生到实行，今天已超过两百年，但民主是什么？英、美等国实行民主制度两百年，到底产生怎样的结果？西方社会中人的素质的普遍下降与民主制度有无关系？这样下去会怎样？如我们不懂得发问，只懂得如偶像般膜拜它、敬仰它，用它作为唯一的标准去评价别人，有何意义呢？再者，科学是什么？科学、科技的发展会往何处去？它除了为人类带来更舒适、更安全的生活素质以外，它到底潜藏着什么样的危机？近代科技文明自发展以来，有所谓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每一次的推进都为人类文明带来一个新的时代，但除了生产力提高、财富累积外，第二波带来



的问题，其危机尚未解决。资源的耗废与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我们在未来一两百年内将会耗尽地球几亿万年累积下来的天然资源，人如何生存？问题如何解决？是否创造新的能源就可以解决问题？科技的发展现在又有所谓复制生物、基因改造，人生命的尊严和伦理秩序正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科学与科技只是知识、只是工具，我们一直缺少对它的反省，反而只是一味歌颂它，奉它为神圣，而不知它的发展必须置于超越的规范下，否则动而愈出，必定对人类造成极大的伤害。

另外，自由主义是什么？资本主义是什么？未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未来的社会缺失的是什么？如果有欠缺，怎样去补救？在何处有文化资源可供运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发挥作用，以补现代文化的缺失？我们今天还未充分认识。但我可以预言，人类将来如果有希望，则必待东方文化、中国文化重新复兴然后可能。

不过，如果传统文化真有价值，为什么现代人这么难了解呢？显示中间有断裂，有必要对传统文化的典籍重新整理和诠释，以提供给下一代。但这种整理和诠释又必须结合现代文化来进行，而并非只是解章句。如我个人所著《现代佛学》，将佛学核心思想，根据文献、历史、哲学，结合现代的

语言和文化，重新诠释，以认清其贡献，肯定其价值，亦即为其重新定位，无可替代，所谓“法住于世”。我认为这种诠释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否则，我们将彻底丧失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正如传统社会中有很多高尚的人格榜样，但现在已经见不到了。难怪现代人不相信有所谓胸襟、眼光、气度、内涵、承担、修养的人格，甚至怀疑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的真实性，可见现代人的肤浅。人格的陶养来自传统文化，有这样的文化才有这样的人格，一如“五四”的忧患与承担的精神来自传统文化一样。继承“五四”，就要继承这些宝贵的文化。

最后，人到底是谁？康德自信已解答了人的认知问题，即知识问题，又解答了道德问题和宗教问题，但“我是谁？”的问题却仍悬而未决。到底哪个文化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不能等待西方学者解答，更不能全依现代西方科学的道路解答：生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解答只是表面的、经验意义的，根本未能深入。只有先了解“人是谁？”能解答人需要什么的问题，然后才能进一步了解生命的价值究竟立足于何处。必先有所深入，然后方知中国文化的真实之道。这也不是玄学，玄学所凭借的是理性思维，一样动而愈出，故必须另辟蹊径。古人在这方面极有智慧，可惜今人不能继承

而已。

由此运思，要继承“五四”，便要深化“五四”；要深化“五四”，便要通过对东西文化作超越的、客观的、深入的研究，替中国重新定位。这不单是政治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化问题。而且，这亦不只是平面的，所谓中、西文化互相尊重或互相交流的问题，而是深入文化的深处，了解其层次、其源流、其发展、其贡献与其不足。只有先将文化定位，然后才能疗愈自“五四”以来，或自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年以来中国心灵所受的巨大创伤；“五四”的文化运动的目的才能真正完成。

所以，今天我们纪念“五四”，必须超越“五四”的思维格局，用一个更阔、更深的层次去评定其得失、检讨其不足、超越其局限、开发其前途。明白我的话，便知“五四”真正追求的，并非科学与民主，“五四”是要疗愈我们心灵的创伤，要中国自强更新，得到世界各国平等的承认、尊重，不要被人误解、损害甚至践踏。科学、民主只是工具，它不是目的，不要本末倒置。以往“五四”中人没有时间仔细体会、仔细思量，八十年过去了，难道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时间吗？难道我们还要继续重复“五四”以来错误的行程吗？中国人必须重新觉醒，中国文化必须重新站立，才能真正地完成“五

四”的雄心壮志。

本文原为1999年5月4日法住文化书院举办之“‘五四’八十周年纪念讲座”之讲词，后刊《法灯》204—205期，1999年6月、7月，袁尚华记录。

# 惨痛的历史和惨痛的现实

## ——从日本人的侵略到日本人的心魔

中国最近爆发反日怒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沈阳、西安等各大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抗议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企图隐瞒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侵略罪行、批准民间企业到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东海勘探油田；加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年参拜靖国神社，无视中国声明而单方面将钓鱼台群岛列为自己领土，最近还希望在美国的支持下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增加其对东亚及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以重演其上次大战时的帝国美梦。正是旧恨新仇，中国的年轻一代当然义愤填膺。

不过，尽管怒潮澎湃，看来反日运动难以进一步开展。正如许多舆论分析：基于现实利益，中国暂时还不能与日本中断友谊。因为日本的背后是美国，在全球争霸的形势中，美国正把中国看成潜在的对手；美国一方面拉拢中国，一方面防范中国，所以21世纪以来的围堵并未放松，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前线的“警犬”，恰当不过。从日本的立场，亦同样感

受到中国经济日渐壮大的威胁，日本在国际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正在萎缩。日本一向有称霸野心，因此很难忍受中国的崛起，迎合美国换取支持，成为日本唯一的出路。此外，一直想挑拨中国台湾分裂的“台独”势力，也想趁这一机会来分一杯羹，因此主动投靠美日，不惜冒生灵涂炭之险。在这种复杂错综的关系下，中国如何面对呢？所以，分析家估计，中国还没有和日本翻脸的本钱。他们把中国人的和平态度理解为现实利益的算计，认为中国必然忍气吞声，中日矛盾必将暂时搁下。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或者说，历史就是如此的不公道。中国受日本欺侮，自甲午战争起，已逾一百年。《马关条约》，中国失去了台湾、琉球和巨额赔款；然后是伪满洲国、“二十一条”、八年抗战……日本侵略的罪行，罄竹难书。单是南京大屠杀，已有三十万人罹难。抗战结束后，据统计，中国军民死亡三千万人以上，伤者及财物损失，更是天文数字。侵华日军的残酷、冷血，非言语所能形容。我们试看日军“731部队”在中国东北进行的化学战、细菌战竟然以活人试验，就知道此言不虚（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及估计，被毒气杀害的中国人约有二百七十万）。如今，日本在中国还遗留下二十万件化学武器没有销毁，继续在伤害和威胁中国人的生存，

继续污染当地的生态,但日本人不但没有道歉,连承担责任,愿意作出处理、赔偿的意思都没有。

看!这是什么样的民族?对自己所做过的事,对自己所犯下的罪,不敢承认,不敢面对,只想逃避,只想抹煞,但历史是可以抹煞的吗?日本人如此虚伪,如何能获得其他民族的尊敬和信任?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指出:日本这个国家从不道歉,从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一直到宫泽喜一,这些日本首相,李光耀都和他们交过手了,但就是没有一个肯道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加坡人至少有近十分之一的人口被日军残暴地杀害,但日本每一位首相都只是说了一句:“在亚洲历史上,有些时候我们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件。”连李光耀都感觉到:“真是轻描淡写之至。”不错,后来非主流的村山富市出任首相时,是道歉了;但道歉后,并无行动,而且很快他就下台了。

其实,问题不在道歉的话有没有,而在悔改的行动有没有?虚假的言辞说上一百次,也不能改变被侵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心。中、韩的慰安妇不是多次索偿吗?即使证据确凿,但日本法庭就是不赔偿。

为什么日本人对自己犯下的罪行的正视那么艰难?连战败,也诿过于“敌众我寡”,所以他们死后都变成卫国的英灵,

而供奉于靖国神社中，继续他们的崇高形象，以教育他们的下一代。这怎能使受害者放心？

无疑，日本人是骄傲的，这一骄傲有其历史文化上的根由，慢慢就变成了日本人的心魔。首先，日本人认为自己是神的后代，说“大日本乃神国也”（《神皇正统纪》）；本来，若视为神话传说，也无可厚非，不幸日本人却视之为历史，以致后世产生神道，力扬“大和魂”、“神州不灭”等讲法，把大和民族提升到其他民族之上，强调天皇是“万世一系，八纮一字”，即血统的纯粹性与民族的优越性，以满足其自尊需求，而实质非常自卑，很怕别人瞧不起。内心的虚弱化为行动上的狂妄，这正是日本人为祸世界的危机所在。

这是心魔，但迄今为止无药化解。因为除了日本人自己反省、自己忏悔之外，别人帮不上忙。若别人施加压力，则会更加反弹。日本人自认高人一等，又怎会长期忍辱、久居人下？二战期间，德国人亦有这种民族优越感，残杀了不少犹太人，但战后已真诚忏悔，公开承认战争责任，还到波兰的集中营受难者纪念碑前下跪献花。但日本人有同样表示过吗？没有！一个不愿意面对自己罪行的民族，又如何有资格出任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呢？有什么胸襟去维持和平？有什么素养去为其他民族树立榜样？温家宝总理指出：“只有尊



重历史的国家，敢于对历史负责的国家，能够赢得亚洲以至全世界人民信任的国家，才能够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这句话说得很对，但仍然太轻。孔子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日本人希望别人和自己一样，忘记历史；以为以经济手段，便可以买得安理会常任的入场券，未免把东亚各国看得太低。有志气的人，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侮辱呢？中国对日本已经非常宽宏大量，连战争赔款，三千万人的血债都免了，但日本并未感激，反而趁台海危机，兴风作浪，趁火打劫。这样的中日妥协，必然不能持久。

中国，在惨痛的历史和惨痛的现实之前，真要励精图治。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做好国民教育，为将来做好准备！

原刊《法灯》274期，2005年4月15日

# 历史的真诚，良知的忏悔

## ——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祭

从心理学的角度，人对自己要求完美，以赢得别人的尊重、钦羡，甚至崇拜，很容易理解。这是人性中的自然，所以浮士德把灵魂卖给魔鬼，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结果差点堕落。一个民族亦然，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往往给予美化，认为不但可以原谅，而且有充分理由支持，无可奈何的勇往，更显出一种悲壮之美，让后人礼赞。

从某一意义上说，日本人正是这样。日本从圣德太子的时代起，讲“和魂汉才”，便一直把日本意识（和魂）放在最高位置。尽管日本要从中国移植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多方面和各层次的文化，但这一意识并未削弱，反而加强，把日本人提高到神的后裔的位置。文化的内涵不如人，便只有在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上下工夫，加强日本人的危机感，这样才能把日本人的生存力量爆发出来。

从军事观点看，日本人这样做完全有必要。所谓岛国性格，资源不足，如何与别人竞争？这只有把虚弱转化为自大，

在心理上强化自己，才能无惧于敌人。孟子说：“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孟子·公孙丑上》），便含有此义。但这种自大，其立足点只能是原始的心理意义与生理意义，所以孟子说孟施舍只能“守气”，而不能守理。但从整个民族的生存来说，强敌环伺，便有必要把这种勇气培育出来。日本人为什么把《论语》“行己有耻”这四个字变为武士道？我认为完全是生存的危机感。

危机感也就是无常感。日本人喜欢樱花，所谓“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樱花在最美的一刹那间飘下，武士也应该在最悲壮的一刻死去，让每人内心都发出无尽的回响，于是成为民族之魂。

这是神圣，还是愚魔？生命的强度也许得到舒展，但生命的理性却被埋藏。

本来，佛教也讲无常，但佛陀面对无常非常平静，一切委屈、一切愤怒、一切偏激、一切情绪都可以放下，连对杀害你的人都可以微笑。为什么要作死前的爆炸呢？

日本人就是受不了这种生存的压力，化为民族文化，当力量尚小，便会表面恭顺，如战后麦克阿瑟代表联合国驻军日本，日本天皇多次觐见，但麦帅一次也没有回访，“无论日本政府、官方、财界、舆论界的头目，还是一般国民，都把

司令部的占领政策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命令,没有抵抗和反对,只有服从”(《战后日本纪实》)。但当国力膨胀时,便要修宪,参与干预世界事务,把自卫队改为军队,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罪行,篡改教科书,还要“入常”,以重温其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胜利者的旧梦。

许多研究日本国情的专家、学者,都说日本人善变。为什么这样善变?因为日本人所学到的文化仍然化解不了他们内心的原始无明。他们没有安全感,一切从外移入的文化,包括现代的西方文明,都不过是生存和扩大自己力量的工具;和浮士德一样,为了一个美丽的理由,也就是生存权,而向魔鬼妥协。

这是一个极深的无明,使得日本人彻底丧失其良知,为了重建日本的道德假象,不惜抹煞其二战以来的罪行。明明在中国的土地上肆虐八年,杀害中国军民三千万,却不肯承认是“侵略”;明明在南京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中外人证、物证多不胜数,却可以说是“并无其事”,“全是中国人的向壁虚构”。幸而日本人心底依然虚弱,不敢得罪英美,所以在泰国虐待英俘,偷袭珍珠港的事件尚未悍然否认,对美国尤其婢膝。因为日本人知道,现在还要借重美国的保护伞,日本还不够强大;不过,如果日本真的强大了,是不是会再发

动“圣战”？我想不是没有可能。

作为中国人，其实我并不希望与日本人对抗。我游日本，站在樱花树下，总觉其弥漫着一片凄然之美；日本人爱洁，引申到工作上一丝不苟，产品得到全世界的欣赏，于是提升了日本人的经济地位。可惜这种认真不能用于面对其自己，反而文过饰非，由“文”而变成“伪”。花费许多力气，想扰乱别人的视线，掩饰自己，最后当然给人“善变”的感觉。因为没有真诚，力气一定白花。

日本人所缺乏的，也许就正是真诚。学习中国文化，不能只是工具式的移植。“和魂汉才”和后来的明治维新一样，都是为了强大日本，进而与西方列强争霸。当年以中国为师，现在唯“美首”是瞻。处心积虑，文化究竟归于何处？我以日本友人的身份，不禁为日本人惜。

文化是要有正道的，不能只讲功利。作法者必自毙，害人者必害己。日本从中国移植文化一千五百年，难道只是成就其“和魂”吗？明治维新至今一百三十七年，难道只学到还治其人之身的技术吗？没有更深的反省，民族只有躁动。

今年是甲午战争一百一十周年，和日俄战争一百周年纪念的日子，这两场战争把日本推上了狂妄自大的台阶，最后发动“大东亚共荣圈”圣战，结果得到什么？历史殷鉴不

远，唯有真诚反省方可得之。不要以为采取种种手段、策略，利用台海危机，便可以重温帝国之梦。推动历史向前的毕竟是良知，而不是和魂中的无明。

原刊《法灯》278期，2005年8月15日

# 中日文化关系的回顾

## ——兼论日本文化的特征

### 一、前言：日本人又来了

“不是说日本人现在要来了，而是他们已经在这里了。”这句话，原是最近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日本资本渗入美国所提出的警告。对于中国人，这句话恐怕有更大的震撼力，因为它使我们想到的，不只是经济方面的问题。

四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人会忘记“皇军”。这不是我们要记恨，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无法抹去的历史事实。自甲午之战起，中日这两个民族就一直在拼命：日本人侵略，我们抵抗，血债长达五十年。仇恨要化解，决不是单方面的宽大就能了事。所以，最近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两国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就某一程度上说，这是好事；但若以为两国关系从此就可以“正常”，却未免过分乐观。任何基于现实政治而订立的盟约都是脆弱的，何况一纸公文，并不能保证什么。记得当年日本侵略中国，也曾经大谈“中日亲善”、“东

亚同盟”，还说“日本有责任帮助中国”，以对抗“西方之敌”。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但日本人却能一意孤行到底。这说明了什么呢？只有说明了日本人的野蛮。结果，光是八年抗战，中国方面就牺牲了三千万同胞的性命，损失了五百亿美元以上的财产。如今，日本人又来了，我们的记忆仍然新鲜。虽然这一次他们是“应邀”而来，但我们认为：真正负疚的人应该知道怎样做。

——而我们，应该了解日本，把眼光放长远一些。

## 二、菊与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一位文化人类学者贝内迪克特夫人（Mrs. R. Benedict）出版了一部讲日本文化类型的书，题为《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菊，原是日本皇室的象征，在这里作者用以代表日本人对艺术的爱好，及对美的追求；刀，则是日本武士所崇拜的武器，在这里作者用以代表日本人的勇敢、顽强，及喜欢使用暴力。这的确是巧妙的比喻，能够把日本人爱走极端的个性表现出来。

到过日本的人，都喜欢日本的静。古寺庭园，适宜独坐；



三弦琴和尺八，则适宜独听。但这种静却是悲凉的，常常都有生命的无常之感。所以日本人容易接受佛教，并不是因为生命的苦，而是因为他们容易感受到生命的无常。无常也就是跳动、不安的生命，所以日本人很容易冲动。别看他们平时讲礼，谦谦君子，但内里却像停蓄着的火焰，一有机会，就喷射出来。这至静的环境却孕育了这感情最急激的民族，真是不可思议。西方人常说日本人神秘，也许神秘就在这地方，一静一动，原是两个极端，但日本人却能交叠在一起。譬如日本人喜欢鲤鱼，不为什么，只为鲤鱼能忍刀伤，至死不动，所以武士切腹，也要以一种艺术的心情来面对死亡。这其中实有许多非理性的成分！

明白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会一面大喊“亲善”，一面在屠杀；现代的日本大学生，也一面叫着反战的口号，一面组织敢死队，内斗、外斗，打个不亦乐乎；还有“赤军”之类的组织，本来的理想是“反帝”，但却跑到以色列机场血洗无辜；而执政的自民党，也一面说要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忏悔，一面却把战争中的死者捧为国家的英灵。本来是矛盾的事，他们不认为是矛盾，理性与非理性重叠（不是统一），其中没有理由可讲，这真是日本民族性中最深的悲哀！

所以《菊与刀》的作者，曾经就日本民族性作了一番描述：“它是追求美的，也是军国主义的；它是讲礼的，也是不逊的；它是谦虚的，也是顽固的；它是顺从的，也是叛逆的；它是忠实的，也是狡猾的；它是勇敢的，也是胆小的；它是保守的，也是好新奇的”，可谓刻画入微。事实上日本民族的确是如此。

这种民族性，如果要命名的话，大概可以称为“二元民族”。二元，就是指它在两个极端里跳动，一时此，一时彼，并且没有融化统一的能力。这就是说，日本民族缺乏一个第三者，或缺乏一个中道原则来制约它的两个极端。

这可以说是日本文化中最严重的问题。

### 三、日本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吗？

许多人都说：日本文化就是中国文化，至少也是中国文化的延长。甚至日本的名学者内藤虎次郎都这样说。

这一说法的根据，是日本在移植中国文化之前，还是处于蒙昧黎明的神话时代，没有文字，没有历史记录，也没有国家的形式。日本进入文明世界，还是中国经典东传以后的事。由读中国书，迎入中国文字的佛教，到圣德太子（公元

593—622年在位摄政)开始派遣学生和学问僧入隋,日本模仿中国文化的方向已定。到大化革新(公元646年),日本才有统一国家的形式,并依中国文化的标准来订立典章制度,设置百官,实施井田制和租庸调法。大化革新是日本进入文明社会的最重要的分界线,它的意义,只有后世的明治维新才可以相比。然而,它所要做的其实就是接受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为治国的最高原则。大化革新以后,遣唐使更是大规模的进行。据史家统计,有唐一代,日本派出遣唐使先后共十九次,每次人数在二百至六百人之间。其中有留学生,亦有学问僧。留学生听学的,主要是经史、文学、术数、医学,也有学音乐、绘画和工艺的;至于学问僧,则主要是学佛教。经过这样大规模的留学之后,唐代文化于是移植至日本。一直到现在,日本仍有唐代文化风俗遗留。所以,从这一段历史看来,说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延长是有理由的,也是事实俱在的。中国文化把日本带进了文明世界,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相信无人可以否认。

然而,日本虽然移植了中国文化,但日本人所表现的精神却与中国文化殊不相类。中国人讲宽容、厚道,日本人似乎没有学到;中国所重视的“万物皆归中和”之理,与日本人的爱走极端,更是南辕北辙。为什么一个承受中国文化的

国家，会有这样的表现呢？如果在移植文化之前，它真如白纸，那么它应该追迹中国人的人生境界。事实上不然，可见其中必有问题。

据作者个人的看法，日本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取决于他们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从一开始，他们决定移植中国文化，就已经是抱着使用工具的价值观念来移植的；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目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限制了日本人的心胸，并造成了日本人走极端的性格。何以见得是如此呢？这在历史上是有资料可以证明的：

据《隋书·倭国传》，圣德太子第一次向隋朝呈递国书，说：

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无恙。

值得注意的是，圣德太子在这里使用了对等的称谓，而且措词给人的感觉（至少是给中国人的感觉）是相当无礼，不合于中国人眼中的藩属地位。要知道隋当时是大一统的国家，四夷入贡，要取得平等的地位，必须具有相当条件。日本当时还没有国号，一切尚有待于隋的教化，而自称天子，委实夜郎自大，难怪隋炀帝看得很不高兴，不过为了使藩属知道

中国文化,于是仍然遣使报聘。后来圣德太子第二次上书,据《日本书纪》,便改成:

东天皇帝向西天皇帝。

但这仍是个对等的称号。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证明两国之间不能有平等的外交,而是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制约之下,日本人这样的做法,有极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们既热心中国文化,又耻以藩属自居。从另一方面看来,这也是他们自卑感的表现:他们不愿意显露出他们的落后。据说:圣德太子为了接待中国的使者,特地在大阪兴建了一所规模较大的四天王寺,以夸耀日本也是个有文化的国家。这种心理,影响了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态度。移植唐代文化之后,日本跟着出现了一些模仿中国书的内容和体例而写的史书、文学书,如《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用意即在显示日本也有自己的文化(日本学者曾极力强调这些书没有汉学色彩),而且有把日本文化的来源放在中国文化传播之前。例如《日本书纪》所讲的神武天皇开国,就把日本开国的时间提前到公元前660年。但事实上《日本书纪》一书,成于公元720年,上距神武之世,已经一千三百年。这一段历史,根本毫

无凭据，完全任意捏造，而且东抄西袭。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出于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日本人不能承认自己比不上外国民族。

从另一角度看来，日本人这种自尊也是心理上的反抗。中国文化如潮涌入，日本如果不筑起一道堤以团结他们的民族，势必全部瓦解，而为中国文化所同化。然而这一道堤是相当难筑的，因为日本根本是一无所有。所以最后，日本人才索性不顾事实，用神话来培养人民的向心力。作者认为：当日本人写作《日本书纪》一类的书的时候，就是日本人性格走极端的开始；而正如上文所说，这是日本民族性中最大的悲哀。站在国家的立场，日本人必须这样做，但这样做显然是非理性的。

由此可知，所谓日本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看法，必须重新检讨。我们需要看清楚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中所担负的功能，及所占的位置。

#### 四、和魂汉才

“和魂汉才”是《续日本纪》的作者菅原道真（公元845—903年，曾任遣唐大使）提出来的。这句话道尽了日本人对

移植中国文化的想法。就客观环境讲，当时日本的确需要中国文化，尤其知道自己不如人，更要急起直追。从这方面看，可以解释日本人为什么学得那样快。据历史资料显示，日本由初得中国经典，到遣唐使的派出，不过四五百年，但日本使者所表现的文化教养，在诸藩中是最好的，予人有“君子国”的印象。后来，中国遭逢残唐五代之乱，经典散逸，日本的人宋僧，便带着古本来，为宋人拾残补缺。可见日本人的进步，确有成绩。不过，由于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又想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不失自己的面子，于是结果演变为两条道路：一条是盲目地提高国家感情，这就是“和魂”说，并把它认同为日本的固有文化，以与外来文化划清界限；一条是出于享用成果的心情，移入中国的东西，这就是“汉才”说。所以自始至终，日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一种实用的观念，也就是工具的观念，因此所谓文化移植，其实只是文化成果的移植而已。由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人所表现的人生态度和中国人不同的原因。

为了跟输入的中国文化对抗，日本人同时发展他们的国家观念，拼命宣扬日本民族的伟大。最后，这个国家被逼变成“神”，所有的日本人都成为“神”的后代。

公元1339年，日本有位史学家，名叫北亲房，写了一部

《神皇正统记》，劈头便说：

大日本国乃神国也。天祖开基，故曰神国。

这一句话显然是荒谬的，但日本人却信之不疑。之后，便产生了“惟神之道”，说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的后代，拥有传国的三种神器：一面镜、一把剑，和一块玉，用以镇护国家，使“子子孙孙”，与“天壤无穷”。这些本来都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所虚构的神话，但时代愈后，日本人反而变本加厉地给予狂热的信仰，于是有所谓“大和魂”、“神州不灭”之类讲法，对后来的国粹主义和神道影响极大。至今，这些传国神器尚供奉在伊势神宫，日本人扶老携幼地参拜，不肯揭破这层神权政治的外衣！

这不是笑话，事实上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了解日本，如果不知道他们对国家和对天皇的观念，那是绝对不可言了解日本。虽然，日本人自己也不一定能够解释“大和魂”、“神州不灭”等是什么东西，那是因为他们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和僵化了的缘故。总之，从这一方面看，日本人的血液里有太多非理性的成分！

至于那位始作俑者，提倡“大日本国是神国”的北亲房，



据说还是醉心于宋儒的理学家，但对宋儒的“尊王”观念如此了解，夫复何言！日本自镰仓朝以后，虽然也大谈宋明学问，出了几个学者，但似乎对儒家的学问，除了“忠君”、“尊王攘夷”、“信义”等几个观念之外，其他的都没有什么了解，结果所帮助培养的，只是“武士道”的道德而已。

由此看来，当初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态度是如此，后来也就无可挽回了。这是日本人自己立下的界线，把中国文化作为工具，只是在适用的时候拿来。但日本人却无法节制他们的非理性，我们再读历史，这对于日本人究竟是祸是福呢？

明朝的时候，中国和日本曾经在朝鲜半岛打了一仗，那时日本丰臣秀吉当政，已经有推行大陆政策的野心，并以为日本文化已经不在中国文化之下。这是一个缺乏自制力的民族的狂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进步极速，于是又有征服世界的野心。如今日本人再从战后的废墟上建立起“经济大国”的地位，已经是第三次了。

一个民族，能够取外国之长是好的，但如日本之所取，纯然视为工具，而与他们的民族精神不相干，则所取的文化究竟有何价值，亦使人甚表怀疑。许多人都说，日本明治维新的进步值得推许，而我们自强、维新、革命，闹了不知多少

年，仍然如此，似乎相差太远。其实我们接受外来文化的方式和日本绝不相同。日本视外来文化为工具，当它一旦发现了有比中国文化更实用的工具时，当然立即弃如敝屣——明治维新就是如此，而这种态度是势利的。但中国人视文化为内心德性的表现，人的文化生活，是直接表现人自己的，这已超出实用层次，而成为中华民族自己的魂，所以很难舍弃。人总不能为了实用的价值便把自己的存在价值否认掉。这可以解释“五四”以后我们为什么那样痛苦。吸取历史的教训，及日本的经验，我们必须先守住自己的魂。

本文原稿写于1972年，刊《东西风》月刊第5期，即第一次“保钓”运动后。1990年，“保钓”第二波时再刊于《法言》第2卷第6期，篇幅关系，注释从略。

# 中国人的中国史

## 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忘记历史的时代，不知历史有什么意义的时代，教署辖下的课程改革小组正建议中学要废除历史，把中国历史并入一个社会性的人文教育科之中。也许他们只是从一般的知识的角度出发，认为历史知识在社会、在实际工作中没有什么作用，只要知道一点便足够，与公民、社会之类合并成一科便足够。他们的眼光只着重实用，如计算机科；只着重于人的专业训练、职业训练，考取学位以确保谋生资格。他们完全不懂教育，不懂文化。在不懂教育、文化的心态下，根本不懂历史。历史是最好的教育，历史是文化中最深远的部分。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此一“史”字启发极深。人之所以有文化，脱离其原始本能，正是在于其能继承前人的创造，有历史素养，吸收前人的指引，避免重蹈覆辙。所以一个民族，甚至一个人，如不懂历史，根

本就不会做一个人。每个人也有他生命成长的过去，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过去不认识、不面对、不改过，他根本就不能成长他自己，不知如何去开启自己的生命，建立自己的理想。人的成长过程很难，正如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它的成长过程，不是一日，而是数以千年的累积。

这中间不单是知识的累积问题，也不单是事实的记录问题，即只问过去有什么发生过。历史不应该只是事件，也不应该只是考据真假。例如当年日本蓄意进攻卢沟桥，日本方面却说是中国人先开第一枪，于是引致双方学者的争论。其实，争执这第一枪有何用？日本挑起战争根本就是找借口。谁踏进中国土地？谁占领卢沟桥？其他的只是枝节。事件在众多的历史事实中只是一件：不能独立认识，众多的历史事实是前后互相关联的，所以没所谓单一的历史事件。不错，对单一的事件，我们也是有探讨的必要，考订真假，当中有它的客观性、独立性和不可代替性，但我们了解历史，不是只了解事件，了解所谓客观记录。正如我们了解一个人，不是只了解他的身高、体重、他的个人记录。这些记录零零碎碎是没有大用的，了解这些不是历史的真义。所以我们为何读历史，究竟历史是什么？我们非要弄清楚明白不可。究竟历史是什么？中国人为何要读中国史？这两个问题我们也要弄

清楚。这对我们自己做人、做学问、做事，乃至如何与人相处，都很重要，即使不是中国人也很重要。

## 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什么？国史大师钱穆在《中国的历史精神》中是这样说的：“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过往的经验。至于这经验，这已往的人生，经我们用文字记载下来……这叫历史材料与历史记载。”就钱先生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经验，不是零碎的经验，是全部的经验。我们全部的经验为何要记录下来？这些经验我们叫历史记录、历史资料，但还不是历史的寄托所在。如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兴替者即政权、朝代的转换，亦即朝代的盛衰史。如罗马帝国为何会灭亡？大家都很有兴趣探讨。唐太宗说这句话站在政治立场，或统治阶层立场，历史可以提供管治好国家、延续政权的启发。这样看来好像很自私、很狭隘。所以司马光写的历史书叫《资治通鉴》，正是为帮助帝王统治而写，如一面镜由古照至今，近一千三百年，足资借鉴。所以历史就是一

从古照至今的镜，如你能看清楚，就会给你很多启发、很多指引。当然这不是绝对性的，因过去的事毕竟过去了，把过去的经验结果，归纳起来，依科学方法说可以得到知识。因此有人说：历史也是一种科学。但西方的科学方法，被其归纳的对象全是相同的，如p，则q；如天下雨，则地上湿；或如抽烟，可导致癌症，把同样事例归纳进同一范畴，以得出因果关系，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知识。但历史不可能这样，历史每一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怎能如p则q那么简单。可见这只是一个宽松的说法，不能把历史等同于科学，最多只能像伽达默尔（H. Gadamer）所说，历史是一种精神科学。

历史既是过去全部人生的经验，但这些经验有何作用？唐太宗、司马光的说法是历史可以帮助统治。这当然狭隘，很有问题，我们不能说历史只帮助统治者，只为政权服务。虽然政治是最切身的关系，政治代表着最巨大的利益争夺、权力争夺。得到权力那种满足感是很大的，所以人不论如何受人非议也要参政。但如说历史是为政治服务便很悲哀，这样读历史便很褊狭，走不出政治斗争的领域；读历史变成只想从事政治斗争，夺取政权，难道除此之外便没有其他作用了吗？反过来我们不想从事政治斗争便不用读历史了吗？这样太褊狭，也太扭曲，这样的观点不会有健康的历史学，也不

会有带领人类走向光明的历史学，所以怎样看待历史十分重要。依我的看法，可分成几个层次去了解：

### 一、历史是求真：真实与真情

当我们说过去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从事新的活动，即鉴往知来，不单单指政治，一切活动都可以帮助我们鉴往知来。但真能鉴往，历史这一面镜子就要能够反映真实，而非幻象，这才能学到东西。问题是求真不易，历史已经过去了，不能倒回，唯一的方法是靠记录、靠资料，但记录资料是否真？是否可靠？便要检查。所以历史学的第一步功夫，就是对资料作鉴定，即怎样去面对无数记录，对史料要懂得检查、考证。但史料不是一条一则，而是很多、很复杂；我们便要认识，懂得区分，哪些有真确性，哪些虚假。过去有所谓“本证、旁证”（顾炎武语），前者即在本书中互相引证，后者是引自他书作旁证。到了乾嘉时代，考证学大盛，举凡经学、史学、文学、音韵、天文、地理、历法、音律、金石、版本、目录，无所不窥，博闻强记，如全祖望、钱大昕都是代表。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无考证学则无清学”。秉持这一态度，一直到近代、受西方科学史学影响，再提出“客观史学”（梁启超）、“注重事实，尊重证据”（胡适）、“疑

古辨伪”（顾颉刚）等说法，全部都是在史料上下工夫。所不同者，是观点的转变，过去是资料的辨别，互相引证，以博为能，但“五四”之后的新史学，则转为怀疑。胡适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结果破旧说的多，能作新诠释的少。如顾颉刚，考禹之来源为动物，而复变成一神话人物。他发现：时代愈后，禹的地位愈上升，其实都是后人加添的。这种清算古史的方法，胡适戏称之为“剥皮主义”，足见其背后动机：表面是求真，实质上是疑古。这其中涉及一个问题：对中国史书的读法问题，也就是对中国史学的了解问题；若不了解中国的史学，纯从资料真伪、记述的可靠性上着眼，只能有史料学，不能说有史学。

历史当然是求真，但求真不能只讲考据。如说历史学只是考据，靠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等方面的训练来考究历史，这便看不到深处。要明白资料为什么出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手民之误，如陈援庵的《史讳举例》，便举出了很多例子，指出古书中许多字眼改动，都可能是避君主或尊者之名所致。推而广之，历史上很多不同记载、不同评论，如何判断真伪便不是那么简单。这个问题牵涉到谁写历史的问题，写谁也很重要。

例如西方社会现在流行女性主义，从女性的角度出发，



便会对以男人的世界观来写的历史表示反对,所谓英雄将相、才子佳人,都是以男人为中心,女性从来被忽视,所以她们要求要从女性的角度重写历史。

这说明什么?说明历史是有立场的,不是价值中立的。所以西方后现代主义出来,重新反省人类过去历史上的偏颇。他们注意到,18世纪启蒙时代以后,人类理性高扬,于是把人性的另一边掩盖了。他们认为理性只是人性中的一边,以理性为主导所写的历史不能作为人类历史的全部,这样的记录不公平,亦不真实,于是福柯(M. Foucault)写《癫狂史》,把人性的另一面拉回来,重新放在人类的视野之下。顺此思路,历史必然再有许多角度的重写。如同性恋,过去一直受贬斥,现在同性恋在欧美许多国家已取得合法地位,同性恋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政治舞台,于是也要重写历史。譬如香港的某些“同志”,便宣称屈原是同性恋者,他的自杀,是由于失去他的所爱。这是不是荒谬?谁能判断?我的感觉是:荒谬的不在于判定屈原的同性恋身份,而在于有人可以作这样的判断。正因为现代社会中,任何人都有权依他的观点来讲话,言论自由有法律保障;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不能反对他的发表。所谓学术、所谓历史,全部收摄为论者眼中的东西,因此只要你有新观点,便可以有新历史。人

人都有权说话，人人都有权改写，这就是西方现代社会所歌颂的自由主义、多元文化、开放社会。这样的社会面对17至18世纪欧洲的专制独裁政权时，是一大进步，但经两百年后，则形成另一极端：即历史的相对主义。罗蒂（R. Rorty）批评现代科学主义者把科学变成至高无上的价值就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科学主义者所使用的语言，总是带有一种对别人评估的意味，那么他们的所谓“事实”，如何中立？顺罗蒂之意，此一藩篱若无法越出，则不如把语言转为杜威式的实用主义，理论为其所解决的问题服务。但在这里，我认为罗蒂仍不能脱出相对主义的范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最终必再导致虚无主义。过去，我在十多年前已说过：不要以为开放就代表完美。开放必须就其历史脉络来了解：一个社会为什么要开放？一种观点为什么要兼听别人声音？同一道理，诸典籍之间为什么要互校？从知识角度，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完全有必要。但开放只是过程，我们决不能为开放而开放。政治上如此，学术研究亦然。史家要找出客观的历史，在消化众多的史料之后，便要重建历史的真相。问题是，有时文献不足征，如何能够使用有限的资料来重建历史面貌呢？这真是一大困难。

若停留于资料，则这困难是不能解决的。因为资料零碎、

片断，又有传者之异，如何综合、消化，以得其真相？史家非有很大的建构不可。我试举一例：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记述项王被围于垓下，突围而出，仅余二十八骑，而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能得脱，于是对从者说：“吾起兵于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说毕复战，最后当然全军死难，项羽亦自杀。但这一番话却留传下来，而且被司马迁在传末加以讥评，说他不知自责。司马迁仿佛是亲耳听闻，从记录的真实上说，未免可疑，但后来读史的人却觉得非常合理，以项羽的性格和曾经建立的功业，他当然不会服气。他看不起刘邦，刘邦却与他争天下；他放走了韩信，韩信却成为刘邦大军的统帅。他不能面对他的失败，所以只有诿之于天。司马迁十分了解他的心理，在绝境时很有可能就有这样的愤激。我的意思是说：纵然无此语，亦有此情，历史不但记事，还当深入事情之深处，此即历史人物之心。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愿望和他的追求，是通贯的。历史事象其实是历史人物精神的表现。我认为：必进至此，才能了解历史，和诠释历史。这不是“想当然耳”，如苏轼之辩（传说苏轼应举，论《刑赏忠厚之至》云：“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欧阳修问出自何书？苏轼答云：“想当然耳！”），而是理有必至。

由此说到西方的史学，强调科学、强调客观，如兰克（Ranke）学派，主张放下主观判断，亦即胡适所说的“有一分证据，只可以说一分话”，一切由材料来决定。但是这样，我们如何能够获得历史的真相呢？客观史学所追求的“高贵之梦”（That noble dream），意即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不可能凭借零碎的材料所能达到。而且历史是由人写的，史家的观点永远是一个局限，从知识立场，这个局限很难跨越。所以客观史学所追求的真实，在这个角度下，也很难达到。

至于我的立场，则非纯粹的知识立场。知识当然是重要的，不可能放过，所以一切能帮助我以获取历史知识的训练，如乾嘉学派所说的考据功夫，仍不可废。但对历史的深入，决不能只停留于材料。我一直认为：历史是人的历史。所以人的精神、人的愿望、人的理想最重要，由此才有人的奋斗、人的挣扎、人的成败、人的各种活动。这两层关系，历史所记述的只能是后者，但它要表达的却是前者。但前者不在材料中，如何表达呢？这正如现实人生，朋友相交，亦不一定能知心。单看行为、说话，不容易分析出来。尽管今天我们有分析哲学所教的种种分析方法，但我认为仍无法了解人心，

因为分析哲学所处理的不过是知识概念，问其意义；它不能进入生命，进入生命是要有另一途径的。同一道理，我们读历史，如何能进入古人的心？这便不是事件的真伪问题，而是行事者的真情问题。情与事，心与行，后者客观可见，但前者方为核心。

所以有关“真”的问题，我认为应该分为两层：一是真实，指客观事实；一是真情，指当事人的内心追求。前者反映后者，后者决定前者，所以两者的关系，并非相离，而是本末通贯。西方史学受知识场域局限，无法进入历史人物之心，所以最多只能将历史还原为不同立场，结果形成知识上的相对主义，这一点不如中国的司马迁。司马迁写《史记》，不但读尽许多皇室文献、六国文献，他还亲自游历，“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又做亲地查察，探访后人，如《史记·孔子世家》中，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敬徊，留之不能去。”这说明司马迁对古人的精神人格有极深刻的体会。这不是以文献记录人，而是以情人。不过要注意：此“情”并非指一般之感觉、感情，而是深心体会，唯其如此，司马迁才能写出如此伟大的历史篇章。这就是真情，唯有在史家的真情之下，才能重新呈现历史的伟大

人格和庄严世界。一般埋首于故纸堆中的学究，是无法想象的，也不可能有此气概。

## 二、历史是求善——善继与善教

从研究历史记录，到了解古人的心，这是一个对生命的探索过程，因此所说的不只是历史知识，而是做人的信念。你会发现不管是哪一时代的人、哪一地方的人，其实都是人，都有人的可贵的特质。那就是想成长，想改善自己，想克服困难，想对社会有贡献，如古人一般，生命有成就，光阴不虚度。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发现了生命的普遍性，人最深的秘密。也许有人认为：人如此努力，如此挣扎，不过是想建功立业，满足自己的虚荣。所谓“不朽”，亦不过是沽名逐利，留下自我的名声。所以历史看穿了，不过是人间的把戏，以美丽的语言装扮人的自私的活动。政治上的争权，商业上的争利，乃至利益之下，父子无亲、兄弟成仇，比比皆是。所以多读历史，也许会使我们很失望。如中国历代，一直标榜圣君贤相、忠臣义士、孝子贤孙，但一部《廿四史》，杀父杀君、谋朝篡位、小人当政、陷害忠良，就不知有多少。即使遭遇外敌入侵，理应敌忾同仇，共御外侮，至大局不能挽回时，臣死君，君死社稷，似乎是史家，至少亦是公羊家所提

倡。但实际上历代朝代替换时能做到的有多少？反而屈膝卖国，互相攻讦，乘机发泄私怨的不胜枚举。例如清兵入关，崇祯皇帝不但自毁长城，牺牲熊廷弼、袁崇焕等抗清大将，还任用王化贞一类小人，这和熹宗之纵容宦官，冤死杨涟、左光斗如出一辙。最后李自成入京，崇祯帝自缢煤山，还下诏说“诸臣误朕”，这比起楚霸王的“天亡我也”更推卸责任。君上如此，明代焉得不亡？其后虽有福王继位，史可法守扬州，马士英、阮大铖等却在后方植党营私，把持朝政，终至土崩瓦解。许多人读这段晚明历史，都扼腕流涕，深深叹息。历史所留给人的似乎并非希望，反而满载人间丑恶，这应该如何解释？从历史的第一个层次就是记载人的活动上说，我认为现实的丑恶不须抹煞，也不应否认，如古良史所说的，应该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虽杀身亦不改写。不过，人若有胸襟亦不须掩饰。如唐太宗玄武门之变，要史官“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卷七）。尊重历史，即是尊重自己的成长。人是人，虽说一方面见其努力，但另一方面也有他的局限，这包括他人性上的局限，也包括他知识上的局限。前者是先天限制，后者是后天不足。尽管人愿意学习，但仍会犯错。历史原是人不断奋斗的记录，但也是人不断犯错的记录，不过如你能善用此记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则历史也是人不断

改正自己错误的记录；“鉴往知来”，也可以变成“继往开来”，如此，历史方有希望。

所以，我们不要光陷入历史的悲惨中，这很容易使你失去志气，你必须从历史的悲惨中看到人的努力、人的可贵。为什么在艰难的时候有些人会放弃、会投降，会为自己的变节找借口？但另外有些人却坚持不懈，忠于自己的理想，忠于自己所感受到的价值？这不是人有两种，或人有多类的问题，我们不要将之平面化来看，而是从善恶交战中，公私对决中看到人可以超越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奉献给更高尚的价值，并能感召后来者，做出同样的努力。这就是一种教育，所谓“以古为鉴”，所以，读历史应该看到的是这一层次，而并非只是成败的经验。历史若只着眼于成败，那是功利主义，发展下去就会但求目的，不择手段。中国文化，包括历史文化在内，它所重视的是行为的动机，即《大学》所说的“诚意”、“正心”，那才是行为之本，所以中国人不以成败论英雄。司马迁写“列传”人物，以伯夷、叔齐为第一，写“世家”，则以陈涉居汉诸家之前。谁能有此巨眼，公平位列众多的历史人物？当然是太史公。但何以有太史公？这便是中国文化的陶冶之功，使人不要单看自己得失，应看到广大的历史世界，所以司马迁以友道为李陵伸冤而受腐刑的奇耻大辱，但仍强



忍悲愤完成《史记》，为什么会这样？这不只是司马迁个人的人格，还应该看到他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司马迁的先祖，历代均为史官，直到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太史公，临终以著史未成，有负许多人的努力，于是嘱咐司马迁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于是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这就是一种继志述事。《中庸》云：“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若将此义扩展，则对先贤先圣乃至天地造化的体会，也是一种继承。《易经·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话说得非常好，因为善继方能善成。《易经》的哲学，都是讲成全之道，从“天地之大德曰生”讲起，到最后成全万物，中间就经历许多艰难，必须善于体会，方能趋吉避凶。由此推断，“易之兴，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时代变动，就有忧患，所以《易经》的撰作，就是一种历史意识，其中有所寓意，所以它的归趣，不可能是毁灭，必然是天道与人道的理想的完成。这是一种非常光明的历史观，尽管现实黑暗、奸人当道，但人并未失去信心。在这种历史意识下，人必然有一超越的向往。这一超越的向往，不是指天国，如基督教所说；而是指人生的圆满境界，至少

亦是人行事的标准或法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所以孔子著《春秋》，要对当时的人物下褒贬，每一字都极慎重，极有深意。史称“微言大义”、“春秋笔法”、“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为什么有这些功效？就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未死，时人仍有此历史意识：人不但活于当世，还活于将来；人的肉体虽死，但人在历史中的位置却是永远，这是一种精神生命，从现在伸向过去与未来。人不但要向自己交代，还要向祖先和子孙负责，向社会和民族负责，甚至向天地负责。由此我们才了解到做人不简单，有其庄严，绝不苟且。但人能到此一步，极不容易。回到我们上文所说，人是人，那么人亦有其自然生命的局限，若不磨炼，在现实的困难下，也不容易过关。这里涉及生命的秘密（但不是神秘），只有践行者方知。我们看司马迁，他继承父业，对历史有深刻了解，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历史的继承其实就是文化的继承，文化的继承也就是理想的继承。历史之事，难道只是记录过去，铺陈史事就完了吗？当然不是，所以司马迁特别指出孔子著《春秋》，就是要建立“天下仪表”，“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其内心动机，就是要成善，成历史文化之大善。司马迁就是要学孔子，继承《春秋》笔法，为历史立下规模。这也就是民族的大孝，因为能善继古人之心，才能珍惜前人的努力，才能垂之永远。

善继的进一步，便需要善教，如上文说，历史不只是客观记录，而且要为人的行为建立法度，建立是非标准。在本质上，这就是一种教化，和文学、艺术没有两样。所不同者，文学、艺术（礼乐）以美感人，历史初以事件入，但达于深处则一。所以，古人说移风易俗，莫近于乐；但我认为：历史同样有此能力，由史而转为传奇、小说、戏剧，如民间之说唱文学，绝大部分向历史取材，而有莫大的社会教化功能。稳定社会，稳定民心，绝不能只讲经济。人性超升，始终有赖性情教化。“述往事，思来者”，这就不是历史知识问题，而是有一种精神寄托在里面。我认为：这才是历史的秘密，对人类有永恒的贡献。

讲到这一点，我们不妨引用当代德国诠释学的开山者伽达默尔的观点，他认为：艺术与历史，都是一种特有的真理经验。他称之为意义真理（Sinnwahrheit）或生活真理（Lebenswahrheit），这种真理一直影响着我们自身的生命与

对世界的理解。而理解，不是指对世界的认知，而是存在者自身的存在方式，联结存在者的过去与现在，此中不能排除时间性与历史性。在当代德国哲学家中，海德格尔重视前者，伽达默尔强调后者，所以伽氏认为：历史记载（文本）不只是历史家个人的意图，也不只是当时思想流变的表现，更是一种世界，是使我们可以向之发问并获取答案的环节。当我们提出问题，我们其实已被置定于某种空间，而此一空间同时亦规范着我们所能发掘到的真理。这不是语言分析或概念分析，如某些分析哲学家所为，而是以我的理解，是一种历史网络，同时构成了我们对世界的经验，也构成了我们自身的存在。总之，人不但存在于当下，亦同时存在于过去，无法隔断。只有在这种存在意识下，才能了解人是历史的存在是什么意思。

承伽氏此意再进一步，时间有三相：过去、现在、未来，则人的存在自然亦应伸向未来，对未来有所契入，有所承担，而不只是指向，这就回归中国史学。所谓“述往事，思来者”，我们对“来者”能有所期盼，根据在哪里？只有肯定历史有一必然而当然之道。把这信道彰显出来，便是史学。司马迁自言其书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即是欲以其个人之力，证明历史诸多人事之变

化仍有其庄严的秩序。此秩序超越于现实之上，但不离现实而隐没，反而借现实而彰显。所以我们得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天人相应，历史的深沉大义才能展现出来，而有所谓天道、天理、时序，与人的志业可说。关键在人，而不在天，因为唯有人才体现天道，才能成就历史。这不是直接从上面说下来的一种超越的、神学的决定，而是由生命之成长以体会天道之必然。这才看到历史不简单，每一步都关系到整体，关涉到人类存亡，岂可不谨慎？司马迁《伯夷列传》，深为善人遭难而不平，说“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似乎不信，但最后归诸“各从其志”，这便是人的问题：唯有有志者、有德者、有修养者、有成长者方能知之。因此，孔子著《春秋》，立“天下仪表”，并非只是建立一个抽象的客观标准，而是人成长、人行道的典范；亦只有这样，才能成教。“教”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知识之论。若拿理论要求人，很可能“以理杀人”，空洞而不近情，唯有具体展现的人格，才有魅力。中国史学深明此义，所以正史体裁，以论人为主，尤以司事者、主事者，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我们对其要求尤其严格，《春秋》责备贤者，当亦属于此义。这是“教”，垂则于后世，使子子孙孙皆能明白：无人可逃离历史审判。

至于问：这会不会造成压力？当然，这是压力，但却是

人成长、人自爱的压力；否则人必放荡，以本能、欲望为归，一定不会成就更高的价值。

讲到底，这是“教”的问题。唯有善教，方能提升人的价值，提升社会的素质。历史，岂能只是资料记录的保存？

### 三、历史是求美——美的人生和美的世界

由求真、求善，我们自然会再问：历史是不是也求美？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这倒不是因真、善、美三者自身的关联不可割裂，如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所说。而是因为真、善、美的价值，皆立足于人自身之性情：人要成长，自当求真、求善、求美。历史既然是人成长的记录，其中当然也有求美的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的部分。

依康德，美的判断不是对对象的判断，因此并无真假问题；也不是人自己的行为问题，因此亦无善恶可说。它在内容上无所决定，不过需要感性活动作基础，把感性直接提供到主体上去，而主体觉得美，则是因为此一经验合乎主体的目的性原则，也就是自由原则。自然与自由统一（由上帝保证），所以美云云。

康德把美说得迂回曲折，那是因为他作茧自缚。若依中国道家，便很简单：顺自然就美、美在自然。所以庄子说“至

乐无乐”，就是要超越一切人间主观相对的苦乐。这如何可能？关键便要突破一切人间主观的局限，甚至超越生死。《庄子·至乐篇》有一个故事：说庄子回到楚国，途中看到一具骷髅，很奇怪它为什么会死？难道做了些什么不应该做的事吗？夜半，庄子梦到那具骷髅跟他说：“今天你跟我说的话，好像蛮有道理。其实就是因为你还活着，所以只有这些忧虑，死了就没有了。你想知道人死后会怎样吗？”庄子说：“想啊。”于是骷髅说：“人死了，无须担心有国君来管他，也不用担心去管别人；没有四季的变化，大可以以天地为春秋，天地多久，我也多久。这种快乐，就是南面王也不能超过啊！”

可惜，这种快乐不在人间，而且反照出人间的悲苦。它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思辨理性，成为生命存在的一个向度。不能在人间实现，总是一个遗憾；用它来讲历史，便讲不了。它只能抚慰人间的伤痕，而寄以深沉的感喟。这当然也是一种美，但不属于历史。历史是人间的，要记录人间的奋斗——尽管满身伤痕，但人没有放弃。这种精神不美吗？我认为这就是美。因为它把人的性情发挥出来，人的力量、人的创造，足以惊天地，泣鬼神。所以伽达默尔说：历史和艺术一样，都是表达我们的一种特殊的真理经验，真与美在这里得到统一。我想这一点很重要，美不能简单化，把它局限于感性、形象、

距离、直觉，也不是把目的性原则与感性统一。美是一个体会的过程，此中应有深浅多层次可说：从对对象的感受开始，而通于不同的层次，即有不同的美可说。如通于音声、通于形色、通于香臭等，即有音声之美、形色之美、感觉之美。由此再通于形式，通于法度、通于理念，便可以构成以理性为基础的美感经验。西方美学波澜壮阔，理论非常多，我想原因亦在此。从理性出发，所追求的是普遍与永恒，如庄子一样，最后远离人间。但善恶心哪能远离人间？它的起点必须落在具体事物上，从感觉或感受上超升。这中间需要一种深入对象、开拓对象、创造境界的能力。这能力不摄属逻辑（理性）、不摄属认知（感性），但又具有超越性，不能停于感觉，所以只能是我内心中的一种情，我称之为“性情”。《易经·系辞》云：“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说的正是此理，指的正是我们生命中自然拥有的能力：由通于对象而成就一种境，我认为这就是“美”。因此美可通于真，美可通于善，美就是一种综合和创造。《乐记》云：“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又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所着重正是主体的一种与物相应、相合，并开拓、超升的创造能力。美之难言、美之丰富，正是因为其中有实有虚，亦和人自身之成长有关。要深入检讨，我想还要俟之异日。



现在我们谈的是历史，读史的人首先要通过人的行为去了解史事，再进而通过体会古人的心而知史义，还古人以公道，使冤者得雪、愤者得平、勇者得称、贤者得名。这是一种心心相接，唯有史家以其至公无私之心方能一一涵盖，从而使后世读史者开拓心胸，包容无数人物、无数生命的成就与价值。至少亦向往之、赞叹之、景仰之，这就是历史所能贡献之美，其根底在人自具之向上之情。纵自身不能至，亦识欣赏，从而肯定历史方向，呼唤来者共同上路，以形成一历史文化之传承。这是性情的光辉，也是历史的光辉。所以历史必追求美，美才能吸引人。

美既然是从人的性情开始，则人之可欣赏处当较外物为甚。钱穆先生说：中国人读本国史须“先有温情和敬意”（《国史大纲》）。诚然，但此温情和敬意何以能生起？便要回到具体的历史人物的表现，看我们的祖先如何努力、如何开创、如何为子孙后代奋斗，彰彰可考。譬如古代器皿，如铜鼎之类，铸造不易，其铭文常有“子孙永宝”之语，可见其情在后世。推而广之，就是一种历史精神。前人如此，后人岂可不感激、回念？中国文化特重“孝”，我认为就是出于这种历史精神的反馈。中国民族不亡，全靠这种精神支撑。这不只是一种善、一种道德、一种应有之义，如上文所说，而且是人自己先有

感动，打开心胸，看到可欣赏之人物。《史记》的成功，正是从记录了这些人物，刻画了他们活生生的形象开始。《史记》一百三十篇，其中写帝王的“本纪”有十二篇，写诸侯世系的“世家”有三十篇，写各种有建树、有信念、有才华、有性格的典范人物七十篇。这可以说是《史记》的主体部分，如伯夷、如管仲、如吴起、如苏秦、如孟尝君、如信陵君、如廉颇、如蔺相如、如鲁仲连、如屈原、如贾谊、如聂政、如荆轲、如田横，都是令人击节三叹的人物。当然，司马迁亦写出《佞幸列传》、《田叔列传》，以表达他对这一类“色媚”的人物的评价。一如观剧，使我们的生命从中受到激励，从人受到清洗，而产生向往，产生行动，继承前人的志业。张横渠说：“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历史的信念，凡读历史者皆应体会，不应放弃。历史首先就是要传递出这种庄严的美感，以呼唤后人投入，使古人和今人的世界，心心相映，而得到相通。

#### 四、结论：历史是人类精神超升的表现，中国人的历史特别彰显此义

由求真、求善、求美，可见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都是全力求超升，而不愿意停留于现实的假象、现实的丑恶中。

尽管践道艰难，成长不易，但这正是人要成就真善美价值的考验。无疑在旅途中有很多人倒下，过不了关，但仍有人可以站起来。这并非不服气，而是人当如此：人不应在困难之前屈服，不应在半途停下，不应得少为多，更不可错认——指鹿为马、颠倒是非。这就需要学习，首先学习历史，学习古人成长的经验，体会古人之心。善继必善教，懂得欣赏才有超升。所以历史不是别人的历史，历史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历史不是知识那么简单，历史是我们自己的存在，也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你可以逃避一切，但不能逃避自己的过去，更不能逃避自己的将来。你只有承担、只有面对、只有行动、只有努力，才能与时间一起成长，也就是与历史一起成长。知识可以有很多选择，但历史没有选择，所以每一步都是关、每一步都是学习、每一步都是挣扎，但每一步都可体会到你自己的超升。你没有放弃，你就激活着历史。

所有这一切，都要回到你自己的生命上体会，回到你自己的性情上体会。这是性情之教，在世界各大文化中唯有中国文化有此深识，所以中国的历史特别丰富，就是因为中国人的历史意识特别强。有人以为这是包袱，要放下；又有人以为无补于今天的经济现代化，不要浪费时间学习历史；亦有人以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文化亦将全球化，历史强调民

族大义，已不合潮流，更担心会成为世界和平的障碍。这些都是虚妄之言，因为不懂生命，不懂性情，更不知自己如何方能得救，以为趋炎附势便可以过关；不知精神为何物，所以一定丑态百出，危害自己，贻害子孙。他们不知道：中华民族为什么绵延数千年而不亡？就是因为我们有此历史精神。比起西方，中国一向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不需上帝扶持，好像很孤独，不安全。但我们有历史，有鼓舞我们走向光明的文化，有超升我们的人生境界的动力，坚定我们求真、求善、求美而不放弃。我们必能同样经历险阻，而且再生。

为什么？

因为我们能够深化体会，不断超升。接受自己的过去，自求多福，使生命在历史中得到安顿。

本文乃作者为法住文化书院“中国人的中国史”课程，作导论演讲之讲辞。原刊《法灯》238—240期，2002年5月、6月。

## 附录：“五四”人物简介

### 黎斯华博士辑录

####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字鹤卿，又字仲伸、民友，号子民。

1903年，参加张园拒法会、拒俄会，参加军国民教育会，并割辫明志。又创办《俄声警闻》（后改名为《警钟日报》）。1907年，赴德。

武昌起义后，经俄国返华。在上海与黄兴、张謇、章炳麟等筹建“中华民国各省代表会议”。又赴南京，会见孙中山先生。1912年1月，被任命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及世界观教育，称为“五种教育主义”。7月与袁世凯不和，辞去教育总长职务。1916年底，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男女同校、宣传以美育代宗教。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聘胡适、李大钊、周树人、钱玄同、刘半

农、周作人、沈兼士、沈尹默、梁漱溟、章士钊、黄侃、朱希祖、吴梅、刘文典、陈汉章、辜鸿铭、刘师培、陈光汉等思想不同、学派各异之学者为文科教授。1918年8月，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作序。1919年4月，发表《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反驳其对北京大学容纳新思想、新人物的指责。

1919年3月，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突至其寓所告知：“钱能训总理已发出密电，令出席巴黎和会之五位全权代表顾维钧等在山东条款上签字。”蔡元培闻讯后，立即召集北京大学学生代表通报此事。学生热血沸腾，原定于5月7日爱国大游行，遂提前于5月4日举行，史称五四运动。5、6两日，奔走于教育部及警察厅，保释被捕学生。9日，辞去北大校长职务。16日，在《益世报》发表致北大学生公开信，称：“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忱。”7月9日，恢复校长职务。

## 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幼年受祖父及外祖的民族主义熏陶，不满于清政府统

治，奠定了贯穿其一生的华夷观念，与《春秋》的夷狄观的民族主义观。1891年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等。早年关注经、子之学，初步建立对“今、古文”界线的认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曾为强学会捐款，与康有为、梁启超通信。到上海任《时务报》主笔，但终因学术意见之争发生与麦孟华等人的“拳殴”事件，此后回到浙江。1898年春，曾应张之洞之邀赴武汉办报。戊戌政变后，避地台湾，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9年夏，东渡日本，后返回上海参与《亚东时报》编务工作。此时章太炎的排满观和古文经立场日益明确，在苏州出版了其著作《馗书》的第一版（木刻本），由梁启超题签。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后，严复、汪康年等在上海组织“中国议会”以挽救时局，章太炎应邀参加。在会上，章太炎主张驱逐满、蒙代表，并割辩明志。

1902年再次逃亡日本，寓梁启超《新民丛报》馆，并与孙中山结交。在日期间，接触到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回国后，重新改定《馗书》（即《馗书重订本》，1906年于东京出版铅印本，改用此前邹容的题签），并有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与梁启超同为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奠基者。期间参加上海爱国学社。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斥清帝，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遂

发生震惊中外之“苏报案”，入狱三年。1906年赴日本参加同盟会，继任《民报》主笔，主持《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发起热情”，文字以佛理说革命，主张“革命之道德”。撰有《中华民国解》，为“中华民国”国号的创始者。

章太炎在晚清时与《新世纪》报吴稚晖等人争论汉字前途，反对在中国采用“万国新语”（世界语）。乃依篆书创造记音字母，作为汉字初学的注音手段，以保存汉字。1914年，由其弟子钱玄同、许寿裳、周树人促成教育部通过，作为国语注音符号。

受刘歆《七略》的影响，以《国故论衡》中《原学》等篇为代表，主张“九流皆出王官”说，其后胡适著《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提出相反的意见。据说，章太炎曾对胡适的评价道：“哲学，胡适之也配谈吗？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大多出之于章太炎在日本时期的门下，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沈兼士等。



##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

1895年，在北京与康有为参加会试，落第。与沈曾植、谭嗣同等结交。4月，中日《马关条约》将签，京师震动，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草就内容，大意凡三事：拒和，迁都，变法，而以变法为指归，联合十八省举人连署，史称“公车上书”。

1896年春，至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筹办《时务报》。8月创刊后出任主笔，鼓吹新政，传播西学。主张中学、西学并重，言：“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

翌年11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出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为维新运动培养和罗致人材。所讲多春秋改制，兼及西学，门生中有蔡锷。

1898年3月至北京，协助康有为连续三次发动各省举人“公车上书”。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实行变法。7月3日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六品衔，令办译书局事务。9月21日，慈禧太后下令垂帘听政，“百日维新”失败。是日午后，梁至日本使馆。入夜，在日本驻华外交官的帮助

下，逃亡日本。

1902年2月，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在文章《新民说》中，激烈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提倡新道德、新观念。又连载《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史学》，为传统之中国学术研究发表新看法。在《新民丛报》大量发表黄遵宪、康有为等人的“新派诗”。开始撰《饮冰室诗话》，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新诗创作原则。自述文风为“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时人号为“新文体”。

1903年5月，抵美国考察。12月，访美半年后，对于其号称之“自由”、“民主”社会深感失望，思想有所变，趋向保守中国国学传统，自称“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

1913年5月，进步党成立。9月，梁启超、张謇分别被任为司法总长、农商总长。1915年，袁世凯重新展开帝制活动。8月，梁发表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反对。

1918年12月，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会外顾问资格，远赴欧洲。1919年2月抵巴黎，对协约国牺牲中国、转让德国在山东之特权予日本的行径极为愤慨，提出“向世界舆论申诉”，同时将和会情况及时电告国内，直接影响和引发

“五四”学生爱国运动。

### 吴宓

吴宓（1894—1978），陕西泾阳人。本名玉衡，改名陀曼，改名宓，字雨生，又字雨僧。

1911年1月，抵北京。到京后三日，即剪去发辫。1912年2月，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备馆（预科）。4月，清华复校，乃返京入学。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五九”遂被定为“国耻日”。清华校内，群情激愤，与黄华、汤用彤等发起“天人学会”，以“注重爱国精神”，“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以影响社会，改良群治”为宗旨。

1917年9月，赴美选修英国文学、哲学等。1918年8月，与梅光迪相见，梅往往“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我辈今者但当勉为中国文化之申包胥而已”。吴宓即表示“宓当勉力追随，愿效驰驱”（《吴宓自编年谱》）。9月，转入哈佛大学本科与俞大维订交，在1919年认识陈寅恪。汤用彤亦到哈佛进行研究，吴宓、陈寅恪、汤用彤被誉为“哈佛三杰”。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留学生多次集会声援，要求中国

代表施肇基等拒签和约。所发通电、文章汉文稿，多由吴宓起草。

1921年5月，海光迪称已与中华书局约定出版《学衡》杂志，促吴宓即归国。杂志的三位代表人物是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吴宓认为“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论新文化运动》）。反对新文化运动毁弃传统、全盘西化的偏颇。

### 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蒙古族，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名焕鼎，字寿铭，二十岁后又字漱溟。

1911年，十九岁，参加京津同盟会。思索人生的苦乐问题，趋向古印度人的追求解脱思想，开始茹素，勤读佛典，曾有出家为僧之念。1916年5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究元决疑论》，阐释印度解脱思想，指出人生唯一的路在皈依佛法。

1917年10月，应蔡元培聘在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学生中有谭平山、顾颉刚、冯友兰、朱自清等。1918年11月，父梁济“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渐灭，而不惜以身殉之”，遂自沉净业湖。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自称“与新潮流思想相距甚远，我对新派人物的种种主张不赞同的甚多，但我并不反对提倡白话文”。夏天，与熊十力订交。

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由于《新青年》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于是和当时的文化界生起大论争，梁漱溟为“十二分的感觉到压逼的严重”而作，并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熊十力曾说道：“在五四运动那个时期，在反对孔学，反对中国古老文化那么厉害的气氛中，梁先生提出‘未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话，是很有胆识的。”

## 胡适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生于上海。原名嗣糜，学名洪骅，后改名适，字适之。

1904年，赴上海求学，服膺赫胥黎、梁启超，并曾主编《竞业旬报》（白话刊行）。1910年，北上应试，考取清华学校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于7月赴美留学。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1月，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新文学“八要点”，即“一、须言之有

物；二，不慕仿古人；三、须讲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

1917年7月返国，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7至1918年间，作白话诗多首与白话喜剧《终身大事》，开白话文学先声。1918年与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编辑《新青年》。

1919年2月，《中国哲学史大纲》面世，蔡元培亲为撰序，评本书有四大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目光、系统的研究。12月，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指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是“评判的态度”，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的解释。而“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

1921年11月，作《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主张“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1929年发表论文《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指出中国有三派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中，三是充分西化”。指出“全盘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方为正途。

1930年4月，作《我们走哪条路？》，认为“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

步地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地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11月，作《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说到“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杜威教我怎样思想”。

所以，在1935年3月17日，在《独立评论》中说赞成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指出“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堕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即是说新中国的文化，要由西方文化导航。

（按：胡适用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来怀疑、否定中国儒学的传统价值，实在并未深思；至于“重估一切价值”、“再造文明”，亦并未提出具体内容，只是一种激情的口号。）

## 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

1914年，创办“文学会”和《劝学》杂志。1916年秋，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受教于国学大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以及胡适等。

1918年1月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新申义》，2月发表《文言合一草议》。10月，与罗家伦、徐彦之、康白情等

创立“新潮社”，胡适为顾问。《新潮》月刊是以“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为刊物“原素”，傅斯年为主编辑。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均表支持。1919年元旦，《新潮》面世。在创刊号撰《〈新潮〉发刊旨趣书》一文，宣称以北京大学已“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新潮》之责任在于：一、就国人“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又不察今日中国学术之枯槁如此”，而“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新心”；二、就中国社会尚为“二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会”，而“为不平之鸣”、谈“因革之方”；三、就“中国群德堕落”，“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而“鼓动学术上之兴趣”；四、就“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而协助青年学生“脱离此类感化”，研求“修学立身之方法与径途”，“为未来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4月，致书鲁迅，称赞《阿Q正传》并征求对《新潮》意见。

5月4日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爆发，被推为十三校二十名代表之一，参与指挥示威游行。“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着大旗，直赴赵家楼。”

1927年10月，应蔡元培之聘，任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1928年3月，与顾颉刚、杨振声被中华民国大学院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常务筹备委员。



5月，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认为：一、必须能发现新问题；二、必须扩张使用历史材料范围；三、必须扩张研究工具。发出三个口号：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从而建立“中国史料学派”。

（按：这一转变，把中国史学传统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语]之宏大胸襟与终极追求，一下子失去了支柱；中国史学遂变为塌陷在用科学方法考察具体实物，研究死材料的学科。）

## 吴虞

吴虞（1872—1949），字又陵，原名永宽，出生于四川成都。曾师从经学大师王闿运的弟子吴伯裼、廖季平、张星平等研读中国传统的经书子传。

1911年，吴虞父亲吴兴杰晚年落魄，找到儿子家中毁弃早年立下的分家合约争夺财产，父子二人因此大打官司直至大打出手，吴虞写出《家庭苦趣》一文油印散发，揭露父亲

的诸般不是。在法庭胜诉后，他以每月支付二十元赡养费为条件令父亲迁出另住。一直与吴虞势不两立的徐桐趁机纠合教育界人士联名发表宣言，既攻击吴虞出手打父亲，致使其父饿死岱庙为忤逆不孝；又攻击其“非儒反孔”的诸多文章为异端邪说，把他逐出教育界，并遭受官府通缉。吴虞于是更加执著地“非儒反孔”。

1914年，章士钊、陈独秀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办《甲寅》月刊，吴虞把自己的旧诗《辛亥杂诗九十六首》寄到《甲寅》杂志社，予以发表。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杂志）。1916年12月3日，吴虞给陈独秀写下一封长信，随信寄去《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本论》、《礼论》等文章。1917年1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5号《通信》栏中公开发表吴虞《致陈独秀书》，同时发表自己的回信《答吴又陵》，说是：“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

吴虞从“非孝”入手，被认为与父亲专制强暴的切身体验有关。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中，他写道：“详考孔子之学说，既认孝为百行之先，故其立教，莫不以孝

为起点。”因而对“专制主义”发起攻击：“然为子而不孝，则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于为父之不慈者，固无制裁也。”在《说孝》一文中，吴虞进一步指明：“他们教孝，所以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敬敬地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工厂’”。继鲁迅《狂人日记》发表后，吴虞写出《吃人与礼教》。

## 鲁迅

周树人（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樟寿，字豫才，后改名树人。鲁迅是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笔名。

鲁迅因家道中落，1898年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时开始接触“新学”和鼓吹维新思想的书刊。

1904年秋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校观幻灯片，放映日俄战争时，一名中国人被日本军人以俄国侦探罪名砍头示众的情景，围观的中国人却木无表情，遂省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

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遂弃医从文。

1912年2月，应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任职。1918年初，参加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编委会。5月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旨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认为中国社会史就是“人吃人”的历史，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此后发表《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在鲁迅笔下，破产的乡村和败落的市镇，潦倒的文人、失望的贫民等的挣扎和呼号，反映当时社会的衰落与无助，被推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为着反对封建主义，一面倒地写了后世称之为“匕首”或“投枪”的新文体——杂文。

最早是于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等杂文中，鲁迅：“在中国……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按：鲁迅忘记了：文化现象的责任，是在人的身上。人有健康的心灵，才有健康的文化现象。鲁迅在扫荡腐朽的文化现象时，却反手把中国儒家最有价值，能成长“人”的文化也破坏了。因噎废食，可叹！）

##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字守常。

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接触18世纪法国卢梭的启蒙思想及19世纪欧洲宪政与民主理论。1912年冬参加中国社会党。

1916年3月从日本学成回国，参加汤化龙、梁启超、孙洪伊等组织之宪法研究会。8月又担任该组织所创办的《晨钟报》主编。这一时期，提出了“青春宇宙观”、“青春文化观”，和“青春人生观”，“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号召青年一代。

1917年1月，应章士钊之邀，参加编辑《甲寅》月刊，文章如《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着力抨击尊孔复古。他说：“吾华之有孔子，吾华之幸，亦吾华之不幸也。”有孔子，“人人尽丧其为我，而甘为圣哲之虚声劫夺以去”。而“孔子者，数千年之残骸枯骨也”。“在我国，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孔子之束缚。”“真能学孔孟者，真能尊孔孟之言者，但学其有我，尊其自重之精神，以行己立身、问学从政而已足。”

1918年1月，应聘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在北大讲授“现代政治”，并在女子高等师范讲授“女

权运动史”。同年参加《新年》编辑工作。1919年5月，在《新青年》6卷5号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介绍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生平，并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918年12月，与陈独秀合作，创办《每周评论》，同时帮助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等创办“新潮社”；邓中夏、高君宇等创办“国民月刊社”。

1919年五四运动后，相继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

## 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浙江绍兴人，出生于江西进贤。字志希。

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在公学师事于右任。曾作《二十世纪中国之新学生》，发表于《复旦杂志》。1917年，入北京大学文科，傅斯年与罗家伦同级。

1918年11月，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与傅斯年、康白情、杨振声、顾颉刚、汪敬熙、江绍原、俞平伯等人发起“新潮社”，并筹办《新潮》月刊。1919年元旦《新潮》第1号问世。

在“五四”前后，《新潮》的影响仅次于《新青年》。办

刊的三个原则是：“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词”。罗家伦在《新潮》先后发表了《今日之世界的新潮》、《妇女解放》、《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等。鼓吹“文学革命”，倡导新文化。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十三所学校三千多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大游行。罗家伦一直走在游行队伍前列，与江绍原、张廷济三人被推为学生“总代表”，到英、美、法等国使馆，递说帖和意见书，希望各国给以“同情之援助”。“五四”当天所散发的唯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即由罗家伦起草。宣言主张“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表明“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山东问题”栏内，发表短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重要概念。并指出：五四运动中，中国学生的创举表现出三种“关系中国民族存亡的精神”，即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

## 陈独秀

陈独秀 (1879—1942)，安徽安庆人。原名乾生，又名仲，字仲甫，亦号实庵。以故里有独秀山，又名独秀。

1914年再赴日本，与章士钊办《甲寅》月刊，结识李大钊。撰《爱国心与自觉心》，第一次署名“独秀”。

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第2卷后，改名为《新青年》），撰《敬告青年》，希望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而倡言若要摆脱“蒙昧时代”，表示“当以科学与民主为重”。

1917年1月到北京，就任北大教职。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白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1918年12月，与李大钊、胡适、高一涵等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1月，《新青年》成立编委会，与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主编。同月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称：“要拥护那‘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science，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



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 钱玄同

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号疑古，浙江吴兴（现浙江湖州市）人。

1913年到北京，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1917年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为会员，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致力于国语运动。他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投稿，倡导文学革命，亦是最早提出废除汉字的口号，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18年至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他是轮流编辑之一。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是他催促之下写出的第一篇作品。

### 吴敬恒

吴敬恒（1865—1953），字稚晖。

1911年后，多从事文化运动，提倡国语注音与国语运动。“五四”期间，吴稚晖批评“整理国故”：“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

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 刘半农

刘半农（1891—1934），江苏江阴人。原名寿彭，又名复，字半农，号曲庵。

1916年秋，开始向《新青年》投稿，发表《灵霞馆笔记》和一些外国短篇小说译文及文坛逸事。

1917年，应蔡元培、陈独秀的邀请，任北京大学文预科教授。3月，在《新青年》发表《我的文学改良观》，提出散文改革和韵文改革的主张。认为散文改革要“破除迷信”，“非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学决不能脱离老文学之窠臼”。发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抨击“不真”的“假诗”，认为“作诗本意，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了事，便算极好”。强调文学中的“我”、“心灵”、“真”，反对旧文学，为“新文学”引向前路。12月，参加北大文科研究所小说组，同组有胡适、周作人等。

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4卷1期推出白话新诗九首。5月,根据钱玄同建议《新青年》改用白话。刘半农一度主持《新青年》编务,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

1919年4月,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长为张一麟),被推为会员。刘半农和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胡适等六名会员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被通过,后在全国采用,沿用至今。

1920年2月赴欧洲,入伦敦大学大学院,进行语音学研究。9月4日,作白话诗《教我如何不想她》,作者在诗中寄寓对祖国之深情,由赵元任谱曲。

### 梁实秋

梁实秋(1902—1987),浙江余杭人,生于北京。原名治华,字实秋,以字行。

1915年秋,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一年级。同级有梁思成、孙立人、熊式一、吴文藻等。1919年,五四运动中,参与罢课、罢考活动。

1923年6月,清华毕业。8月,与顾毓琇、许地山、谢冰心等同船赴美。1924年夏,入哈佛大学研究院。

1926年2月,《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在《晨报

副刊》发表。梁实秋的批评方法“是认定文学里有两个主要的类别，一是古典的，一是浪漫的”。西洋古典主义者的理想是：“理性是应该占最高的位置。”浪漫主义者则觉得“无情感便无文学，并且，那情感还必须要自由活动。而理性完全失了统驭的力量”。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趋向于浪漫主义”，“新文学运动，就全部看，是浪漫的混乱”：一、“一方面全部推翻中国文学的正统，一方面全部地承受外国的影响”；二、“推崇情感，轻视理性”；三、“对人生的态度是印象的”；四、“皈依自然并侧重独创”。

1927年6月，文学评论集《浪漫的与古典的》出版。其中《文学批评辨》一文，提出“文学乃人性之产物”，而“人性根本是不变的”，因此“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之唯一之标准”。

### 俞平伯

俞平伯（1900—1990），浙江德清人，生于苏州。原名铭衡，字直民，后改字平伯，号屈斋。

1915年秋，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师从黄侃。1918年5月，在《新青年》发表第一首白话诗《春水》。10月发表《白话诗的三大条件》。12月，加入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发起的“新潮社”。1919年3月，加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

团。4月，在《新潮》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花匠》。5月，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作为北大学生会新闻组成员，曾向群众发表演讲，散发传单。

### 谢冰心

谢冰心（1900—1999），福建长乐人，生于福州。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

1918年毕业，考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在协和女大学生会当文书，写宣传文章。又加入女学界联合会工作，到法院旁听，在《晨报》发表《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一文，支持被捕的爱国学生，署名谢婉莹，这是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9月，白话小说《谁之罪》（后改名《两个家庭》）在《晨报》连载，第一次署名冰心。10月，成名作《斯人独憔悴》在《晨报》连载，小说围绕国难问题，通过父与子的矛盾，暴露封建家庭的专制，反映青年人的苦闷。后又相继发表《去国》、《秋雨秋风愁煞人》、《最后的安息》、《庄鸿的姊姊》、《超人》等短篇小说，表达年轻一代的痛苦和孤独，文学界称为“问题小说”，成为“五四”时期第一代年轻的新文学作家。